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2月出版 总第五十六辑

5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编

中共党史资料

- 我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 夜渡金沙
- 难忘的草地征程
- 在日机轰炸中坚持斗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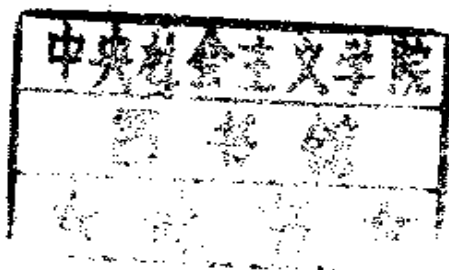
93883

D239
6:44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年·北京

责任编辑:陈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党史资料 第五十六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12

ISBN 7-80023-870-9

I. 中… I. ①中…②中… II. 中国共产党-党史-史料 IV. D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095 号

中共党史资料(五十六辑)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

出版发行:中共党史出版社

通讯处:北京 1929 信箱 邮编:100091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 35 号

电话:(010)2581570 传真:(010)2581532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北京昌平百善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6.125 印张 160 千字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5000 册

ISBN 7-80023-870-9/K·800

定 价:5.50 元

DH94/21

目 录

回 忆 录

- 夜渡金沙 黄新廷(1)
- 难忘的草地征程 裴周五(11)
-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陈鹤桥(18)
- 在日机轰炸中坚持斗争 童小鹏(29)
-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关系回顾 彭施鲁(32)
- 从延安到哈尔滨
- 回忆党中央先遣组派往东北 钟子云(50)
- 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 ... 徐其富 迟生 董家义(60)

专 题 资 料

- 长征途中任弼时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
斗争 宋毅军(71)
- 建国以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简介 朱兆中(99)
- 红卫兵运动始末 关海庭(114)
-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前后后 柳建辉(138)

* 人物介绍 *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传略 伊胜利 陈书智(162)

* 大事记 *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发展

大事记(续完) 编写组(167)

* 史实考订 *

关于毛泽东挽黄公略联中几个字词的辩证

..... 吴直雄(187)

* 小资料 *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联合组建的游击支队

..... 姚莲瑞(189)

夜渡金沙

黄新廷

去年5月间,我沿着1936年红二、六军团长征路线作了一次实地考察,再次踏上了丽江纳西族自治县石鼓镇这片神奇的土地。滔滔的金沙江水沿着哈巴雪山和云岭山脉之间的峡谷由北向南直泻而下,流经此地被迎面屹立的玉龙雪山所阻。江水就象一条被激怒的蛟龙昂首摆尾来了个一百二十度的大转弯,由西向东奔腾咆哮而去,在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的挟持下逶迤东流,形成了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大自然所创造的宏伟奇景使人叹为观止。这就是当年我二、六军团夜渡金沙,巧妙突破天险之地。

巍峨的雪山,陡峭的峡谷,奔腾的急流,绝无仅有的石鼓山口,加上神秘高寒的康藏高原历来是兵家禁地。历史上虽有诸葛亮“五月渡泸”、忽必烈“革囊渡江”的成功先例,但都是政权在手、强兵对弱敌的情况下取得的。一支转战万里一无政权可依,二无援军可盼,强敌追截独立作战的红军在此突破天险,确实是前无古人,它需要领导者多么大的胆略和指战员们多么艰苦卓绝的革命精神啊!

1936年3月,当红二、六军团长征进至贵州盘县地区时,接红军总部来电,要求红二、六军团伺机渡过金沙江与四方面军汇合北上抗日。我红二、六军团原准备在滇北元谋、龙街一带渡江,但我军先头部队刚跨过普渡河就被

敌军所阻，敌人集结了川、湘、滇、黔各军五支队伍十几万人企图与我在功山以南普渡河以东决战，我如果坚持在此渡江势必造成十分不利局面。为此，二、六军团总指挥部果断决定部队掉头南下，直奔昆明，一举攻占了富民县，前锋近逼昆明近郊的沙郎，突如其来的回伐捣巢，使敌人惊慌万状。急忙调兵遣将保卫昆明，我又乘敌慌乱调兵南下之际，挥师西进甩开了敌人。

敌人发现我渡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企图后，蒋介石急不可耐飞抵昆明，坐镇指挥，还带上龙云乘飞机在楚雄、大理、邓川、鹤庆一带沿江上空巡视。命令滇军孙渡、湘军李觉两个纵队沿滇西大道跟踪追击；命令川军郭汝栋、中央军樊松甫两个纵队渡过金沙江，向华坪、永胜急进，抢先控制金沙江北岸。同时，调敌航空第五队（飞机12架）协同滇军空军（飞机10架）进行轰炸侦察；并调川军杨森、李家钰30个团在川南一带布防。

敌人以十数倍于我之兵力前堵后追，上有敌机轰炸侦察，下有民团骚扰，我能否甩开敌人主力争取数日时间成了渡江的一个关键。我军直逼昆明的策略行动，使我们摆脱了十几万敌人的追堵，赢得了时间，争取了主动，然后兵分两路加快行军速度向滇西挺进。右路六军团连克牟定、姚安、盐丰，左路二军团连克楚雄、镇南、祥云到达宾川，经过一夜激战夺取了宾川城。4月20日与右路军在宾川汇合。宾川远离滇西大道，既非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又非红军西进必经之处。我军攻打宾川的坚决行动和左右两路汇合宾川的军事态势，使敌人错误地判断我将取得宾川立足尔后夺取金江渡口，此渡口地势平坦便于

大部队行动,是与四方面军会师之捷径。敌指挥部匆忙调兵遣将,在永胜、华坪地域布下口袋待我就范,企图逼我在金江渡口背水一战,蒋介石怀着将一举吃掉红军主力的自喜心情,乘机飞临宾川上空,亲自视察阵势。就在他未捷自贺之时,我军却挥师北上直插鹤庆,我当时在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任团长,一路上我们都担任前卫任务,师里还将骑兵侦察连配属我团。4月23日我部先抵鹤庆。24日后续部队陆续达到。先后驻留了3天之久,这是我们挺进滇西以来部队第一次在一地停留这么长的时间。当时敌人认为金沙江水流湍急,没有渡江工具难以渡江,判定我集结鹤庆是要通过东北面的梓里铁索桥过江,因此,敌军统帅部命令远在数百里之外的敌军两个纵队加快西进追赶,还通知距我较近的永胜,华坪两个纵队在江东布防,企图堵我过江。敌人还在永胜沿江修筑一百多座碉堡,强征壮丁两千名,编成十六江防大队。增调地主武装四五百人,并成立永华独立营,集结二百余众控制梓里铁索桥。总指挥部深知敌人的如意算盘,采取了真真假假声东击西的韬略,一方面部队前前后后在鹤庆驻留,貌似休整迷惑敌人;一方面立即派我们前卫团向丽江前进。4月23日,由师侦察连和我团侦察排组织的侦察分队到达鹤庆后即马不停蹄先头出发北上。团的主力稍事休息后,进行伪装,也立即前进。独占空中侦察优势的敌人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鹤庆停留的大部队,我们前卫部队却神不知鬼不觉地于次日上午出现在丽江坝子上。

丽江位于玉龙雪山脚下,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山城,为纳西族人民的聚居区。地处偏僻,交通极为不便,反动统

治力量薄弱。纳西族民风淳朴，汉文化传播较久，不少人会讲汉语，久有礼仪之邦的美称。红二、六军团进入滇西以来，一路上严惩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争取开明士绅、救济贫苦百姓、尊重少数民族习俗、宣传抗日救国主张，纳西族群众早有所闻。我侦察分队进驻丽江时，按照纳西族人民逢年过节用红色表示喜庆吉日的习俗每人做一朵大红花，当我们骑着高头大马，口衔红花，手持钢枪，队列整齐开进丽江，纪律严明，对人民和蔼可亲，敌人那种“红军红眉毛，绿眼睛，杀人不眨眼”的反动宣传就不攻自破了。当我们前卫部队到达丽江时，丽江人民就推举出数百名群众代表在城南东元桥“接官亭”欢迎红军。他们手持彩旗，路边摆着香案，打着“欢迎文军”的横幅，以表示对文明之师的敬意。这是部队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之后，在新区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民鱼水交融的场面。这天丽江坝子天气晴朗，春意盎然，坝坡上山花烂漫。战士们一个个精神抖擞，一扫连续行军作战的疲劳，自动整戎装、齐步伐高唱战歌向丽江城走去。我也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见景生情，不由得想到了根据地人民对革命的炽热感情和我们肩负的革命重担，顿时稍稍放松的情绪又被如何完成渡江大任的紧张思索所代替。当即命令骑兵分队马上出发到石鼓江边侦察敌情，查找船只，了解渡口水文、江情。石鼓距丽江约一百华里为丽江所辖，丽江实际上是我军此次渡江的前进基地。我们利用在丽江短暂停留时间紧张地完成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一方面对部队进行渡江动员，一方面广泛接触群众。开狱释放 48 名群众，宣传抗日救国政策，争取群众支援渡江。同时了解

敌情地形选择进军路线,为军团指挥部和后续部队到达创造有利条件,一直忙到深夜。次日凌晨3时部队就已整装出发,天空闪耀着稀疏的晨星,山风吹来带着几分寒意。寂静的山林,崎岖蜿蜒的山间小路,被行军行列的火把照亮,横卧在丽江石鼓之间黑沉沉的铁架山被这条火炬红光拦腰切开。看着战士们矫健的步伐,望着他们手里高举的火炬,我的心里感到一阵激动:我们这个团有一千多人,红军中算是一个大团了。在洪湖苏区能攻善战,人民中享有盛誉。长征以来,在湖南瓦屋堂战斗中打湘军开通路,保证了军团的行动。在贵州佯攻贵阳,解放石阡,转战乌蒙山区。入滇后攻宣威夺宾川打了不少好仗,红军处在逆境,战士依然士气高昂,虽然老区来的不少战士已长眠地下,但是不少热血青年的加入,使这支部队始终保持着优良的战斗作风。从宾川到丽江连续行军作战5天,部队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每到一地,干部、战士自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争着抢着担负艰巨任务,令行禁止,团结战斗。战士手中的火把照亮了滇西大地,给人民带来了希望,给我自己倍添了完成任务的勇气,有这样好的战士,有这样好的部队,还有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呢!部队不觉已经爬上了铁架山的山顶,从山顶向下是数千米的陡坡,坎坷不平的小路越涧穿林崎岖而下。这时天已蒙蒙亮,东方露出了鱼肚白,行军速度显著加快,经雄古、沙坝到下午一两点钟即到达石鼓镇。石鼓是一个小山镇,座落在玉龙雪山西麓的山坡上,依山顺势层叠着一些土木结构的建筑群,众多的草屋之中,间或有几幢砖房、木楼突起。听说镇内有明代嘉靖年间建立的一个记功碑,厚而圆

呈鼓形故而得名，只是渡江任务火急未敢偷暇观赏。镇子的脚下两百多米便是有名的长江第一弯。向下俯视，金沙江的雄姿尽收眼底，镇子左右两侧是绵延数百米的玉龙雪山与云岭山脉，山高涧深，石鼓就成了北进藏区、南出滇西的唯一通道。我勒住满身湿漉漉的战马，仰首远眺，大江两岸高峰相望，江面宽阔，江流频迭，水流湍急，向西望去，大江在两山之间穿行，江岸忽而坦阔，忽而窄陡，如卡住几处关隘。纵有重兵也难轻易通过；向北观看大江陡转，南岸高山屹立，岸边有五六米的峭壁向前延伸逐渐形成峡谷，部队无法行动。堵住石鼓山口。从石鼓以上渡江，是少兵胜强敌的理想渡江之处。面对大江我对总指挥部首长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为完成渡江北上的任务，贺龙、任弼时首长胸怀大略，审时度势，洞察地理民情，率领我们这支奔波万里在十几万敌军的围困堵截之中的一万七千名红军，决定性地走了佯动昆明、强攻宾川、集结鹤庆三着好棋，把十几万追兵甩在百里之外，疲命于筑碉守桥挖壕据守之中。当我们前锋部队饮马金沙江畔时，敌人正忙着在梓里桥边陈兵布袋，做着一举吃掉红军主力的黄粱美梦。我松开缰绳驰马江边，听取了侦察分队的敌情报告和找船情况；敌民团头领汪家鼎已在我到达之前将渡船全部撤到北岸，民团散布在江北一带山上，仅在石鼓渡口的海洛塘一处找到一只未来得及撤走的木船。根据获得的情报及总指挥部赋予前卫团的任务，我一方面向师首长汇报，一方面决定先利用这只小船在水势比较平缓的就近渡口先行渡江，占领东岸滩头，寻找船只，勘察渡口，为大部队过江创造条件。待部队在江南岸柳林、麻

子沟一带隐蔽集结待命渡江时。天已近黄昏,红日西沉,在夕阳余晖铺衬下,哈巴雪山更显得庄严雄伟,不一会儿,整个江面就被雪山的巨大身影所覆盖,时间在提醒我要加快渡江速度,我注视着眼前这一只能容下十几二十人的小木船沉思,如从江面宽约五百米的石鼓摆渡,往返一次需一小时,势必延缓过江时间。我随即与身边刚来的五名船工交谈,根据他们提供的情况和侦察部队现地侦察报告,我决定由船工掌舵组织部队拉纤,将木船拖到上游木瓜寨渡口过江。战士们经过岸边大休息,看见了渡船后情绪高昂。大多在洪湖长江边长大的小伙子争相拉纤,不知哪位战士唱起了川江号子,引起众人响应,号子声震撼了峡谷,余声回荡在山峰江水之间,久久不能消失。5华里的路程很快就到了,我目测木瓜寨渡口江面宽约二百多米,约计往返一次需半小时,且对面松林密布,便于部队隐蔽,是个理想的渡江之处。部署了渡江掩护部队后,我与政委朱辉照、参谋长高利国同志简短地交换了意见,决定由我先过江,组织部队占领滩头阵地,控制各制高点,在江东岸沿江侦察。政委、参谋长在西岸组织部队过江。当即我和通讯员乘上了第一船,由部队早选派好的一个加强班随我一同登船,三位船工掌舵摇橹,我在船头观察对岸四处动静,思索着过江后的行动。从船工们紧张严肃的表情上看得出他们也感到了手中舵橹的分量不比以往,他们熟练地驾着这不寻常的一叶小舟,忽而奋力疾驶,忽而轻松击水,很快地穿过激流到达彼岸。当我一脚踩到铺满卵石的江东岸时,心里感到一阵兴奋,关向应副政委“过江就是活路”的话语一下子变成了一条北上的坦

途。时间不容我在江边遐想,当第一支部队渡过江时,晚霞早已消失,天空由兰变灰,夜色很快笼罩了大地。我在东岸几个要点派出了警戒,并派部队迅速沿江北上,侦察敌情、地形,寻找船只渡口。由于敌情威胁不大,为加快渡江速度,命令部队点起松明火把,在两岸登陆点堆起篝火。不少热心的当地群众也打着火把来到江边帮助部队渡江,有些胆子大的孩童也好奇地来到江边目睹这载入中国革命史册的壮举。按照预定计划,我带领已过江的先头营沿江北上,队伍举着火把,行进在高低不平的坎坷江岸,大江奔腾南下,火龙雄壮北上。途中我们在松坪子得到了另一条木船,五名船工经过动员愿助我军渡江。这样,我们又分出一部分队伍在距木瓜寨仅六华里的木取独渡口过江,控制在手的滩头,两条木船的运力,众多船工支援,被我军神速行动吓昏未醒的民团,南方籍战士牵马泅渡成功的喜讯,大大加快了渡江的速度。经一夜奋战,我团于25日已全部渡江完毕,无一伤亡。红六师在江西岸也沿江北上,与我们隔岸并进。这样,石鼓以上百余里滩头四处渡口均在我控制之下。军团部和五师部队在丽江进一步发动群众,动员数十名木匠铁工扎木排,制简易渡江工具。贺龙同志还亲自给开明士绅写信,晓以救国大义,动员他们献出藏匿船只支援红军北上抗日,并于26日到达石鼓。在木瓜寨、木取独、土可、格子四渡口,我军征得木船六只,木筏若干同时渡江。26日军团部、五、六师一部已顺利过江,六军团也离开鹤庆,经九河、白汉场到达石鼓宿营。27日又扩大了巨甸余化达渡口,集中七条木船、28名船工在石鼓以上120华里地段全线渡江。我军通

宵达旦，夜以继日，上重下轻，梯次展开，形成渡江高潮，这天两军团主力大部均已渡江，总指挥部决定梯次收缩，最后留下上游余化达一个渡口由后卫部队通过。

过江后，我们刚到吾竹地区，上级即指示我们迅速占领巨甸以北的格鲁弯。此处由民团头目、土官汪家鼎率众据守，既对我渡江造成威胁，又是我翻越哈巴雪山唯一通道上的一个钉子。我们受领任务后，马不卸鞍、士不解甲，急速前进。直到这时蒋介石才发现我军正在石鼓渡江，如梦惊醒，气急败坏，急令孙渡纵队三个旅循红军踪迹向丽江追击，原打算向鹤庆绕截红军的刘正富旅奉命从邓川以东调头向北赶赴石鼓，李觉纵队沿滇西大道向大理、邓川急进，并派飞机到石鼓沿江轰炸，妄图迟滞红军渡江。所有这一切都徒劳了这位“委员长”。当敌人刘正富旅疲惫不堪，气喘吁吁到达石鼓镇时，未见到红军一个人影，只留给他两条醒目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地，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刘正富哭笑不得的表情和士兵们奔命有日，松一口气的情绪，总算回报了蒋介石“御驾亲征”的一番苦心。

我前卫团 27 日经过一天的急行军，来到立马河口，占领格鲁弯。次日凌晨沿一条深涧从海拔 1800 米的河谷向上攀登，两边是原始森林覆盖的峭壁，山上山下气温差别很大。行至半腰处大崖屋附近，敌汪家鼎凭借雪山之险要隘口居高临下，投放垒石，开枪阻击我军前进。我当即命令行至就近的连队从左侧攀登迂迴至东山岩头向敌人开火，干净利落地打了一仗，汪敌落荒而逃。至此，我军顺利地完成了抢渡金沙江的重任，并打通了二、六军团进军

中旬、会师甘孜，与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抗日的道路。

难忘的草地征程

裴 周 玉

跨越草地是红军长征中人与自然斗争最严峻,牺牲最大,同时也是决定红军长征成败的一段艰难征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我特撰写此文,以缅怀先烈。

(一)过草地之前红军遇到的困难

1936年8月,红三军团(后改为红三军)十一团,由黑水芦花进到毛儿盖附近后,就准备过草地。这一段草地长达500余里,宽达300余里,而且高原寒冷,空气稀薄,气候多变,忽儿狂风大作,忽儿风雨交加,忽儿冰雹骤降,并有无数的深水泥潭,人畜陷进去,几分钟就被泥潭吞噬,因此红军通过草地,要有群众带路或按前面部队的路标指引前进。但当时根本不具备应付这些困难的条件:

(1)战士们身体普遍虚弱。因为红军进入四川少数民族地区后,经常缺少油盐、副食,就是青稞面也经常吃不饱,拖得骨瘦如柴,病员增多,这是红军战士过草地的最大困难。

(2)筹备物资工作无法完成。虽然上级动员每个人要

筹集 10 斤干粮，购买棉毛衣或羊皮、烈酒、辣椒等，而这是落后的贫困山区，部队又多，哪能实现呢？若买到一张羊皮捆在身上防寒也是最大的幸福。

(3) 准备时间紧迫，部队不能花几天时间到几十里外去收购粮食、购买羊皮、衣服，只能在驻地附近寻找与购买，其难度之大，令人可想而知。

上述这些困难都是部队的实际问题，但是红军过草地的决心并未动摇。

(二) 进入草地遇到史无前例的困难

红三军十一团，于 8 月 22 日，在团长邓国清，政委王平的领导下向草地开进，在七天的草地艰难生活中，遇到了许多巨大困难，主要是：

(1) 进入草地后行走极为艰难。草地所谓的路不是山间的羊肠小道，更不是平坦笔直的大道与公路，而是前卫部队人员和牲畜通过时，踩蹬留下的足迹。就是说：茫茫草地中，草萼被沾满泥浆或草萼踩入泥中，以及淤积的黑色水中被踩成黑色的泥水浆，这就是人畜能够通过的道路。

红三军团十一团进入茫茫的草地，首先遇到的是弹簧式与草甸一样的泥泞道路，踩上去软绵绵，像荡秋千一样晃来晃去，或深一脚浅一脚的泥浆水草地，稍有粗心大意或踏踩不当时，就可能滑倒或滚到深水潭，轻则打湿衣服挨冻，重则由此残废或丧生。第一天行军虽然道路艰难，拖得大家精疲力竭，但全团未发生人畜伤亡事故。可

是第二天不仅遇到几个大的深水潭、大家只好绕着大弯通过,而且遇到许多十几米或几十米大小不等的泥潭陷井,这种小陷井的地貌与其它草地区别不大,如果不是前面部队插好路标或危险标记,或目睹陷进去的骡马还在挣扎吼叫,根本分辨不出它是吞噬人畜的陷井,所以在这种地段行进时,不论多么寒冷饥饿或疲劳,每个人都会立刻精神振作起来,聚精会神地来应付这种可怕局面,并下定决心,鼓起勇气,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拐棍,三五人一伙,五六人一团,手拉着手或相互搀扶着,缓慢地向前行进,以保证安全通过,减少不应有的伤亡,即使这样还是有少数同志未能通过这种地段,如有的伤病员因饥饿、寒冷昏倒,跌滑进陷井而牺牲。又如我团三连一个战士在大路旁解大便,刚选择一个草茆蹲下时,就滑入泥潭,他拼命地挣扎,可越陷越深,虽然大家马上抢救,不仅未把他救上来,而且去抢救的战士也被滑下去。只是由于这位同志体弱,无力挣扎索性就卧倒在地上,故未陷进去而被抢救上来,使这位战友“因祸得福”。

(2) 渡河的困难

草地河流虽然不多,水面不宽,但水流湍急,河底又高低不平,水冷刺骨,加上大家的身体弱,肚子饥饿,抵抗能力差,经不起这种寒冷的刺激,只要稍加不慎,就有被水冲倒河里的危险。冲倒后即便抢救上岸,却很少能够生存下来。因为河水把衣服泡湿后,冻得全身发抖,且无衣服可换,别人也无衣服可借或赠送,即便别人帮助扶起,但寒冷难忍,更无力走路,便牺牲在草地上。所以每过一条河,团营首长都站在河两岸指挥,机关的同志站在河

岸,宣传鼓动组织部队过河,以防被水冲倒。对体弱者和病员,还要组织体强力气大的同志帮助搀扶或背着过河。即使这样精心安排,每次过一条水深一公尺的小河,十一团总有几个人不幸牺牲。

当时过草地的骡马比汽车、飞机的作用都大得多。我有一匹马,每天在全团后尾收容掉队者,把一些危在旦夕的同志,驮着通过最困难地段或最危险的河流,使这些同志在关键时刻得到支持而走出草地。如三军团李大队长的坐骑累死后,自己又害病掉队,他见到我后,把党证交给我向我告别。我劝他吃点干粮,骑上我的马走了十几里,身体有了好转,第二天第三天我的马又给他骑过了两条河,终于使他走出了草地。另一位当过师政委的张平凯(后任山西军区副政委)因“左”倾错误领导者把他撤职,他自己背着一床夹被、一个皮袄、害病掉队在后面,我把他的行李交给饲养员帮助驮出草地,每天把马让他骑一段,给他一些干粮充饥,这样身体逐渐好转,终于走出了草地。

(3)缺少粮食没有食物

十一团进入毛儿盖,准备过草地前,部队就经常吃不饱肚子,而过草地每人要筹集10斤粮其困难更大。因无钱也无处可购买,就是麦田的麦子也早被前卫部队收买光了,我们就是走出十多里地,也很难收到麦子。十一团政治处二十余人费了几天的时间,才收到100余斤生青棵麦子,晒干后每人分不到5斤,有的连队只分到三四斤干粮,就凭这点粮食,要渡过七天的草地,其饥饿难忍程度就可想而知了。所以红军战士每天饿得难忍时,就像牛

羊一样，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喝几口冷水，或拔青草、摘树叶和挖草根当作干粮边走边吃。我只有5斤干粮，而且还要救济危难的战友，所以也要靠野草、树叶作主粮。每天到达宿营地，再疲劳也要找青草、树叶或草根，用洗脸盆熬成稀汤，作一顿“好饭”吃饱肚子。而吃下后恶心、呕吐、或肚子膨胀发痛得打滚是常事，而第二天照样拔来煮着吃。若遇上干燥的地方宿营时，每个人都想找到一点食物充饥，如找老鼠洞，挖出老鼠熬汤解解馋，或拣香菇，找野菜等。至于有皮带或皮鞋者，虽然数量极少，但都要把它煮熟吃光。途中遇有前面部队死马的骨头，也要把血淋淋的骨头抢来啃着充饥。特别是掉队的伤病员，携带的干粮更少，只能依靠别人救济一点干粮度日，但救济的数量有限，只好靠喝冷水，吃野菜，树叶充饥，遇有前面部队人员或马匹拉下的粪便中还未消化的麦粒，也顾不得洗干净，就拣起来往嘴里塞，虽然采用各种办法来解决饥饿问题，但仍有许多掉队人员未能走出草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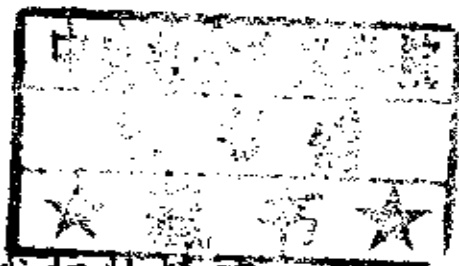
在严寒地带与缺少粮食的情况下，每天烧上一次开水，或熬一顿青草、树叶稀汤喝，有助于增加身体的热量，所以过草地时，要求各人携带准备烧水做饭的工具，并要求携带三五斤干柴，以备在缺柴草的水网地带烧开水做饭之用。因此每到宿营地后，大家就自己动手用泥块或草茺垒炉灶，烧开水做饭，而做饭的工具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茶缸、洋瓷大碗、洗脸盆、炒瓢。草地的水，都有腐臭味，喝下去呕吐、恶心，但为了缓解饥饿，水的臭味再大也得用它做饭烧开水解渴，并且都把晚上这顿煮熟的青草稀汤当作每天一次最好的享受和安慰。特别是做饭时，

见到无边无际、长蛇阵一样的火堆，到处闪烁发亮的情景时，大家的情绪又高涨起来，此起彼伏的说笑声与歌声，又响彻云霄。一切饥饿疲劳都抛到九霄云外了。

(4)晚上没有地方睡觉

在草地上饿着肚子每天行军五六十里，到了晚上能找到一个干燥舒适地方睡一觉，也是每个人最大的希望和恢复疲劳的好机会。可是水草地，多是水深没膝盖，或泥浆很深，或双脚踩下去能冒出水来的潮湿地。其次，晚上下大雨多，又没有雨伞、雨衣等工具，只能硬着头皮顶着，或几个人顶着一床被子，或把一件衣服当雨伞，而衣服淋湿后，也无干燥的衣服替换，只好受冷挨冻。再次，晚上天冷，又无棉毛衣服，加上肚子饥饿，所以，各连队都有不少人轻病冻饿成重病，甚至牺牲在草地上。十一团政治处 20 余人，每晚遇着有水或潮湿地宿营时，都三五人一个组，由刘随春主任指定各组安营扎寨的位置，我这个团特派员与俱乐部主任余非及保卫干事魏全为一组。每晚天黑前，拔上些草苑垒成一个高出水面的草土堆，再割一些野草放在土堆上，而后铺上背包或放上衣服，三个人就背靠着背，坐着度过难熬的夜晚，而且最担心睡着后，跌倒或滚到深水泥潭而丧生，所以再疲倦也难以入睡，或者我们三个轮流睡觉，以免发生不幸，至于刮大风或下大雨更无法睡觉，只好睁大眼睛，坐着熬到天亮，然后照样行军走路。只有最后一个晚上是在原始森林过的夜，这个森林古树稠密，到处荆棘交错，人钻不进去，前面部队在此搭好的窝棚，好似房屋一样避风、防雨，大家都称赞“洋房子”和“软席”床，叫人感到特别舒服，这是在草地上最幸

福的一夜。



(三)红军在草地可贵的自我牺牲精神

由于过草地时饥饿寒冷缺医少药,使部队的病员有增无减,而这些病员,既无医院可住,也没有担架可抬,完全依靠每个病员的坚强意志,拄着拐棍,跟随后尾日夜奔波。全军掉队人员每天有三四百人,虽然各团收容队都耐心帮助,使大多数掉队者每天都能赶上自己的部队,但也有不少同志牺牲在草地上,特别是快出草地的最后两天,倒下的同志成片成堆,多者几十人,其中有的三五人一伙,背靠着背坐下好似在休息,等我们走近一叫或推拉时,他们早已与世长辞。目睹这些牺牲了的战友,我们虽无法掩埋他们的遗体,但我们仍把他们的尸体放平,盖上衣服或被子,尔后脱帽致哀,鞠躬告别。幸存的同志互相搀扶着又继续向前行进。红一方面军过草地到底牺牲了多少同志,至今也没有确切的数字,聂荣臻元帅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沉痛地写道:“环境的确是艰苦的,我们的许多同志在作战中那样英勇没有牺牲,却在缺粮少药、饥饿、寒冷、疾病、高原缺氧的艰苦旅程中痛苦的倒下了。”

红军经过七天的艰难跋涉,胜利地跨过了草地,国民党想把红军冻死、饿死在草地的企图破灭了。红军战士在党的领导下,以坚贞不屈所向无敌的精神,战胜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走出了泥潭水草地,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的骄傲。

我在西北经历的三次红军大会师

陈 鹤 桥

今年是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于 1935 年 10 月 19 日胜利地到达陕甘根据地六十周年的日子。这是非常重要、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因为这一件大事对于中国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有极其重大的意义。

当时，我是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政治部的一名政工干部，在 1935 年秋到 1936 年秋的一年时间内，我在陕甘宁地区亲自参加了红军的三次大会师，这是我参加红军后在几年的艰苦斗争中，最光荣、最幸福、最高兴、最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红军在陕甘宁三次大会师，人数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如第一次，我是以红二十五军一名战士的身分，参加同刘志丹等领导的陕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的会师；而第二次会师则是红十五军团同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主力的大会师；第三次是毛主席、彭德怀同志领导红一方面军西征甘肃、宁夏时，于 1936 年 10 月在甘肃中部和宁夏南部同二、四两个方面军的大会合。下面我简单介绍一下三次会师的经过和对当时革命形势所造成的重大影响。

第一次会师

1934年11月，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3000余人），在省委书记徐宝珊、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等同志率领下离开老苏区，到新区去创立新的革命根据地（留下高敬亭等同志和一部分武装，在老苏区坚持革命斗争，后来他们编为红二十八军，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在11月16日从罗山县出发，通过平汉路，经过桐柏山进入湖北的枣阳以西，然后又向北转入豫西之伏牛山区，沿途打败了敌军步骑兵的堵截，于12月8日和10日在消灭和击溃了堵截和追击我军的国民党军队后，经卢氏进到陕南。12月10日省委开会决定，就在鄂豫陕三省边界这一战略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立新的根据地，省委改名为中共鄂豫陕省委。经过8个月的紧张工作和英勇战斗，我军打垮了敌人的两次“围剿”，消灭敌军三个旅和一部分地方反动武装，省委和红二十五军先后派出郑位三、郭述申、陈先瑞等同志到地方工作，在十几个县内发动群众，开展了游击战争，建立了鄂陕、豫陕两个特委和一部分县区人民政权，扩大了地方武装。1935年7月中旬，红二十五军继续长征，主力从陕南打出终南山，进入关中平原，威逼西安。就在这时，从上海来的党的交通口中，得知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已会合于川西地区，有北上甘陕地区的可能。省委当即开会决定留下郑位三、陈先瑞等同志在鄂豫陕边区继续坚持斗争，保卫根据地。红二十五军主力则立即向西进入甘肃地区，

了解中央红军北上的消息，便于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八月，红二十五军经陕西留坝、凤县进入甘肃，包围天水，过了渭河，连占两当、秦安、隆德三城，在平凉一带切断西兰公路。从俘虏的敌军军官口供中得知，国民党加紧调动军队到陕甘是为了阻拦红军从四川北上。我军继续沿西兰公路行动，为的是了解主力北上的消息，同时也是箝制已进到甘肃企图阻拦红军主力北上的敌军。8月21日我军在泾川县行动时，在大雨中与敌军三十五师一个团遭遇，因大雨和河水阻隔，部队不能迅速集中对敌。军政委吴焕先亲自率领军部少数直属部队与敌人拼杀，在部队赶到后消灭了敌人一个团，但是红二十五军优秀的领导者、军政委并代理省委书记的吴焕先同志却壮烈牺牲了，这是我军一个很大的损失。由于我军在切断西兰公路后半个月的行动中，尚未打听到红军主力北上的消息，省委决定红二十五军应经合水县向东先进入陕甘苏区去会合刘志丹等同志领导的红军，以增强红军的力量，巩固和扩大陕甘根据地，为迎接中央红军进到陕甘创造更好的条件。9月上旬，我军在合水板桥镇击溃敌骑兵的追击后，9月7日我军到达合水县之豹子川（苏区附近），省委开会决定程子华改任军政委并代理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5月在陕南病逝）、徐海东任军长、戴季英为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部队经过动员教育后，9日经保安县进入陕甘苏区，当即受到苏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与亲切的慰问。9月15日，红二十五军（3400人）进到苏区中心延川永坪镇。16日，刘志丹同志从前线率领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回到永坪镇，三个军的兄弟部队

胜利地会师了。9月17日,在陕甘苏区的中共西北工委与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联席会议,为了统一党的领导、统一指挥红军作战,决定成立中共陕甘晋省委,撤销西北工委和鄂豫陕省委,把红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三个军合编为红军第十五军团,并决定全区军民立即行动起来,准备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三次“围剿”。9月18日,在永坪镇举行了庆祝红军会合的军民联欢大会。刘志丹、徐海东、郭述申、朱理治、聂洪钧等同志都讲了话,号召全体军民庆祝红军会师,要互相学习,加强团结,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坚决粉碎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为保卫和扩大陕甘苏区而奋斗。

庆祝会师大会后,成立了红十五军团,徐海东为军团长、程子华为政委、刘志丹为副军团长兼参谋长、高岗任政治部主任、郭述申任副主任。红军三个军依次改编为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八十一师,全军团共7000余人。由于敌人在7月已开始对陕甘苏区进行第三次“围剿”,军团首长决定红军改编就绪后,立即开赴苏区南线延安地区去消灭敌人。这时全军团同志都有一个心愿,就是在庆祝会师的胜利后,争取打几个大胜仗,扩大苏区,壮大红军,配合和迎接中央主力红军北上。在徐海东、刘志丹等指挥下,军团决定以“围城打援”战法,消灭进入延安甘泉之敌。9月28日,红八十一师(原红二十七军)包围甘泉县城,七十五师、七十八师在延安以南30公里的劳山埋伏,10月1日,驻延安之敌一一〇师师长何立中率部由延安向南开进,企图解甘泉之围,当日下午即被我埋伏在劳山地区的红军主力包围,激战五个小时后,敌师部和两个团

完全被我歼灭，毙伤敌师长何立中、师参谋长范驭州以下千余人，俘敌 3700 余人。红军乘胜进攻甘泉之榆林桥，消灭敌军一个加强团，俘虏团长高福源以下 1700 余人。两次作战获捷缴获了大批枪炮，敌之对苏区南线的进攻便宣告失败。这一次我军取得消灭敌军一个师零一个团的大胜利，为迎接中央和主力红军北上准备了更有利的条件。

第二次在陕甘的红军大会师

10 月 19 日这一天，红十五军团还在甘泉作战的时候，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经过万里长征来到陕甘边区的吴起镇，很快就传来这个天大的喜讯，中央派人送来了《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指出：“陕甘支队经过二万余里的长征与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六军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将给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同时送来的还有一份《中央红军北上抗日陕甘支队的布告》。当时，我是军团政治部的文印科长，首长们要我们连夜把这两个文件赶印出来，分发到部队和地方去。这时大家都知道了不仅是中央红军来了，毛主席党中央也来到了陕甘根据地。十五军团同志们高声的喊着：“毛主席来了！党中央来了！中央红军来了！”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喜讯呀！

毛主席 10 月 19 日率领陕甘支队进到吴起镇后，22 日中央即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后的战略任务是

建立西北苏区，领导全国的大革命。11月初，毛主席和党中央率领恢复番号后的红一军团南下和红十五军团会合。

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西北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将红十五军团编入红一方面军的建制，委任彭德怀为方面军司令员，毛主席兼任政委。同时任命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首长。这个消息一传开，十五军团同志们听了是多么高兴啊！我们红二十五军几年来都处在孤军奋战的环境中，如今同中央红军的主力一军团会合到一起，我们军团也编入到一方面军的建制，这是很大的光荣。

毛主席和西北军委根据当时的敌情，决定红一方面军一面准备庆祝会师，同时要积极做好作战准备，要在严冬到来之前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准备在直罗镇地区消灭从西线、南线进攻苏区的敌人。

在毛主席亲自部署和指挥下，11月21日，红一方面军指战员对进攻富县直罗镇之敌发起突然的攻击，在我军连续四天的突然进攻和猛烈追击中，消灭了敌军一〇九师全部又一个团，俘敌5300余人，缴枪3500余支，取得了又一次有重大意义的胜利。

直罗镇战役胜利后，11月30日，党中央在富县东村召开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庆祝红军大会师和直罗镇的胜利。毛主席在会上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任务》的报告。对直罗镇胜利做了总结。报告指出我们胜利的原因：“一、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这是基本的）；

二、战略与战役的枢纽的抓住(葫芦河与直罗镇);三、战斗准备的充分;四、群众与我们一致。”报告还指出了直罗镇胜利后的任务,而以扩大红军为此时期工作任务的中心一环。这次会师具有伟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一、中央红军到了陕北,恢复了一方面军的番号,十五军团编入一方面军建制,红军在陕甘苏区的力量大大加强了。由于中央指示在苏区要猛烈的扩大红军,同时争取了一部分俘虏兵参加红军,到12月下旬就编成了红二十八军,军委任命刘志丹任军长、宋任穷任政委。1936年1月又组建了红二十九军,任命萧劲光为军长、朱理治为政委。2月,成立了红三十军,阎红彦为军长、蔡树藩为政委。在7月间,蒋介石为了消灭陕甘红军,开始部署第三次“围剿”,调集东北军、晋绥军以及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共13个师和五个旅,对陕甘边区进行四面进攻,企图将红军围歼于保安、安塞地区。9月26日,蒋介石还在西安设立了“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并代行总司令的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五省国民党军队,加快“围剿”陕甘宁苏区的步伐。由此可见,中央红军到达陕甘对蒋介石的统治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同时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一个伟大的胜利。

二、中央红军与十五军团会师才一个月,毛主席亲自指挥一方面军就在直罗镇取得很大的胜利,粉碎了敌人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巩固并扩大了陕甘苏区,一方面对蒋介石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同时,这次会师和反“围剿”的胜利,是西北革命大发展的号炮,为把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对于开展

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因此这次胜利具有特别伟大的意义。

三、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到陕北，不仅是中央红军与红十五军团的大会师，最重要的是党中央毛主席到了陕甘抗日前线，党中央有了落脚点，更有利于领导全国革命和发动全国抗日。党中央10月中旬到达陕甘苏区后，就连续派人前往北平和上海等地，建立和恢复各地党的组织，领导各地群众抗日运动。北平地下党组织很快就领导和发动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这一运动很快发展到全国各地，工人和各界爱国人士都起来参加斗争了。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对于指导全国各方面的斗争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加强红军内部的团结，对于争取国民党军队内部的爱国力量，对于推动全国抗日运动的高涨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四、党中央到了陕甘根据地，还挽救了当时陕甘边区内部的政治危机。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和红二十七军经过多年的艰苦战斗创建的。1934年夏，这两支部队又先后进行了两次反“围剿”战争，巩固和发展了根据地。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与红二十五军会师组成红十五军团后，又在陕甘根据地进行了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并取得重大胜利。1935年9月至10月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在陕甘根据地实行错误的肃反，逮捕了刘志丹等领导干部，造成陕甘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后，立即把被捕的刘志丹、高岗等释放出来，及时停止和纠正了这个严重错误，从而使陕甘根据地转危为安。

红军第三次在陕甘宁大会师

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后,1936年2月,毛主席率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目的是为了北上直接抗日,对于要阻拦红军抗日的蒋、阎敌军,要给予坚决打击。东征中红军在军事、政治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特别是以红军的实际行动把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更深入更广泛的宣传到了全国,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在红军东征时,由于接受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高级将领开始和红军建立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秘密的政治关系。

1936年5月,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以后,为了争取革命更大的胜利,毛主席又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的西方面军出师西征,向甘宁两省前进。一方面,要解放宁夏和陇东的人民,扩大陕甘宁苏区,用党的路线政策争取和团结宁夏回族人民;同时要打击国民党的反动军队,全力迎接北上抗日的二、四方面军。

红军西征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占领甘宁两省数百里地区,扩大了陕甘宁根据地(美国记者斯诺也从白区进到苏区,8月间他还到正在西征前线的红军两个军团中进行了参观访问),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恐慌。红二、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后,在党中央正确路线的引导下,克服一切困难,英勇地向甘肃南部进军。毛主席指示我们一方面军挥师南下,占领西兰公路会宁一带地区,迎接二、四方面军。

1936年10月上旬，我一军团、十五军团先头部队在会宁地区与二、四方面军胜利地实现了大会师，不久我们军团机关干部在宁夏看到了二、四方面军的部队。我们早就在方面军首长和总政治部指示下做了各方面的准备，欢迎和慰劳二、四方面军。10月下旬的一天，在宁夏的同心城，我们十五军团直属队开会欢迎红军总部，军团首长徐海东、程子华致词，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和红军总部人员，朱总司令和张国焘都讲了话。这次我又以一方面军的一名成员的身份参加了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师，我和大家都十分兴奋。

三个方面军大会师的胜利，使蒋介石更加惊慌不安，他到处调兵遣将，加紧部署进攻苏区红军。中央军委为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对蒋军作战，于10月下旬，任命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部的总指挥兼政委，集中红军兵力打击向宁夏我区进攻的蒋胡匪军。11月21日在环县之山城堡一战，消灭了胡宗南匪军一个多旅，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此后胡宗南部被迫全线后撤，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进攻实际上被停止。这是三军大会师胜利的直接结果。

红军三个方面军会师后，12月7日新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布成立，委员23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张国焘、贺龙、任弼时等七人组成军委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

红军主力大会师和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更加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大大提高了他们抗日的信心，山城堡战役后的第21天，西安“双十二”事变发生了。西安事变在这

这个时候发生,也可以说明红军三方面军在西北的大会师和红军山城堡大捷在军事上、政治上对于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以上是我荣幸参加红军三次大会师的回忆。红军在西北三次大会师正处在我党领导中国革命事业进入抗日救国新阶段的准备时期,红军会师的伟大胜利,无疑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在日机轰炸中坚持斗争

童 小 鹏

1938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武汉大举进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由武汉迁往重庆。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我党在武汉的《新华日报》和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也搬到重庆继续工作。

10月25日,武汉失守。中央决定,原设在武汉的中共中央长江局撤销,在重庆建立以周恩来为书记,博古、董必武、凯丰、叶剑英、邓颖超等为领导成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外不公开,机关设在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内),统一领导西南和南方的地下党组织、统一战线工作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以及《新华日报》的工作。南方局于1939年1月正式成立,并立即开展各方面的工作。

为动摇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日本帝国主义采取对重庆进行空中轰炸的办法,尤其是1939年5月3日和4日两天,日军派出几十架轰炸机对重庆市中心进行连续的狂轰滥炸,使得重庆变成一片火海,许多街区成为废墟,市民遭受重大的伤亡和损失。这期间还因为国民党官僚对人民的生命财产不负责任,防空洞内无通风设备,警报未解除,又不准群众出洞透气,以致造成在一个大防空洞内窒息死亡群众4000多人的大惨剧。

当时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住地机房街、棉花街也都遭到轰炸。因为我们事先做好准备,在几个月之前就征得爱国人士饶国模女士的同意,在城郊化龙桥红岩咀、她创办的大有农场内开始为八路军办事处修建一幢办公楼。5月3日大轰炸后,饶女士即欢迎我们搬到她家里(一幢三层小楼)和雇工宿舍、柴草房里去暂住。这样除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仍住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外,博古、凯丰住在饶国模女士楼上,董必武及夫人何莲芝、两个小孩则住在一间草房里,我和机要科、电台的同志就住在对面山坡上的破瓦房。安排妥当后,我们立即架起电台,同延安党中央和桂林八路军办事处等地恢复了电台联络。各部门的同志也各就各位,继续进行各项工作。

《新华日报》事先也在化龙桥设立了营业部,并在附近的虎头岩下建立了一些简易工棚,挖了防空洞。5月3日和5月4日的大轰炸后,即将人员、机器迅速搬到化龙桥,并加紧扩建办公室和宿舍。当时国民党当局下令重庆各大报只联合出一张“联合报”。《新华日报》一边积极参加“联合报”的工作,一边积极准备恢复自己的版面,把印报机架在防空洞里,在敌机轰炸中仍然可以印报操作。不久,《新华日报》就恢复出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破坏、干扰重庆机关和市民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几乎每日甚至夜间都从武汉派少数飞机到重庆来丢几个炸弹,弄得重庆整天甚至夜间都在飞机警报声中过日子,搅得大家经常进出防空洞,不得安宁,也很疲劳,所以大家叫它“疲劳轰炸”。可是,中国抗战军

民是英勇不屈的，不管日机怎么样轰炸，仍旧坚守岗位工作，特别是江北兵工厂的工人日夜加班生产军火支援前线。后来大家对飞机警报逐渐习以为常了，除了敌机快靠近时才躲避一下（当时大路旁边就有防空洞），敌机一走，仍照常行动、工作。

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有许多是经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在土地革命时期就有一套躲避飞机的经验，现在又住在重庆郊区，有防空洞，对少数的敌机更是无所谓了。在曾家岩“周公馆”的小院内，也挖了一个小防空壕，可通到室外的江边，当听到敌机声音后才临时进去躲一下，平时照常工作和学习。

叶剑英一直坚持在曾家岩 50 号办公、住宿。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则因工作关系来往于曾家岩、红岩之间。为了不受敌机干扰，八路军办事处就在防空洞门口搭了一个席棚，周恩来、董必武常在这里接见外宾或谈工作。为了不耽误同延安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络，在敌机频繁轰炸时，我们还在防空洞里临时架设了一架 15 瓦的电台，用手摇马达发电通报，译电员便在防空洞内点上腊烛翻译电报。

日本帝国主义的狂轰滥炸，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不仅不能丝毫动摇共产党人的意志，相反，使我们更加斗志昂扬。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直接领导下，无论是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还是地方党组织，都坚决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了全国的爱国力量，为把抗日战争坚持到底，取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 远东军关系回顾

彭 施 鲁

东北抗日联军曾在苏联境内组建了自己的教导旅，集训时间将近5年之久。最后又直接参加了苏联红军解放全东北的战役，消灭了日本关东军，从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关系是在国际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有其特殊意义。

东北抗日联军是在中共满洲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创建的。自中共中央于1933年由上海迁至江西苏区之后，满洲省委和党中央的联系只得通过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来取得，直到1937年底中共代表团大部分离开莫斯科回到延安为止。当时在苏联的海参崴设有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这一机构，东北的党组织就是经过海参崴和莫斯科建立起交通联络的。当时，党驻太平洋秘书处的中国工作人员叫杨春山，也叫斯达干诺夫。

东北党的国际交通员经常来往于牡丹江、绥芬河、海参崴之间。驻该秘书处的另一位中国工作人员吴平同志也多次被中央代表团派到东北各地传达代表团的指示并巡视东北党的工作。由东北的地方党和游击队派到苏联

学习的人数先后有 300 余人,其中少数人学完之后又返回东北工作。但是,直至 1937 年底,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或边防军之间没有发生过直接的接触。

1933 年,东北的抗日救国军、自卫军、护路军等缺少国民党政府支援,供应得不到保证而无法坚持与日本侵略军的作战,陆续被迫撤退到苏联境内,苏联又转道新疆将他们一批批遣返中国。这些做法说明了当时苏联对中日关系所采取的严守中立的态度。

到了 1938 年,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对抗日联军极为不利的态势。由于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已返回国内,东北各省委和我党中央的联系完全中断。这时处在松花江下游的抗日联军几个领导人都想通过苏联的协助和延安建立起直接的联系,同时想试探一下苏联能不能在武器方面给我们一点帮助。在 1938 年的一二月间,先后有抗日联军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戴洪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越过了黑龙江进入苏联境内。戴洪滨是率部在萝北县境与日军作战失利的情况下,为了免遭围歼而带领 500 余人的武装队伍越境的。赵尚志和祁致中则都只是仅率少数随从人员进入苏境。由于他们事先和苏方没有任何联系,苏联对他们都是按非法越境者处理的。戴部 500 余人被集体遣返新疆,交给了国民党政府。到新疆后他们要求去延安,国民党未予理睬。以后他们被分散地按排在当地就业,许多共产党员也从此失掉了组织关系,处境相当不好。3 位军长虽未被送往新疆,但被长期拘留,直到 1939 年夏天才允许他们返回东北。

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也于1938年2月经饶河县境越过乌苏里江。他是利用抗日联军第七军的关系和苏联的边防军接头的，第七军的队伍是从1934年起在饶河地区发展起来的，因为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早就有了相互间的来往。军参谋长崔石泉多次进入过苏联境内。但是交谈的内容多限于有关日伪军的情报方面。不过也可以从苏方得知一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国关内的抗日战争形势。周保中在崔石泉的引导下和苏联边防军的代表见了面，提出要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要求经过莫斯科发电报给延安；或者是去海参崴，设法到赤色职工国际太平洋秘书处找到斯达干诺夫，即杨春山。但是很快了解到杨春山已不在海参崴。苏联人以后又答复说莫斯科和延安之间联系不上，对此苏方表示颇为遗憾。

周保中此行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是由于他在莫斯科学习过两年多，能用俄语和苏联人对话，又有和苏联人交往的经验，因之苏联边防军的代表对周保中产生了信任感，表示愿意保持相互间的联系。苏联人为周保中配备了无线电台和报务员。除此之外，还将他们能够得到的中共中央的报纸和书籍，如《新华日报》、《论持久战》等给了周保中带回东北。从这时起，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边防军之间的关系才开始有了一点变化。

至于抗日联军的三个军长赵尚志、戴洪滨和祁致中，被苏方关押到1939年6月才准许他们返回东北。是什么原因促使苏联这样做呢？笔者估计可能有如下两个原因：一是苏方不知道东北抗日联军是共产党的队伍，对待几

位军长的口头陈述采取不信任的态度,将他们按非法越境者看待。二是苏联在1938年之内正在清党,远东军区司令员布留歇尔元帅是清理对象。赵尚志在去苏联之前,曾派第六军第二师师长陈绍滨先去苏联联系过,当时接待的苏方人员曾向陈绍滨表示过愿意接待抗日联军的军以上负责人。赵尚志是在得知有这样的许诺后才去苏联的。从时间上看,赵尚志进入苏联境内时正是苏联清党开始之后,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化。如果是原先许诺赵尚志入苏的有关人员当时已成为阶下囚的话,那么赵尚志等人的长期被关押,就是比较合理的解释了。

这样,在1938年之前,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边防军之间的关系,只是有个别人之间的联系,其目的只不过是相互交换有关日本关东军的情报而已。

后来,在1938年1939年的两年当中,苏联和日本之间关系上发生了一些变化。这就是哈桑湖地区和哈尔欣河地区的两次边境冲突。事件是由日本关东军挑起的,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苏联的试探行动。笔者认为出于这一原因而促使苏联方面在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1938年底,曾有两批为数不多的抗日联军队伍被迫分别于虎林地区和黑河地区进入苏联境内。苏方对他们只作了短期的拘留审查。当确信他们是抗日联军成员之后就将他们暂时保留在苏联境内。其中有些人经短期训练后被派回东北进行武装侦察活动。原抗联第三军的一个团长李铭顺就长期地带领着三五个人多次进入东北境内执行这样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们的工作直到1945年8月才告结束。

到了1939年夏季,苏联远东军事当局就释放了抗日联军的3个军长赵尚志、戴洪滨和祁致中,还将保留在苏联境内的抗联人员100余人合编为一支武装队伍,其中包括陈雷、于保合和李在德等人。苏联人向这支队伍宣布赵尚志为总司令,戴洪滨为参谋长兼总队长,祁致中为副官长。这支队伍返回东北境内之后第一仗攻打乌拉嘎金矿取得了胜利,还吸收了不少金矿工人入伍,队伍扩大到200多人。但是很快在攻打汤旺河七号桥时损失重大。同时派到绥滨活动的一支队伍也连之失利。到了年底,赵尚志身边人员又仅剩下了二三十人,无法坚持过冬,就重新越过边境进入苏联。这次不成功的军事行动颇使苏联人有些失望。

在同年9月,北满省委常委冯仲云在事先征得同意后也到了苏联,他这次受到了苏远东军代表的友好接待。他此行的目的,一是想知道一下长期被滞留在苏联的3个军长,即赵尚志、戴洪滨和祁致中的情况,他当时还不知道赵等已在6月间返回东北;二是想通过苏联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三是想借苏联的帮助和吉东省委及抗联第二路军的负责人周保中取得联系。因为在1938年遭受严重挫折之后的抗日联军继续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每逢冬季,连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苏联人对冯仲云的请求持积极态度并给予了协助,除了表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通讯联络尚未沟通并对此表示遗憾之外,为了寻找周保中,苏联人立即派出以李铭顺为首的侦察小分队进入东北,到宝清和依兰一带寻找。周保中11月到达苏联,12月赵尚志也到了苏联。就是在这样难得的机会下,

周保中和冯仲云、赵尚志作了长时间的交谈。

但是，很快又出现了意外的情况。在1940年的1月，北满省委通知在苏联的冯仲云，说省委第十次常委会已作出决定将赵尚志永远开除党籍。理由是赵尚志率队返回东北活动期间散布谣言说李兆麟、冯仲云和周保中等都是日本奸细，赵尚志还说北满省委以及三路军的其他几个负责人金策、张兰先、许高植等都有奸细嫌疑。赵尚志还企图以奸细罪名，捕杀上述人员。北满省委要求冯仲云将此情况转告苏方。周保中和冯仲云在和赵尚志谈到北满省委的决定时，赵尚志否认北满省委对他的指责。为此，周、冯二人和赵尚志花了较长的时间进行交谈。赵尚志虽有怨气，但也不得不接受周、冯对他的批评：如他的一贯的左倾观点，他对中共代表团的指示采取不应有的抵制态度，他的比较专横的工作作风以及经常以不负责任的态度胡说别人是奸细等。同时，赵对周保中和冯仲云也提出了许多批评。总之，三个人是完全以同志式的坦率态度毫无保留地进行着批评与自我批评，应该说是颇有效果的。经过这样的谈话之后，周保中和冯仲云各自给北满省委写了一封信，表示支持省委的决定，但建议把永远开除党籍的写法修改一下，去掉“永远”两个字。后来北满省委接受了这一建议。苏联人对3人会谈的情况也非常关心，并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由于赵尚志和北满省委的关系已经破裂，当苏联人征询周保中的意见，可否让赵尚志去第二路军任副总指挥时，周保中虽然也认为赵尚志是个难以与之合作的人，但是在衡量了多方面的利害关系之后同意了这一意见。

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在周保中的继续主持下,周、冯、赵3个人共同研究了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的领导机构问题、部队整编问题、武装斗争方针问题以及和苏联的工作关系问题。在领导机构上,酝酿了吉东与北满两个省委合并的可能性,也提出了第二路军和第三路军合并的设想;还希望在与东南满取得联系之后能建立起东北党的统一领导机构。关于部队的整编,鉴于兵员日益缩减,建议各个路军将自己的部队改编为几个支队,支队不设大队、中队。支队番号是:第一路军为一、四、七;第二路军为二、五、八;第三路军为三、六、九。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上,由于在1939年之内部队遭受的损失依然较大,决定今后应以保存实力为主,尽可能地使部队缩小目标,活动分散一些。

周保中和冯仲云还认为应该借此机会明确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关系。认为在当时无法取得我党中央的直接领导期间,应争取苏联边疆党委以及苏联远东军对中国的东北党组织以及抗日联军的指导关系。为此,苏方派出了联共远东边疆委员会书记伊万诺夫和远东军内务部长王新林为代表,与周保中、冯仲云、赵尚志等3人进行了会谈。同时苏方还决定伯力和双城子两个地区的部队负责人也列席会议,因为抗联人员穿越国境线的地区都在他们的管辖范围之内。会议确定了联共边疆党委和远东军司令部对中国东北党及抗日联军的指导关系,同时双方都声明这是在未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之前的临时措施,并且明确了苏方不干涉中共党的内部事务。除此之外,中苏双方还达成了一项君子协定,即

当抗联各部战斗失利或因其他原因而必须转移至苏联境内时，苏方应予接纳并提供生活上的方便条件。

这次周保中、冯仲云和赵尚志以及有苏方代表参加的会议，在抗联历史中称之为第一次伯力会议。在会议结束之后，赵尚志随同周保中经饶河，冯仲云则经黑河返回中国东北。

在1940年9月间，苏联远东军以其联系人王新林的名义给抗日联军一些领导人发出通知，内称：今年12月将召开东北党和游击队干部会议，将有中共中央代表参加此会。预定在此次会议上解决东北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有关的一切问题。各军事领导人、政治委员和党委书记要在12月前到伯力报到。被通知到会的有：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政治委员魏拯民，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第五军（尚未改为支队）军长柴世荣、政治委员季青，第二支队（原第七军）支队长王效明，北满省委书记金策，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政治委员冯仲云等人。

陆续接到上述通知的抗联领导人都喜出望外。盼望和党中央取得联系，是大家等待了几年的事情。因此，从11月到12月，各领导干部在自己部队的护送下，突破日伪军的围剿网，相继进入苏联境内。但是，杨靖宇已在1940年春季牺牲，魏拯民当时被日伪军围困在桦甸县牡丹岭的密营中。他和苏联人没有建立起无线电联系，无法得到通知。在长时间断粮之后于1941年春去世。在1940年的12月前后，第一路军仅有少数部队冲出敌人的包围并从晖春方向撤退至苏联境内，其中领导人有金日成、安

吉、徐哲、崔贤和朴德山(金一)等人。金日成、安吉和徐哲三人被指定为东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代表参加了第二次伯力会议。

当周保中和李兆麟等人到达伯力之后,苏联人才告知实际上并没有中共中央代表要来的事,因为当时苏联和延安之间依然没有联系。苏联人解释了他们的用心,他们认为这样的会议是非常需要召开的,考虑到中共党员的自尊心,认为只有用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才能把各位请来,希望大家谅解。

当时抗联同志虽对中央代表未来很失望,也对苏联人的做法不满。但是也认为能够有这样广泛代表性的领导干部在一起开这样一次会议很有必要,而且在冬季最险恶的环境中,使抗联队伍转移至苏联境内度过冬季也是有利的。不过,在会议的酝酿过程中,与会人员发现苏联人有一个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领导关系和斗争方针的新设想,他们的这些设想是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兄弟党之间关系原则利益的。

在尚未正式开会之前,苏方代表王新林先以个别交谈方式透露出自已的方案来试探我们的反应,他的谈话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东北抗日联军按目前这样的游击作战方式是难以维持长久的,这样的惨重损失是谁也无法经受的;②日本人的严密封锁隔离政策,使东北抗日联军无法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你们缺少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这是游击队屡次遭受挫折的原因,这种情况目前看不出有何转机;③抗日游击斗争的方式应更加小型化,以三五人的小分队单独行动的办法为主,但不是执行一般

的游击作战任务,而是以最隐蔽的方式执行武装侦察任务,广泛收集军事情报,为最后解放全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做长期准备工作;④由一名苏军人员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中国党东北的几个省委则不要再管抗日游击队的事情。

王新林所指出的抗联所处的环境,应该说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东北抗日联军在1938年之内,人数由3万余人锐减至5000人;到1939年年底,总人数可能还有2000人;而到1940年底,抗联撤退到苏联境内的加上仍然留在东北境内斗争的合计起来已不足1000人了。每年夏秋两个季节里可以打几次胜仗,增加一些兵员;但一到冬季又损失惨重。因此斗争方针确有重新研究的必要,第一次伯力会议虽说是提出了以保存实力为主,但是由于无法抵御敌人冬季的重点围剿,损失依然巨大。至于苏联人提出的要把抗联队伍全部改编为武装侦察小分队,虽然总的目标也是对日斗争,但是它改变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性质。同时侦察分队有它自己的特点,保密性强,派遣出去和返回必须是极端秘密的,而且又必须是经苏联人实现的,这种情况任何抗联领导人都无法插手,因此无法继续保持和保护抗日联军的行政管理系统。这样下去,有朝一日苏日战争爆发之后,在东北境内就不可能再出现一支东北抗日联军的队伍,在抗日联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也无法形成政治上的核心力量来领导东北人民的解放斗争。这将有损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如果再加上由苏联人担任抗日联军总司令,那显然是剥夺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自己的武装部队的领导权。让

省委和抗日联军分离开来,也是我们无法接受的。

在有关上述问题的个别交谈中,多数抗联同志都感觉到苏联人的意见是不能同意的。不过因为事关重大不便表态。只有苏联代表王新林找周保中交谈时,遇到了周保中的强烈反对。周同意王新林所说的东北抗日联军目前的损失过于惨重,因而必须在保存力量方面有些新的措施;但是抗日联军的性质不容改变,不能把它变成苏联人的情报工作队;由党指挥自己的军队是一项不可改变的原则,苏联如此,中国共产党也是同样,由苏方人员担任抗联总司令是不可取的,它违反了兄弟党之间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抗日队伍必须由中国党的省委领导。王新林仍然想说服周保中,两人甚至争吵起来,但周保中坚决提出,如果王新林一定要坚持己见的話,他只好带着自己的队伍返回东北战场,即使是死,自己也应该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枪口而倒下。王新林和周保中之间的谈话最后陷入了僵局。

与此同时,周保中也和其他抗联领导人普遍地交换了意见,他从理论上阐述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日本帝国主义者是中国和苏联的共同敌人,苏联支援东北抗日联军是在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抗日联军与苏联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来搜集日本关东军的情报也是在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但是,中国共产党必须是在独立自主的情况下进行反日游击战争,不能放弃我党的自主权。我们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但同时也是爱国主义者,我们决不能使东北的党组织和它的武装队伍都处于被取消状态。

在周保中的引导下,抗联的其他领导人取得了较为一致的认识,都说原来自己也感到苏联人的意见不对头,只是不能从道理上象周保中说得那样清楚。于是,在12月20日,他们以周保中和李兆麟二人名义,向王新林递交了一份书面声明,其大意是:按你们原来的通知有中共中央的代表参加我们的会议,如果是那样的话,将应由中共中央代表和你们来共同制定东北抗日联军今后的斗争方针,并确定我们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工作关系准则。在12月16日你们告知我们,没有中共中央代表前来。这样我们只能继续依照第一次伯力会议所制定的各项原则办事。也就是说,会议所要决定的,必须是由东北的党组织来进行讨论并加以批准才能有效。因为:第一、东北的抗日游击运动,不论其现在的情势如何,它依然是中国共产党整个革命斗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党领导游击运动,游击运动的一切问题必须由党组织决定。第二、东北抗日游击运动接受你的指导,这是在特殊的条件下的临时措施。第三、按照现实的环境,不论是为了加强中国的民族独立解放斗争,还是为了巩固苏联远东地区的边防而工作,东北抗联与苏联远东军之间的相互支援关系显然都是重要的。为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组织,必须依照中国共产党的战略和策略的一贯精神,做出自己的决定。因之,要求王新林作为会议召集人,必须对这次会议的性质、任务及范围作出明确的规定,并要求由我们东北党的领导干部和东北游击队领导干部先后开一次预备会议,集中讨论东北的全部问题。

这个声明实际上是对王新林想要直接把东北的抗日

游击队控制在自己手中的意见最明确的反驳。而当时参与这一工作的其他几个苏联人都感到周保中的意见有高度的原则性；并且表示支持周保中，致使王新林陷于孤立。苏联远东军也很快作出决定，由另一位负责人接替王新林的工作。但是为了工作上的方便，仍然沿用王新林这样一个中国姓名作为代号。这后一个王新林和原先的王新林有明显的不同，他表示同意由中国同志自己首先开会研究自己需要研究的问题，尔后再和苏联同志共同协商双方有关的问题。

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二次伯力会议在1940年的12月下旬至翌年1月上旬举行。会议的参加者，有北满省委和抗联第三路军的李兆麟、冯仲云和金策；吉东省委和第二路军的周保中、季青、王效明、崔石泉和柴世荣；东南满省委和第一路军的金日成、安吉和徐哲，共11人。原来按王新林的通知应有赵尚志到会，但是在1940年赵尚志在第二路军担任副总指挥期间又进行了许多反对周保中和李兆麟的宣传活动，而且工作上毫无建树，因此没有人赞成他参加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在与会者广泛交换意见之后，逐步形成了以下几点共识：①此次会议的性质是全东北党的会议；②会议一致同意第一次伯力会议所决定的几个问题和那次会议所规定的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边疆党以及远东军之间关系的几条原则；也一致同意以周保中和李兆麟两人名义致苏方王新林的声明信；③提出了一项为统一东北党和抗日联军领导机构的建议报请我党中央批准。

在会议的结束阶段，新的王新林被邀请参加了会议，

由周保中向王新林介绍了会议中所研究的几个重要的内容以及大家的共同意见。王新林表示完全支持中国同志的决定,同时他代表苏联远东军声明:他们将依然遵照第一次伯力会议所确定的原则行事,即: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指导关系只是临时采取的必要措施,而这样的指导关系又必须是在不干涉中共党的内部事务的原则下进行。这样,这次会议便圆满地结束了。

从这次会议之后,东北抗日联军和苏联远东军之间的互相支持与合作的关系一直是很好的。在1941年的三四月间,他们同意了抗联作出的重返东北战场的决定,并用日式轻武器和日军军装把游击队员装备起来,分批通过黑龙江和乌苏里江进入中国国内。但是在4月13日,苏联政府公布了苏日中立条约,苏联远东军立即通知了抗联部队停止行动。他们认为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希望抗联同志理解他们的决定。这样,周保中和冯仲云(李兆麟已在此之前率队返回东北)来到北野营和抗联同志共同研究了这一情况,大家认为应该尊重苏联的这一措施,并动员大家扭转思想,准备在苏联境内长期整训,待机再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突然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周保中和王新林立即研究了这一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配合希特勒在远东入侵苏联,为此做出决定,抗联人员要加强进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术和技术训练,除轻武器使用外,爆破、军用地图的使用,游泳等训练时间都增加了。此外还在7月以一个月的时间集中在伯力郊外进行了空中跳伞训练,参加此次训练的有200余人,其中包括20多名女同志。

此后,为了不断取得日本关东军的情报,抗联和苏联远东军共同成立了 15 个战略侦察小分队,他们经常地被派到东北的腹地,以获取飞机场、铁路和公路桥梁、铁路和公路运输枢纽兵营、要塞工事等目标的情报。这 15 个小分队,一部分归远东军情报部直接掌握,一部分由野营临时派遣。这一工作颇有成效,一直到 1945 年 8 月底才告结束。

到了 1942 年的 8 月 1 日,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正式成立。设旅、营、连三级,军政主官都由抗联人员担任,另由苏联军官担任副职,以协助进行军事训练。为了保密,也为了有正常的供应渠道,由苏联最高统帅部授予教导旅以苏联远东红旗军第八十八旅番号。武器装备和物资供应同苏军完全相同。抗联干部都佩带相应军衔,领取与苏联军官相等的薪金。

与此同时,组成了抗联教导旅中国共产党委员会,与苏联共产党的党委会并存于旅内。这些措施,都是苏联远东军为了保证抗联领导人对抗联人员的领导权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的具体表现。从 1942 年 8 月到 1945 年 8 月,在苏联军官的直接帮助下,抗日联军的指战员军事素质和政治水平都有很大的提高。

1945 年 5 月,苏联远东军情报部长索尔金少将(王新林)向周保中旅长传达了远东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大将的指示,大意是:预定在最近几个月之内将有一场苏联对日本的战争。这场战争将会是历时较久的和相当残酷的。八十八旅将编入远东第二方面军的战斗序列。此外,还将有两个方面军的兵力参战。在战争的进程中,八十八旅应

逐步扩大自己的队伍，建立起一支为数达十万人的正规部队。进入东北境内之后，八十八旅准备沿松花江两岸西进，初步预定将参加解放佳木斯市这一战役。

紧跟着，15个侦察小分队受周保中和王新林之命加紧活动。8月初，从八十八旅抽出一部分官兵，其中有些被派到第二方面军第一线部队担任翻译和响导；有些被编入第一方面军的空降敌后战斗队，在对日宣战之后立即于8月9日、10日夜伞降到牡丹江以西和以北的海林和林口地区，其中有些在空降作战中光荣献身。

8月9日宣战之后，第二方面军司令部立即派出一只运输舰来到八十八旅驻地黑龙江岸边，准备将教导旅输送到东北境内，在同江和富锦地区上岸投入战斗。但由于战争形势出乎人们预料地急转直下，将八十八旅集中使用于佳木斯地区的方案已不相适应了。苏军远东战线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元帅认为应该使用这批抗日联军指战员协助苏军执行在全东北境内的军事占领任务，同时也在考虑当北朝鲜解放之后将抗日联军中的所有朝鲜同志使用于三八线以北地区的问题。8月26日，苏军远东战线总司令部军事委员会希金中将召见周保中旅长，向他传达了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决定：八十八旅所有的抗联成员中的中国人和朝鲜人要分别行动；中国同志要随同苏军的三个方面军分别占领东北各战略要点，其中的主要负责人将被指定为当地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副司令职务；朝鲜同志将随同苏军进入朝鲜半岛北部，并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武装部队和政权机构；在东北境内各苏军卫戍司令部工作的抗联人员的任务是：协助苏军维持占领区

的革命秩序,利用自己的合法地位重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群众工作,在苏军主要占领区之外建立人民武装和根据地。

在希金中将讲完上述几点之后,周保中表示他完全赞成华西列夫斯基元帅的决定,所有抗联干部将会坚决完成这些任务的。周保中还说:估计我们党中央将会派八路军和成批的党员干部进入东北,我们要准备迎接他们;但也有可能由于国民党的力量较强,八路军会因此受阻不能进入东北,而国民党又取得了对东北的统治权;这样的话,抗联人员将不得不重新上山打游击和国民党作长期斗争。希金中将说:他完全赞同周保中的意见,如果今后有需要的话,苏联会随时伸出援助之手的。希金中将还说,远东军总司令部已准予八十八旅中的一批优秀士官晋升为少尉;同时还为全部军官授勋章,大尉以上军官将被授予苏联红旗勋章,上尉以下军官将被授予苏联红星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八十八旅工作期间的成绩,周保中对此表示感谢。

8月27日,周保中到远东第二方面军司令员普尔卡耶夫大将的住地,同他商谈了抗联人员返回东北的编组方案以及分批进入东北的日程安排,并取得了一致意见。

8月30日前,授衔和授勋仪式进行完毕。

9月1日至10日,苏军分别用飞机和火车将各组抗联人员输送至长春、沈阳、哈尔滨、大连、齐齐哈尔、吉林、牡丹江、佳木斯、延吉、绥化和海伦等地,抗联人员一共进入大中城市以及重要县城57个要点,并立即参加了苏军卫戍司令部的工作。

9月中旬,八路军进入沈阳地区,与在苏军司令部工作的抗联同志取得联系,并和苏军开始接触。苏军根据军事占领期的规定,告知中国同志:中国的正规军队不能停留在占领区之内。但在通过协商之后,在苏军的默许下,由抗日联军干部和八路军、新四军共同组建了若干支地区性人民自治军。到了10月底,人民自治军已遍布于东北各地,并从苏军手中取得了大量的日军武器装备,部队迅速地发展壮大。

9月中旬,由党中央派出的东北局部分领导人员乘苏联派出的飞机从延安飞抵沈阳。从此,东北的党组织和党中央之间的中断了8年之久的关系,终于恢复。为此,原东北党委会书记周保中宣布:分散在各地由抗联人员所组建起来的共产党组织机构将陆续移交给新组建起来的省委、地委和县委。这一工作完成之后,原东北党委会的职能将自行停止。

1945年12月,在东北主持工作的苏联元帅马林诺夫斯基向周保中告知了苏军的撤军时间表。据此,周保中向所有抗联同志发出通报,要求他们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使人民自治军在苏联撤退的同时立即接管驻地;抗联人员也在此时宣布脱离苏军关系。这一工作,直到1946年的4月下旬全部顺利完成。至此,东北抗日联军与苏联远东军长达7年之久的相互支持与协作关系,由于已经胜利地完成了这一时期的历史使命,即消灭日本关东军和解放全东北的任务,而光荣地结束。

从延安到哈尔滨

——回忆党中央先遣组派往东北

钟子云

抗日战争胜利至今已 50 周年了。每每想起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我国人民欢欣鼓舞，以及奉党中央命令去东北遇到的艰险，工作遇到的严重困难及斗争复杂的情景，总是激动不已。

1944 年 7 月，我由晋察冀边区分局社会部被调往冀热辽区党委任社会部长兼行署公安科长。当年 10 月中旬我和几个战友到冀东杨家铺活动时，在那里遭到日寇“扫荡”队的包围，我在战斗中负了重伤。于 1945 年 3 月被转移到晋察冀边区治疗，6 月中旬回到延安。又过了两个多月，到“八·一五”时，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这时党中央正准备向东北派干部。

1945 年 8 月 28 日，毛主席去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我也参加了到飞机场为毛主席送行的活动。过了三天，党中央决定派陈郁、孔原和我三个人先去东北。这是第一批由延安派往东北的干部。因毛主席此时不在延安，由刘少奇同志代理主席。他找我们谈话时交给的任务是：到东北后，首先要与苏联红军取得联系，提出对他们的希望和要

求,看能够给我们哪些帮助,而后就抓紧建立军队和地方政权。为了便于和苏联红军交往,临出发前,给我们三人写了介绍信,说明我们为中共中央代表和八路军总部少将参议。文件是由刘少奇同志和朱德总司令分别签署的。我们就带着这封介绍信和有关证件出发了。

稍休整,北上哈尔滨

我们到沈阳后,才知彭真、陈云同志已先到达了。他们住在原张作霖的“大帅府”,我在那里住了一星期。彭真、陈云同志召集我们谈了话,并分配了任务,决定把陈郁、孔原同志留沈阳,孔原到抚顺市当市委书记,我带领由张家口来的十几名干部乘火车去哈尔滨。

哈尔滨,它是我国北方新兴的大城市。到本世纪初,它已成为我国东北地区著名的水陆交通枢纽和物资集散地,又是松花江上的重要港口。长期以来,日、俄、英、美、德、法等帝国主义列强把哈尔滨当作争夺和角逐的市场。这里曾聚集过33个国家的十几万侨民,设立过24个国家领事馆,以及一些间谍机构。外国资本家在哈市开设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等数以千计,国外向哈市输入的资本也多达几亿元。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涌入东北。日资的商社、银行、公司、洋行以及会社、组合等经济组织很快控制了哈市的经济命脉。他们对全市的私人工商业,按行业性质加以组合,使之为其侵略战争的需要而进行加工订货;并实行统购包销,低价强购产品的掠

夺政策；使哈市许多民族工商资本家破产，使那里的人民生活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接收、解放和巩固哈尔滨，这无论对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和交通运输上巩固北满、西满、东满根据地，还是在军事上运输物资、调动部队以及以物质力量支援前线方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且它还是我军具有强大力量的标志，对我北满、西满、东满等根据地广大军民将起着巨大的精神鼓舞作用。

见苏联红军，在“军管”中开展工作

1945年10月初，也就是我们由延安出发后大约一个月，我们到达哈尔滨。因30年代我曾在这里做过六年地下工作，这次重回故地，格外高兴。我们很快找到了李兆麟同志。当时，哈尔滨有个“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其中的成员有的是过去的地下党员被捕从狱中放出来的；有的是从韩光同志所领导的东北党组织及其它根据地党组织派来做地下工作的；也有的是从我们的情报系统派来的；还有的是由苏联情报部门派来的。这个临时省委是他们在苏联红军刚进哈尔滨时，在“东光寮”（原日特公寓）组建的。当他们知道彭真、陈云同志到了沈阳后，便派周维斌、张观去汇报情况，陈云同志代表东北局接见了他们，指示他们要在李兆麟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他们回去几天后，我们就赶到了哈尔滨。由于这个“北满临时省委”的成立未经过上级党委批准，所以，我们到哈市后，就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把它撤消了，并重新成立了中共滨江地区

工作委员会。这个工委管辖的范围包括滨江省所属的 14 个县和哈尔滨市。工委委员除李兆麟和我以外，还有张观、张罗、周维斌等原“北满临时省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工委会由我任书记。和我一起从张家口来的几位同志则参加了哈尔滨市的工作，其中有王建中等同志。

滨江地区工委成立后，发表了宣言，颁布了各项方针政策，如：没收敌人财产，清除敌伪残余，改善职工生活，恢复生产，保护工商业等。这既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扩大了党的影响，也安定了民心和社会秩序。这时的哈尔滨为特别市，已有人口近 70 万。

苏联红军进入哈尔滨的初期，曾委派李兆麟同志任滨江省副省长，原滨江省伪民政厅长谢雨琴被留用任省长。苏联红军热情地支持我们工作，我们就利用这个时机抓军队建设。10 月 14 日，由李兆麟同志出面以滨江省政府的名义宣布成立由我们党领导的哈尔滨市保安总队。总队部设在哈市南岗原第三中学。王建中任总局长，我是哈市市委书记兼政委，刘铁南任政治部主任。这个保安总队以原由“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组织的“吉、黑人民秋收自卫队”为基础，经过整顿后，对其中的 400 多名来自旧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和失业工人进行了集训。由王建中等同志负责向他们宣讲我军的优良传统作风、战术和纪律。然后以他们为骨干，并派出一批干部，深入群众动员参军，使保安部队很快发展到 3500 多人。这是我们初到哈尔滨时，在既无党领导的老部队又缺少干部的特殊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的一种建军办法。

不久，党中央为东北调去的 10 多万部队、2 万多名干

部和 21 名(或 22 名)党中央委员陆续到达。分配到哈尔滨市的 400 多名干部多数被派到各县宣传群众,发展武装。其中有 40 多名干部派到各县去宣传群众,发展武装。还有 40 多名营连级干部充实到市保安总队,成为我党在总队中的骨干力量,这时,刘子奇任保安总队长,王建中任政委,齐渭川任政治部主任,吕天任参谋长。由于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关心和支援,保安总队很快发展到 5000 多人,分设五个大队,每个大队约 1000 人左右,其影响也不断扩大。

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在抓党的建设、军队建设的同时,还抓了人民政权的建设,接收了哈尔滨周围 14 个县的政权,成立了哈东、哈西、哈北、哈南四个专署和党的地区委员会。

哈北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设在呼兰。地委书记李建平、专员钟声、军分区司令员谭友林;

哈西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设在肇东。地委书记王建中、专员王效明、军分区司令员汪奎先;

哈东地委、专署和军分区设在阿城。地委书记陈达、专员何延川、王景侠,军分区司令员温玉成;

哈南地委、专署设在双城。以后又成立了军分区。

1945 年 11 月中旬,陈云同志带领张秀山等同志从长春来到哈尔滨,撤消了滨江地区工委,重新组建了松江省委和松江省军区。张秀山任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我任省委副书记兼军区副政委,聂鹤亭任省军区政治委员。省委的成员中,先后担任组织部长的是李华生、陈达;先后担任宣传部长的是李海涛、李建平和于林;而由邹向轩任

秘书长。

与此同时，又组建了中共北满分局和哈尔滨市委。北满分局的书记是陈云，委员有张秀山、李兆麟，刘达任秘书。

苏联红军把政权交给国民党

就在我们的各项工作全面展开和进行很顺利之时，驻哈地区苏联红军的领导突然提出：让我们的军队和公开的党、军领导机关马上退出哈尔滨市，准备把政权交给国民党接收。

当时苏联红军驻在哈尔滨的部队是远东红旗第一军。他们有个军事委员会，其中的有一位专职的军事委员叫斯莫林科夫，少将军衔（相当政治委员），负责政治工作和军事委员会的全面工作，因他们实行了军管，所以我们所有的工作，特别是一些重大决策都要通过斯莫林科夫的同意。比如，我们要到哪个地方接收政权、怎样建军、设什么机构等都要事先与他们商量好。请他们通知所在地区的红军部队。在我们刚进哈市时，一无所有，从住房、烧柴到吃饭，就是安部电话机这样的事，也都得依靠他们帮助才能解决。

当苏联红军叫我们退出哈尔滨时，斯莫林科夫说：你们要准备好，尽快把哈尔滨交给国民党政府。哈尔滨市要出哈尔滨日报，你们的党群干部可以留下。工会、青年团、妇女会地方群众工作也仍由你们负责。只是把你们穿军装的部队和大的党、军机关撤出到外县去剿匪、锄奸、做

群众工作、建立革命根据地。我们暂在这里保护和帮助你们做群众工作。我向陈云、张秀山等同志如实转达了苏军的要求。有些同志思想不通，说什么也不愿退出哈尔滨。我们为不退出哈市的问题曾连续多次去找斯莫林科夫，他因没办法答复，也就不再出面接待我们了。因为很多干部想不通，不愿撤离哈尔滨，于是就请陈云同志出面找红军领导商谈这个问题。最后决定由我陪陈云同志去找苏联红军领导。我们去红旗一军找斯莫林科夫，他没接见，只叫卫戍区司令官卡扎科夫中将来接待我们。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奉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命令来的，不能退出这个城市。围绕这个问题讲了很长时间。开始时，卡扎科夫还比较客气。谈着谈着，他态度严肃强硬起来说：这个地方的政权是我们苏联红军的。你们退也得退，不退也得退。这是我们上级的命令，必须在11月23日退出哈尔滨市。从此以后，我们再不坚持说不退了。

回来后，我们根据苏军的要求，立即研究退出哈尔滨市的部署。决定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撤到哈市东面约五十华里的宾县。哈尔滨市的保安总队大部撤到哈市西约百公里的“三肇”即肇东、肇州和肇源。其司令部住在肇东县昌五镇的一座道德会院内。在当年11月22日晚上，我们的各个机关和部队全部撤出哈尔滨。这时保安部队中虽有一些是从老八路来的骨干，如刘子奇等，但部队的基础比较弱，成员较复杂，有些人是散兵游勇，也有混进来的国民党的地下军。为了避免在撤退中发生问题，在撤退的前一天晚上，临时召开了营连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共约有200人参加。在会场上对不可靠的分子采取了

果断措施,并说明愿去者欢迎,不愿去者不勉强。经过做动员说明工作,绝大多数人都表示愿意跟我们部队一起撤走,少数不去的即被清洗了。由于11月22日晚上组织得很好,部队撤离的很顺利也很快。

保安总队部和三个大队撤到“三肇”后,“三肇”军分区、地委和专员公署也很快分别成立起来。随后,陈云同志同北满分局、松江省委、省军区及一个保安大队和朝鲜人大队随北满分局和松江省委也撤离了哈尔滨。我暂时留在哈尔滨市继续工作,因城里还剩下一批干部,便又重新组织了哈尔滨市委。因为国民党还未派人来接收哈尔滨,所以,我们的公安局长也留下来和苏联红军一起维持城市的社会秩序,我们的工会、青年、妇联等群众组织也留下来继续做群众工作。

在这一时局变动中,在一些干部和地方部队中发生了思想动荡,各地方的保安队中也有一些人相继叛变。我们不久前派往各县的少数干部,有些被叛军打伤,有的牺牲了。在苇河当县委书记的张林同志就被打瞎了眼睛。

当我们的军队和主要机关撤出哈尔滨后,苏联红军把这一情况通告了国民党中央政府,要求他们派人来接收。因为当时的津浦铁路,以及从北平、天津到沈阳的铁路不通,由沈阳到长春至哈尔滨铁路沿线又都驻有大批八路军,所以,国民党的军队通过铁路运输来不了。他们便要求苏军缓期撤退(苏军应允缓期三个月),同时要求苏军协助他们从空中运送两个旅的兵力来接收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对此,苏军未答应。后来,国民党方面再三要求能否少运一些,苏军决定允许他们空运100名“接收大

员”和 300 人的警卫武装。

1945 年 12 月下旬,国民党从关内空运来 100 名“接收大员”和 300 名保安队员后,苏军就把省、市政权交给了他们。这时,哈尔滨市市长张庭阁、市公安局局长周维斌都辞职了;谢雨琴和李兆麟也辞去了省长和副省长的职务,把政权交给了国民党。国民党派来的保安队驻扎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原第一中学里。因他们来的人很少,怕出事,整天龟缩在“一中”里面不敢出来。那些国民党“接收大员”一旦有外出活动,都得通过苏联红军安排,并保护他们的安全。他们虽然也有乌七八糟的“地下组织”、“地下军”等,如国民党市党部、三青团及公开半公开的军统和 CC 等特务组织,但苏联红军早已明文规定不允许他们公开活动。如国民党军统局驻哈特派少将组长张勃生等即是由赵纯同志带领红军去逮捕的。这样一来,他们在市内或外围没有实际的势力,手中又缺少武装,所以不敢大胆妄为。

老八路来到局面大改观,从此走上新阶段

1945 年 11 月 23 日以后,在各地临时组织的保安队,虽然有些人叛变了,但由于关内的老八路部队陆续赶到北满,在苏联红军的协助下,又及时地发动了广大农民群众清算分田等,很快把那些叛变武装镇压下去,扭转了混乱局面,恢复了革命新秩序。从此,我们就全力以赴地组建自己的军队,发动群众进行反清算、土地改革、清剿土匪等项斗争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这时,便以关内来的

部队为基础进行扩编，原来的一个班排老兵，扩编为一个连或营。为更快地发展武装，壮大全省革命武装力量，我们也按原来的营团编制，成建制的将骨干调给各军分区，然后扩编成几个营团，形成一个军分区强有力的整体武装力量。我们全省的部队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有了自己的军队，各项工作就好开展了。

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军队一直驻守在哈尔滨周围，管理着松江省的14个县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红军仍对我们很支持。不但供应生活用品，还提供武器弹药。把过去日寇的军火仓库打开，利用晚上派各种车辆把枪支弹药源源不断地送给我们。使我们军队的装备得到了很大改善。当我今天回忆这些情况时，对苏联红军的国际主义援助，仍充满感激和怀念的心情。从1945年底国民党派人接收松江省和哈尔滨市，到1946年4月27日苏联红军全部撤走，在四个多月里，国民党只是接收了政府机关里的一套虚设机构，和一座省政府办公大楼。外县的各级政权机构，他们一个也没能接收，一直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在苏联红军撤走时，那些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和近300人的武装也呆不下去了，他们都卷起铺盖卷随红军绕道苏联而返回了国民党统治区，而我们的主要党政机关同志和部队的同志却于4月28日浩浩荡荡、兴高采烈地返回了哈尔滨。从此，松江省和哈尔滨市的革命和建设又走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

徐其富 迟生 董家义

1950年2月17日毛主席、周总理在出访苏联期间，除同斯大林讨论了中苏双方有关的政治和经济问题外，还商定将苏联关押的在我国犯有战争罪行的一千多名日、伪战犯全部移交给我国，由我们作为主权国家自行审判。于是，中央决定成立东北抚顺战犯管理所，委托司法部负责接受战犯等工作，并命令东北公安军负责执行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的任务。

(一)

1950年7月间，东北公安军司令部把押解和看押“日、伪”战犯的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安五十三团，当时我们几个团领导干部感到任务突而艰巨思想压力很大。特别是周总理明确指示我们要不折不扣按照中央指示精神做，百分之百的完成好任务不允许出一丁点差错。我们想，这是一项政治性很强的任务，做到“不跑一个”没有什么问题，要求“一个不死”就难了。我们一些同日军作过战的老同志都知道，因日军长期受军国主义教育，讲究武士精神，其骨干分子一心孝忠天皇，一旦绝望常常就来个玉碎（自杀）。这些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犯人，最后

一旦获知将被移交中国人民审判时,如果进行卧轨、撞火车……以死殉国顽抗,谁能阻止得了呢!再说,这些日、伪战犯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了14年,犯下了滔天大罪,是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人民群众发现他们被押解回来,不声不响的组织起来,强行把他们抢去,碎尸万段,向他们讨还血债,我们怎么能制止得了呢!然而我们又一想,这是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只有想办法尽心尽力去完成,不能讲任何客观条件。于是我们细致地进行了研究。记得当时执行这项任务的主导思想是:内紧外松,绝对保密,不使战犯发生错觉,不让群众知道情况。同时制定了执勤方案,命令三营十一连执行押解任务。为有足够的兵力严密监视战犯的行动,防止他们逃跑、行凶、自杀和其他突然情况的发生,并命令从十连抽调出几十名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的老同志,配属十一连共同完成任务。为隔绝战犯同外界联系,途中不被群众发现,押解战犯的列车上的玻璃窗都贴上纸。为方便哨兵处理情况,车门上的钥匙全部取掉。为不走漏消息,这次任务的具体情况不向部队传达。

几天后,我们奉命从沈阳出发,干部战士总共230多人。所带武器,几乎全部是缴获日军的三八式步枪和歪把机枪,还有掷弹筒、手榴弹和枪榴弹。部队出发之前,我们作了简单的动员,只讲了到我国北方执行一次特殊性的任务,不允许打听,不要乱猜疑,一切行动听指挥。谁违犯了纪律处分谁,谁完成任务好嘉奖谁。部队上火车后,列车中途除了上水停车外,一直向北开。列车快到长春时,我们把排以上干部叫到一个车厢里,向他们传达了上级

的命令和要求,讲明了我们执行这次任务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设想了可能遇到的困难和发生的问题,要求干部和共产党员以身作则,模范遵守纪律,圆满完成任务。

列车奔驰了一天多的时间,到达了我国黑龙江北部绥芬河车站。部队下车后,住进了车站几间简陋的小平房里,执行这次接收战犯任务的公安部门有关领导和刚组建的抚顺战犯管理所部分工作人员,也和我们同车到达了绥芬河车站,他们和我们穿得是一样佩带公安军盾牌臂章的军服,我们互相及时取得了联系,共同研究了接收和押解战犯的有关事宜。

大约过了五六天的时间,18日早晨,从苏联境内开过来一列数十节有盖的特殊货车,车厢周围、车厢与车厢连接处,都用木板铺成一条狭窄的通道,列车从头至尾每一节车厢顶部拉了好多条电话线。一看便知,这就是押运战犯的列车。

我们接着制订的执勤方案,早已做好了接车准备。站里站外都派了哨兵警戒,并用两个排的兵力现场接收战犯。列车到站停下不一会儿,从第一节车厢里下来几个指挥官和几名士兵,随后各车厢里的哨兵也都先后下了车。这时,我方负责接收战犯的领导和有关人员走上前去,经过翻译双方进行了约20分钟的磋商,苏方一个佩带少将肩章的军官站了出来,对着列车上的战犯,大声地讲了一阵话之后,士兵们便立即上前分别把各节车厢门锁打开,战犯一个接一个走下车来,战战兢兢地排队站在一边。他们一个个汗流浹背,面容憔悴,满脸胡须,浑身肮脏。下车后,他们东张西望,双目发出惊异的光芒。由此可想,他们

心里是万分恐惧,好象大祸就要落在头上。这时,我们的哨兵威严地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布在列车的周围。战犯下车排好队后,苏方一名校级军官拿着名册呼点。被呼点到的战犯,一个接一个应声向前走几步站好。紧接着我方拿着他们移交的名册,再次呼点后,由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前面带领,顺着我哨兵组成的两道人墙中间通过上车。我们在每节车厢连接处设半个班的兵力进行看押,列车周围也布满了岗哨。并通过翻译,向战犯宣告不准他们打开窗向外张望;不准他们大声喧哗走动;上厕所要经管教干部带领。交接工作非常顺利,大约两个多小时就全部完成了。

我们负责押解战犯的机动分队,分别坐在前后的两节车厢里,随时准备调用。这时车站亮起了灯光,列车缓缓启动,很快进入了夜间行车。战犯一个个疲惫得东倒西歪地打盹,年龄大,体弱的经看守员准许躺在座位底下睡着了,各自发出不同的鼾声。哨兵透过车厢里的灯光,目不转睛地注视战犯的举动。一路上,他们有的强装喜悦,有的故作镇静,有的心怀狐疑。列车在行驶途中,突然传来了“长春车站到了”的广播声,一些懂得中国话的战犯纷纷从车窗缝向外张望,车厢里一时骚动,看守人员立即制止,我们也做好了应付一切特殊情况的准备。战犯感到他们违犯了规定,又都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之后,为了躲开在车站同客车相会,避免外界对战犯造成的影响,列车走走停停,21日早晨3点才到达目的地——抚顺车站。

列车一进站,接管看押战犯的部队就把车站围得十分严密,制高点还架上了机枪。列车停稳后,战犯拿着自

己的行李由看守人员带领下车。老弱病残的乘卡车,大部分年轻体健的步行,经过一条两旁都布设哨兵的街道,来到战犯管理所。我们胜利完成了押解战犯的任务,这时心里觉得非常轻松,身体却感到十分劳累。

(二)

战犯管理所,位于抚顺浑河北岸的高尔山下,占地面积约为两万平方米,是由一座旧监狱改建的。1936年日本侵略者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在这里修了一座监狱。我无数抗日英雄和爱国志士牺牲在狱中。战犯管理所担负看押任务的是我们二营五连和八连,在即将接受任务之前,部队做了明确分工和演练。五连负责所内,监狱走廊和院里,昼夜设有固定哨和游动哨。八连负责所外,四个岗楼设有哨兵不断观察,并有机枪值班。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墙外昼夜派出巡逻小组,风雨无阻地进行巡逻。

战犯入所后,看到逃跑无路,并将长期被关押,便现出反动的面孔,有的戴上了战斗帽,有的穿上了将校服,有的佩带上了军衔领章,一个个气势汹汹,骄横顽固,胡说什么“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必须无条件将我们释放”,“日本国小人口多,向外扩张是正当的”,“日本大和民族是优等民族,有义务指导劣等民族”,“战败不是日本军队不强,是战线太长,战略不当造成的结果”等等。我们哨兵强行制止,向他们发出警告,要他们遵守监规,低头认罪。他们不但不听,反而更加嚣张,甚至对我哨兵进行辱骂。于是我们把几个带头闹监的关进了小号隔离反省,

派哨兵单独看守,限其自由。他们毕竟是中国人民的阶下囚,色厉内荏,害怕严重违犯监规,造成不堪设想的后果。就这样,那些嚣张一时的战犯,抱头呜呜地哭起来。

监舍平静下来,带头闹事的战犯得到了制裁。可是我们军营里的同志却想不通,认为战犯这样猖狂,为什么不给他们用大刑,让他们明白明白中国人民的厉害;甚至有人主张战犯闹监,拉出去枪毙几个,以显示我们的国威和军威。还有的打报告要求调走,说过去受日本人的欺,现在又受日本人的气。

面对部队的思想情况和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们团营两级领导决定分批分期组织干部战士进行政治学习,提高大家思想认识。在学习动员会上,团领导讲了我们对战犯的政策主要是改造他们,不是消灭他们;要消灭的是他们的反动思想,而不是他们的肉体。这样做不是我们软弱,而是说明我们强大,过去在战场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惧怕过他们,今天我们把他们抓住关进监狱,反倒惧怕他们不成!要消灭他们只是几分钟的事情,要改造他们。使他们转变立场、观点、低头认罪,却是件不容易的事情,我们现在就是要完成这样一件不容易完成的事情。在讨论中,同志们认识到这些战犯的反动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他们长期受日本军阀教育,骄傲自尊,迷信天皇和鬼神,敌视中国人民,要使他们觉悟,恢复良知,是要有个过程。

但没过多久,战犯又闹了起来,拒不吃粗粮,把高粱米饭倒掉,扬言不给细粮吃就绝食。几天后,他们的伙食真的改善了。日本战犯按将、校、尉,伪满战犯按大臣省长、县团和其他人员,分别吃小灶、中灶、大灶,主食一律

大米和面粉，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了部队生活水平。干部战士看到这种情况后，又闹起思想情绪来，有的发牢骚讲怪话，说什么“给敌人吃好的，自己吃差的，真是古今中外奇闻”。思想不通，自然行动就要有所表现，上岗对战犯瞪眼咬牙切齿，下岗摔枪，气不打一处来，违背了对待战犯不打不骂、不歧视、不虐待、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一些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说出了这样做是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对他们实行人道主义，是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同志们知道是周总理指示后，都感到自己目光短、想得近，端正了思想，看押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

(三)

1950年6月间，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侵朝战争，战火迅速向我国东北边境鸭绿江烧来，到了八九月间局势相当紧张，这时战犯又闹起来了。他们故伎重演，破坏监规，抗拒改造，幻想美军尽快打进中国境内，把他们从管理所营救出去。每天报纸一来，他们争先恐后阅读有关报道朝鲜战场一些消息，然后凑一起，眉飞色舞分析形势的发展，用不流利的中国话挑衅地对我哨兵说什么“过去日本都被美国打败了，现在朝鲜顶不住，你们中国也不行”。我们的哨兵进行制止，他们骄横傲慢地一阵冷笑，好象他们就是胜利者似的。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我们和管理所对战犯都采取了相应措施，增加了固定哨，加强了游动哨，对战犯严密监视。围墙电网昼夜放电，以防外面窃狱。管理所利用广播加强了宣传，对战犯进行形势教育。当他们听到“美帝

国主义是一只纸老虎”，“北朝鲜人民必胜”，“美帝国主义注定失败”的话语，有的战犯用棉花团堵上耳朵拒听，有的抱着讥笑的态度，公然说我们的宣传胡说八道，是欺人之谈。有一次我们同管理所组织防空演习（事先没说明），他们真的以为美国飞机来了，又惊又喜，惊的是怕在这紧急关头我们实施民族报复手段，喜的是美国空军来搭救他们，马上可以获得自由了。后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又都垂头丧气不吭声了。

由于朝鲜战场形势的不断变化，在我志愿军出国参战的前夕，周总理命令战犯管理所北迁。于是我们在10月18日和19日，将战犯分成两批全部转移到当时的松江省哈尔滨市。出发前，我们召开了紧急会议，传达了上级命令，并同管理所领导一起作出了押解战犯实施方案。当时怕引起战犯误解发生问题，事先由所长通过广播，告诉他们这次北迁是为了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等形势好转后我们还迁回来。战犯听了议论纷纷，公开要求我们无条件地释放他们，不然将来他们要到联合国那里控告我们。有的怀疑北迁是假，秘密处决是真，吓得胆战心惊。我们按着押解方案要求，不动声色，不给他们造成错觉。一路上他们虽然不住地观察我们的动向，而我们一切都同平时一样，他们才逐渐放下心来，顺利地到达了哈尔滨。到达哈尔滨后，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里监狱，校级以下的战犯大部分关押在呼兰县监狱，伪满战犯则关押在道外景阳街看守所。战犯一关进监舍，食堂就给他们送去了热菜热饭，而我们执行押解任务、一路辛苦的干部战士，很晚很晚才吃上饭。

10月25日,我国政府庄严声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参战。战犯一听到这一消息,高兴地得意忘形。说这下好了。他们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若同美英为首的联合国军较量,好比“鸡蛋碰石头,自取灭亡”。他们认为时机已到,在狱中大闹特闹。呼反动口号,唱反动歌曲,遥拜天皇,绘制日本国旗,联合签名递抗议书,对我哨兵高声叫骂,有时用拳头砸铁窗歇斯底里地喊:“快把我们放出去,你们统统混蛋!”他们还利用放风的机会互相传递纸条,密谋勾结监外日侨越狱暴动(后来审讯他们主动交待),妄图在美国攻占东北时来个里应外合。

对于战犯的反动言行,我们采取了有力措施,根据他们闹监的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劝告、警告、独拘等处理。这样一来,战犯的反动气焰不得不有所收敛。

随着朝鲜战场局势的好转,我们于1951年3月将关押在哈尔滨道里和呼兰县监狱的660名尉级日本战犯押解回到了抚顺。1953年10月,我们又将关押在哈尔滨的日本将校级战犯和伪满战犯,全部押解回到了抚顺。回到抚顺后,我们即对前一个时期的看押工作进行了总结,找出了经验和教训,为后来完成看押任务打下了基础。

(四)

大多数战犯在押期间思想都比较稳定,能够冷静地思考自己的问题,学习也有一定的进步。但由于长期关押在监舍里缺少活动,尽管吃得好穿得暖,体质却普遍下降。这时上级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关于通过劳动改造罪

犯的重要指示。管理所每天早上要押解战犯上工地劳动，晚上又要押解战犯收工回所，部队加重了看押任务。但我们想，只要对战犯思想改造有利，只要对国家有好处，任务再重再苦我们都愿意承担。为了不发生问题，事先我们察看了农场和制瓦厂的地形，确定了押解路线和兵力的分配及哨位的设置，并进行了实地演练。开工头几天，当我们押解战犯到农场和制瓦厂劳动时，道路两旁站满了围观的群众，有的是看热闹，有的是伺机复仇。我们哨兵一面观察战犯的动向，一面注意群众的反应，防止有人投石块和其他物体伤害他们。战犯都非常明白，自己在中国犯下了滔天大罪，现在失去了自由，只能老老实实低头走路，不敢对观众正视一眼。时间长了，围观的群众自然没有了，减少了外界对战犯伤害的可能性，也减轻了哨兵的心理压力。

伪满战犯一直表现很老实。不论是在监舍里反省学习，还是到外面劳动，都能遵守规定，不敢反抗。他们有负罪感，甘愿接受人民惩处，不象日本战犯心里存有幻想。

根据战犯思想情况和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1954年4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战犯进行了审讯，要他们老实交待自己的问题，向中国人民低头认罪，接受中国人民的惩处。这项工作一开始，战犯压力很大，思想斗争十分激烈，有的不吃饭，有的睡不着觉，夜间躺在床上偷偷哭泣。这一现象引起了我们的重视，即把防止战犯逃跑为主的执勤方案，修改成防止战犯自杀为主的执勤方案。我们增加了监舍游动哨，并要求每一个哨兵加强责任心，认真观察每一个战犯的表情反应，一发现反常现象马上向管理

所值班人员报告。由于执勤方案修改得及时和哨兵尽职尽责,多起战犯自杀被有效地制止了。经过严密地监控和教育,战犯们也都老实交待了自己的罪行。因此,我们受到了管理所同志们的称赞和上级的表扬。

战犯经过坦白交待和认罪悔罪之后,逐步认识到他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也真正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宽大胸怀。他们把中国看成再生之地,把中国人民看成恩人。1956年春天,管理所为了使战犯思想进一步得到改造,遵照周总理指示精神,还组织战犯们分三批到社会上参观学习。我们承担了途中押解和现场及住地看押战犯任务。执行任务部队一律佩带手枪,着军服。先后到达沈阳、鞍山、长春、哈尔滨、天津、北京、武汉、杭州、上海等11个城市,参观工厂、农村、科学文化部门、社会福利机构等99个单位。每到一处,战犯都感慨万端,流下悔恨的眼泪。特别是参观遭受他们血洗过的地方时,他们忏悔地跪在群众面前,痛哭流涕地要求处以极刑。有时他们哭,群众也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哨兵努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庄严地站在那里执行看押任务,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参观回来,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组成特别军事法庭对在押的日、伪战犯进行审判。审判是在沈阳和抚顺两地分期分批进行的,我们仍然负责押解和看押战犯任务。当法庭上宣布对有的战犯不判刑或免于起诉之后,战犯们泣不成声,高呼:“我们保证不再拿起武器同中国打仗!中日永不再战!”他们不住地向在场的人们鞠躬,不住地向我们哨兵鞠躬。这时,我们才真正感到,历时6年,为祖国为人民完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任务。

长征途中任弼时反对张国焘 分裂主义的斗争

宋 毅 军

1950年,朱德曾深情地回忆:“任弼时率红二方面军在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又坚决参加了反对叛徒张国焘的斗争,使红军第四方面军和第二方面军胜利地到达陕北,和红军第一方面军会师。”贺龙也回忆说:“正当一九三六年六月在甘孜和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师时,又遇到叛徒张国焘阴谋分裂党和红军的破坏活动,弼时同志领导着二方面军的干部,和叛徒张国焘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粉碎了他的阴谋,团结了这两支人民军队,使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终于在陕北胜利会师。”实际上,这场斗争是毛泽东,张闻天等,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时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斗争的继续。

一、关于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 方面军会合的问题

1、建立电台联络的前前后后

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率领红二、红六军团,在坚持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时期,失去了同党中央的电台联络,时间大约在1935年6月至8月,直至1936年7月才恢复,其间有过几次联络(明码),但又中断。1935年9月29日,湘鄂川黔省委,省军分会在石门县磨岗隘(今磨市)召开红二、红三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任弼时作冲破敌人“围剿”的经验教训与粉碎敌人新的大举“围剿”的报告,当日,任弼时意外地收到了同党中央失去联络后的第一封来

电。电报是周恩来用明码发来的，内容很简单，除询问红二、红六军团情况外，并告周去陕北，原与两军团联络的密码留在“老四处”（指红四方面军）。对此任弼时既很高兴，又很慎重。他代表省委、军分会即用密码电复周恩来：

“我们八月二十七日占领澧州、津市、石门、临澧，现已退出，我们将敌原‘围剿’计划冲破，准备粉碎敌人对我们新的大举‘围剿’。”电报还询问：“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于来电内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

由于当时两军团联络的电台及密码，由张国焘控制，所以收到任弼时密码电报后，朱德、张国焘遂于9月30日致电任弼时，说明：

“你们省委弼时为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萧克、王震等为委员；一、四方面军六月中旬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广播蒋敌将于十月在宜昌建立川鄂湘黔剿共行营，刘湘已调许绍宗师九个团进攻你们；望你们以冲破敌人之‘围剿’部署的英勇（精神）的经验来冲破新的‘围剿’”。电报还提出：“我们今后应互相密切联络。”

这样，任弼时、贺龙及所率领的红二、红六军团，与朱德、张国焘所指挥的红四方面军之间，建立了通讯联络。由于朱德时任中革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军委副主席，新任红军总政委，任弼时等便认为同中革军委恢复了电讯联络。此后，关于两军团的军事行动均向朱、张请示、报告，关于党务（如省委）等方面的工作，也电请朱、张转给党中央。

但是，张国焘欺上瞒下。12月27日，张将中共中央指示其“负责转二、六军团”的《关于十二月二十五日政治决议案内容的摘要》用“中央政治局”名义向任弼时等转达时，却对原电文作了几处明显改动，如，中央原电文是：“苏维埃运动转入了一个新的胜利的时期，中央红军与二十五、六、七军会合之后，对敌人向陕甘苏区之三次‘围剿’彻底粉碎，是这个新时期的鲜明的标帜，”张国焘将此改

为：“主力红军在四川的胜利，陕北的新发展，二、六军团在大规模运动战中的胜利，都说明苏维埃运动并没有低落，而且得着新的发展。”显而易见，这是张国焘在自我肯定其脱离中央既定方针擅自率军南下的错误行动。

这时，党中央极力想通过电台直接找到红二、红六军团。要求军委三局在1936年2月至7月内“完成与二、六军团的通讯联络”。随后，党中央数次让张国焘转告与红二、红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以便直接与两军团联络。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电告张国焘：“请将与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但张国焘却于2月9日电复党中央：“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可以完全帮助他，勿念。”5月18日，林育英，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国焘：“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张国焘仍不理睬。

据陈士吾（时任军委无线电分队长）、江文（时任红二、红六军团无线电大队政委）回忆，三局连续在电台旁守听了半个多月，才找到了任弼时的电台。1936年1月，红二、红六军团的电台在一次与红四方面军通报时，突然听到一个电台插进来呼叫，经互相问讯，才知道是军委三局局长王净亲自上机在呼叫红二、红六军团。双方当即约定了保持联络的有关事项。

经过一段通报后，党中央又来电指示，暂停直接联络，原因是担心约定的密码被泄露。同时，电报经四方面军转也有利于团结张国焘。两军团与中央的直接无线电联络遂中止。此后党中央和两军团的电报继续经红四方面军转发。

对红二、红六军团是否恢复了同党中央电台联络，张国焘很快即有所怀疑。他在1936年3月曾电询二、六军团是否与陕北有联系？贺、任3月3日复电：“与陕北电台尚未叫通……”

尽管党中央处处考虑全党、全军团结，但张国焘非但未从根本上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反而向党中央提出要与党中央共处平行地位，同受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的要求。

这时，党中央为使红四、红二方面军迅速北上，壮大红军武装力量，开创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局面，对张国焘的严重错误采取了灵活态度，5月20日，党中央和军委领导同志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林育英等12人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任弼时、贺龙等10人，概要通报了关于目前形势与策略，提出，现在的“唯一任务是全党全军团结一致反对日帝与蒋介石，弟等对于兄等及二、四两方面军全体同志之艰苦奋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采取北上方针一致欢迎”。“为求革命胜利，应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抛弃任何成见，而以和协(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关于“中央及四方面军的关系，可如焘兄之意暂时采用协商方式”。

张国焘对此并不满足。他仍在5月30日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诘问：“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央职权，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并催促道：“弼时快到了，不能再不确定，请速明白答复”。6月6日，张国焘虽然在炉霍被迫取消自立的“中央”，却擅自宣布说什么党中央也取消了中央的名义。军事上，依旧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来作“军事上的统一”。

2、决策红二、红六军团长征

红二、红六军团于1935年11月19日开始的途经数省，行程万里的艰苦长征，是经过一个多月的酝酿和必要的准备才开始的。

由于红二、红六军团面临的敌情日渐严峻，任弼时和贺龙、关向应等审时度势，于10月9日致电朱德、张国焘并请朱、张转中央，在报告周围敌情和两军团兵力情况之后，“决定在桑(植)、龙(山)间苏区及慈(利)、石(门)、桑(植)、鹤(峰)等地区进行战斗，首先取得击破东面之樊(嵩甫)、孙(连仲)纵队”，并准备“在上述狭小地区不利我们和强大(敌人)的持久战斗”之时，“迅速突出敌包围线转移，方向(是)退黄平之线”。电报根据从敌方收集到的情报认为，“一、四方面军似在甘肃地区行动”，“一、四方面军将在何处建立新根据地及其发展方向的盼告，你们行动方针望速以电复”。这

里所说的黄平之线，是指位于湘鄂川黔根据地西南面的原黔东游击区的西端，相距近两千里的贵州省黄平县地区。

对此，朱德、张国焘于10月15日复电指示：“在狭小地区内固（然）失策，决战防御亦不（适）宜，轻于尝试远征，减员必大。可否在包围线外原有地区附近，诱敌出堡垒，用进攻路线集中全力以击破之。19日朱德、张国焘再次来电重申：“取守势是最失策，远征损失大，可否在赤区外围和附近地区诱敌，各个击破之。”23日，朱德以“中央”署名给红二、六军团发来电报，重申向西转移活动地区极狭，最易陷入不利，而且，长途转移中的减员会削弱红军的力量，“中央红军西征中大量的减员，是我们极大的损失，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教训”。

关于任弼时电询红一、红四方面军战略方向和方针一事，两封回电只说：“我们主力仍在川西北活动，”“我军向川敌回击，刘文辉、杨森均被打垮。现在占领绥靖、崇化、丹巴、抚边、懋功俘获甚多，正追击中。”11月12日再次来电说，已将刘湘主力模范师教导师全部打垮，现乘胜猛追。“这一胜利奠定了建立川康苏区的胜利基础，建立了配合长江一带苏区红军发展的战略任务。”

可见张国焘并以朱德名义数次指示电倾向于两军团尽量在现根据地附近寻机歼敌，粉碎敌人的“围剿”，尽可能地避免长途远征。同时也说明这只是“一些建议，”“仅供参考，”“一切请按实际情况由你们自行决定”，我们“当尽量与你方配合”。

根据上述情况，10月17日，任弼时、贺龙等在接到朱德、张国焘10月15日来电后，就在石门县召开会议，讨论新的行动方针，并开始作突围转移的准备工作。此后，任弼时、贺龙等又反复研究这一重大问题。

不料，11月1日，张国焘本人并以朱德名义向红二、红六军团任弼时等军团首长发出电报，提出“你们应立即向部队群众宣传全国民众奋起抗日反蒋，发起人民救国大会等情况”，但“对外不要另发电报”，因为“我们已发通电号召”。同时明确向二、六军团提出：

“你们现处地区很重要，应坚决在现地区巩固和扩大苏区和红军，反对继续逃跑”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任弼时、贺龙于11月4日又在桑植县刘家坪主持召开省委和省军分会联席会议，按照遵义会议决议精神和党中央、中革军委以往发来的关于反“围剿”斗争指示，特别是根据当前敌我双方斗争的实际情况，“最后决定突出（敌）封锁线，向湘黔之石阡、江口、镇远、黄平方向转移。”随后又确定了战略突围的方向。

3、决策红二、红六军团渡江北上

任弼时等率领两军团突出敌人重围，日夜转战于崇山峻岭中，进入黔西、大定、毕节后休整部队，补充给养。随后，又取得了乌蒙山千里回旋战的胜利。但是，今后的行动方针是什么？怎样使红二、红六军团的局部行动，很好地配合全国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盘县会议正确回答了这些问题。

3月30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与从亦资孔赶来的萧克、王震、张子意，在盘县城中召开了两军团领导人会议。会议仔细分析了各方面情况，研究了如何执行朱德、张国焘关于两军团伺机北渡金沙江的指示。和其他同志一样，任弼时也认为，可以全力首先击溃孙连仲，郭汝栋纵队，在滇黔边活动，创立根据地。因为盘江地区广阔，“群众、地势、粮食条件均有利于我军活动”，该地区“距反动统治中心（南京、武汉）较远，交通不便，”增加敌人进攻困难。而周围敌军兵力减少，黔敌一部退出追剿，巩固黔防，滇军作战经验少战斗力不甚强，桂敌因宁粤矛盾进攻不积极，而且兵力不大。蒋嫡系部队中仅孙连仲比较积极。这种情况有利于我军各个击破。

但是，朱德、张国焘自3月23日来电建议红二、红六军团趁此时在“渡河技术有把握条件下及旧历三月涨水之前，设法渡过金沙江”，“与我们会合大举北进”，“如果你们决定后，我们即布置接应你们”。并告蒙昭一带等5个渡河地点，多备冬衣，渡江后需整理缓进等。来电也提出：“如你军并不十分疲劳，有把握进行运动战时，

则在滇黔边行动亦好。”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因为不明确朱、张电示渡江是出于全局战略需要，才要求两军团必须渡江会师北进？还是因为考虑红四方面军主力将来北进后，两军团在长江南岸活动困难，孤掌难鸣，而需要及早北渡？

为使两军团这一独立战略区活动符合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全局，任弼时遂于3月29日和贺龙、关向应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部队转战乌蒙山区时的情况，认为，“在目前敌我力量下，于滇黔川广大地区内求得运动战中战胜敌人创立根据地的可能，我们以为还是有的”。我们“渡河技术是很幼稚，但如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通过，在春水未涨之前，或不致感受大的困难”。电报说，由于对“最近国际国内事变新发展情况我们不甚明了，在整个战略上我军是否应北进，及一、四方面军将来大举北进后，我军在长江南岸活动是否孤立和困难，均难明确估计。因此，我军究应此时北进与主力会合，或应留在滇黔川边活动之问题，请军委决定，并望在一二天内电告”。

对此，朱德、张国焘于3月30日复电：依据国内外情况，民族高潮在生长，苏维埃运动有些发展，但不可过分估计。在困难条件下，可在滇、黔、川广大地区活动，但应有准备较长期的运动战。“最好你军在第三渡河点或最后路线北进，与我们汇合同北进，亦可先以到达滇西为目的，我们当尽力策应。”并说，究应如何，请按实况决定，不可受拘束。可见，复电虽未作决定，“但其意是以北渡为妥。”

在此决定重大战略问题时刻，任弼时敏锐地意识到中央红军和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后又东渡黄河，活动于黄河、汾水之间，第二十六军仍在陕北苏区。红四方面军进占道孚、炉霍、即将夺取甘孜、瞻化、雅江，在西康（现属四川省）活动。而日寇进逼华北，全国人民特别是华北学生群情激奋，全国革命大势已由南方转到了北方。尽管当时各方面情况允许两军团就地在南北盘江地区建立根据地，但是，为服从全国革命战争的战略大局，任弼时和其他同志

一起，毅然决定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自此，红二、红六军团以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为目标，放弃了长征沿途建立根据地的方针。

会议决定了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抗日方针之后，部队在盘县休整了三天，扩大了七百多名新战士，进行思想动员、组织整顿和物资准备工作。

3月31日，任弼时与贺龙率部主动撤离盘县，抢渡普渡河未成遂转兵西进，主力直逼昆明，乘敌人回防之机西渡普渡河，向金沙江上游疾进。4月25日至28日，两军团在石鼓、巨甸两处，全部顺利地渡过了金沙江。

盘县会议确定的红二、红六军团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适应了全国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符合党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同时，两军团北上行动，也促使了张国焘的及早北上，对全国红军主力大会师，推动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二、坚决维护党的统一和红军的团结

1、会合之初

贺龙、任弼时率领着红二、红六军团向红四方面军所在的方向开进。6月3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在理化以南之甲洼与红六军团先头部队第十六师会合，22日，红六军团到达甘孜以南之普玉隆。30日，红二军团也在甘孜以西之绒坝岔与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会合，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全部集结于甘孜地区，在此前后。任弼时、贺龙等与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在甘孜会面。

中共中央发来贺电：“我们以无限的热忱庆祝你们的胜利会合，欢迎你们继续英勇的进军，北出陕甘与一方面军配合以至会合。在中国的西北建立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建立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

战争。”

朱德、张国焘、周恩来、王稼祥也联名发布中革军委命令：7月5日决定，以二军（即红二军团）、六军（即红六军团）、三十二军组织红二方面军，并任命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委员；萧克为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治委员；第二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贺龙、任弼时兼任；第六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陈伯钧、王震担任；第三十二军军长和政委分别由罗炳辉、袁任远担任。

总之，历尽长征之苦的红二、红六军团，与遭受政治斗争磨难的红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的大会师，是一次胜利的会师，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任弼时指出，这次会师“提高了二、四方面军指战员的士气，四方面军的动员也很大，双方战士是很亲热的。”

对待远征前来的红二、红六军团，张国焘采取瞒上欺下和笼络人心的不正当手段，企图使不明真相的两军团领导参与他与中央分庭抗礼的活动。当任弼时等来电，希望派人送来党中央、政府、军委总政治部文件，以便了解目前国内外形势和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以增两个军团指战员“之兴奋”，而张国焘则派人送来内有公开反对党中央内容的《干部必读》、《西北讲座》等小册子。

在未到甘孜和红四方面军主力会师前，任弼时遇到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少部分指战员，听见他们谈到过去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情形，原来，在两军团未到达之前，张国焘就召集会议，讲不能说红四方面军的缺点，并且要在四方面军干部中抓紧学习，以便将来到红二方面军中作工作。而这种工作首先是向最先接应到的红六军团做的。当时，张国焘派出一个委员会（工作团）组织到红六军团，其主要目的是送来内有反对党中央内容的宣传材料，散布对中央领导不满的言行。

部队指挥方面，会合前张国焘就下令要用电台直接指挥红六军团。会合后同任弼时第一次会面，张国焘就主张任离开红二、红六军团，另派政委到两军团来。但是，张国焘这些企图以变动红二、红六军团首长，来实现其个人目的作法并未奏效。

贺龙曾回忆道：会合开始，衣服、粮食、补兵，都答应给我们，当我们不同意他的路线时，就什么都没有了。王震也说：张国焘认为我们是毛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仗。我们到稻城时，张就派人送来反对毛、周、张、博的小册子。任弼时知道，这是张国焘搞宗派活动，“是国民党政客式的办法”。是想使“二方面军会合四方面军后，能达到二、四方面军来一致反对中央。”张国焘说：“我们和二、六军团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分歧”，两军会合“将要更大地增强我们的力量”，“有吸引陕北红军采取配合行动的可能。”^①

任弼时深知，这场严肃的党内斗争事关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关系着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还是延缓中国革命的进程。因此，处理上稍有不慎，便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部队之一。创建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鄂豫皖、川陕两大革命根据地，在红军长征中，曾有力地策应了红一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的战略转移，部队的广大指战员，从党中央坚持北上取得的重大胜利，及张国焘坚持南下方针遭到失败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已开始认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活动的恶果，他们愿意执行党中央指示北上抗日。因此，在斗争中必须坚持革命团结，以团结为重，求同存异，争取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站在党中央正确路线一边。

任弼时还清楚：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的这场斗争，不同于红二、红六军团会师时批判夏曦“左”倾错误的斗争。因为张国焘是党的创始人之一，曾在党内担任过许多重要领导职务，在党内外均有很大影响。他从共产国际回国后，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主持这一

^① 《任弼时研究文集》，第74页。

地区的党、政、军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况且，此时他还担任着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握有军事指挥权。

作为下级，军事上要接受张国焘的指挥，而且，党中央在陕北急切地等待红二、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共同发展西北革命大局面，为此，要以团结的大局为重，采用灵活的斗争形式和方法。

当然，如朱德所言，此时的任弼时“是坚决拥护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他原来就“知道张国焘的底细，是个机会主义者”。任弼时后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张国焘的机会主义有着历史根源。从党在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到1928年党的‘六大’，张国焘是代表极右思想的，以为发动土地革命会引起党内分化，干扰南昌暴动的发动，直到他在共产国际受到批评后，才发表声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是，张国焘在党内有很深的派别成见，在苏联莫斯科期间，就充分地表现了他的派别活动，虽然承认了错误，但仍未根本消除。比如他根本不愿意传达中央的指示，不相信党中央关于统一战线的指示精神。另外，他看到红军数量少了，就主张退到西康西宁。”任弼时联系张国焘历史上各种错误，对他与党中央指示相违抗，制造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争论的错误，心中是有数的。所以他认为，坚决维护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坚持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同张国焘错误活动进行斗争的基本原则。

2、三件大事

在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后，任弼时针对张国焘的错误活动，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第一件是明令禁止在两军团内发布张国焘派人送来的内有反对党中央路线、攻击中央领导的《干部必读》等宣传材料。在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前，张国焘派人送来了有反党内容的宣传材料。据任弼时回忆：“我们停止将这些文件（国焘发来的反中央的文件）发下去，并把文件烧了。”任弼时还向送材料的人表明态度，“说明唯有在十二月决议的基础上才能一致的。这算停止了一些反党活动。”同时，他还给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写信，告诉他：让红四方

面军来的干部只准讲团结，不准讲反对中央和毛主席，不准讲红一、红四方面军之间的问题。红四方面军发的文件，一律不准下发。时任红二军团副政治委员的关向应后来也回忆：“到甘孜后即听见关于一、四方面军分开的问题，并在一些文件上说到了这一问题。我们感觉如果这些问题在二方面军内传达，将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因此完全未传达。”贺龙、王震也都态度鲜明地表示支持，并执行了这一决定。显然，这一明令目的在于制止反对党中央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防止反党宣传活动的不良影响在部队中的扩散。

任弼时提到的党的十二月决议，是指党中央于1935年12月25日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所通过的决议。会后党中央及时地把会议决议要点通报给朱德、张国焘并说明由他们转给长征途中的红二、红六军团。1936年1月下旬，张国焘曾主持会议，讨论党中央发来的“十二月决议”要点，在朱德、徐向前、陈昌浩等人积极表示同意决议要点的情况下，张国焘也表示“原则上完全同意”，然而，在致张闻天和各中央委员的电报中，提出所谓的“补充与修改”意见。党中央于2月上旬至中旬，数次电告张国焘，认为张国焘原则上同意“十二月决议要点”，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党中央对此表示“一致欢迎”。任弼时此时提出唯有在这个决议基础上才能同张国焘意见一致，这既能使张国焘接受，同时又在政治路线和组织方面，维护确立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第二件是坚决反对召开极有可能导致领导干部间发生严重分歧意见的各种会议。为在红二方面军寻找同情者，使红二、红四方面军来一致反对党中央，张国焘派人向任弼时说：红二、红四两个方面军首先要一致，要任弼时首先召集红二方面军干部会，“来求取‘一致’”。虽然，任弼时感到，召集这样的会议，甚至是两个方面军联席会议，是可以争取红四方面军的一些进步干部，但是，这也将难以避免地“造成上面的对立，将要使工作更困难。”所以，任弼时“反对这(种)会议的召集。”

而张国焘坚持要开这样的会议，想以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多数来压红二方面军干部的少数，任弼时与贺龙、关向应等商量后，向张国焘提出：报告哪个作，有争论结论怎么作？不能以多数压少数！“如果二、四方面军态度尖锐我不负责任”。张国焘只好不再主张召集这种会议了。不言而喻，在张国焘仍坚持反对党中央、并直接影响了红四方面军一批干部的情况下，任弼时等一方面明确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领导，坚决执行党中央要求两个方面军迅速北上的指示，另一方面，为保持两支主力红军刚刚会师时的亲密团结，防止因新的争论而耽搁北上行动计划，任弼时等避开难以解决问题的直接交锋，争取及早实现共同北上的大目标，无疑是正确和明智之举。

第三件是迅速恢复同党中央直接的通讯联络。两军刚刚会合，在张国焘以顽固态度对抗党中央之际，任弼时却急于同党中央恢复直接通讯联络，表明了相信拥护党中央，按党中央指示办事的鲜明立场。同时，由于他和红二方面军直接受到党中央的指导，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也有了明确方向。任弼时和党中央恢复直接联络后，先后收到党中央许多重要指示。有决定正式组建红二方面军的电报，也有要求兵出甘南，联合东北军。逼蒋抗日的电报，还有一封指定任弼时亲译的长电，内容是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任务，指明对张国焘的错误既要坚决斗争，又要讲团结，以达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之目的。为此，他反对一些同志背后议论，当听到机要科同志议论张国焘的问题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上边已经很困难了，如果我们下边同志再乱发议论，那么，上边的工作就更难做了。当红二、红六军团抽出干部前往红四方面军工作时，任弼时把很受自己器重的工农干部刘俊秀派去，临行前亲自交代：要注意团结，也要坚持斗争。

在甘孜的几天里，任弼时与朱德、贺龙等人一起，主要是在红二、红六军团中间，做了维护党中央领导，保持两个方面军团结的工作，这同甘孜会师前，朱德、刘伯承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斗争，其

目的和方法是一致的。

仅驻防甘孜几日中的几件事,就足以显现任弼时作为一个无产阶级政治家所具有的优秀素质:坚定的原则,求实的灵活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3、随红军总部行进途中

7月初,红二、红六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分三路先后开始北上,任弼时根据朱德、刘伯承建议,暂时离开红二、红六军团,随朱德、张国焘行动,7月6日,任弼时在致党中央领导和共产国际代表的电报中报告:“我现随朱张行进。”并且毫无保留地如实地向中央报告部队情况:红二、红六军团从1935年11月出发至1936年7月1日和红四方面军全部在甘孜会合,历时七个多月,行军万余里,沿途大小战斗十余次,伤亡约5300人。出发时两军团共17000人,至今还保存14500人,其中二军^①9000人,六军5300人,武器比桑植出发时稍有增加。部队现正随同红四方面军继续北进。

(一)一份长电。任弼时通过与朱德、张国焘等人的详谈,研究了党中央和红四方面军来往电报,基本了解了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党内斗争情况,认为红四方面军干部及张国焘等,与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同志,对目前形势估计和党的策略路线已经一致,红二、红四方面军此时北进,红一方面军也向甘南配合接应,三个方面军将靠近行动。任弼时深切地感到:为抓住目前全国极为有利的局势,为使我们党担负起当前艰巨的历史任务,“党内团结一致,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是万分迫切需要,而且是不能等待七次大会的。”

所以,任弼时征得张国焘、朱德的同意后,于7月10日发电报给林育英、洛甫、周恩来、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等,提出几条建议:

“(一)在一、二、四方面军靠拢时,召集一次中央扩大会议,至

^① 二军、六军即原红二、红六军团,据1936年7月5日军委电令改变番号。

少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一、二、四方面军主要干部参加。并要求共产国际派负责代表出席这次会议。议程应列有总结(第)五次围剿斗争之经验教训和讨论党的目前紧急任务，并产生党内和党外的统一集权的最高领导机关；

“(二)万一对粉碎围剿和斗争之经验教训不可能在这一会议上得到最后结论，则这一问题由七次大会或国际去解决；

“(三)……

“(四)二、四方面军会合后，二、六军情绪亦甚好，四方面军曾以很大动员迎接慰劳二、六军。现在二、四方面军阶级友爱的关系极好，在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上是团结一致的。

“(五)现二、六军改编为二方面军，并将三十二军编在二方面军内。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党内争论问题尚未研究。”

电报最后再次提出：我们为着党内的团结一致，希望电复为盼。

第二天，任弼时向贺龙、萧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电告自己关于加强党内团结建议的内容。并通报红一方面军在陕甘宁边占领了十余个县。

党中央接到任弼时的电报后，认真地进行研究，并由洛甫电复。关于提议召开中央全会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复电说：“中央已向国际请求批准召开六中全会，并对六中全会给予原则指示，同时派负责代表出席。关于开会之时间与地点，须候国际回示，并且出席代表到达或确定到达日期之后才能决定。”会议“自然应有全国的代表及红军代表到会。”关于会议议程，“主要日程为审查五中全会以来的工作，及决定今后的政治任务。”并说明中央非常注意红二、红六军团的行动，“你们到贵州以后，我们曾有多次电报给你们。”

7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又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来电，指出红二、红四方面军北出草地后应“攻占岷州城”，“万一攻不开则围城打援。”此举“战略上大占优势”，22日，党中央及军委

又发电报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目前陕甘宁地区敌情，并告“我们正动员全部红军并苏区人民粉碎敌人之进攻，迎接你们北上”。电报正式确定甘南为两个方面军北出的战略方向。要求：“二、四方面军以迅速出至甘南为有利。待你们进至甘南适当地点时，即令一方面军与你们配合南北夹击，消灭何柱国、毛炳文等部，取得三方面军的完全会合，开展西北伟大的局面。”并告党中央与共产国际的电台已于7月6日畅通。张国焘关于红四方面军情况及意见，可由党中央转达给国际。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由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朱德、贺龙、关向应、徐向前、陈昌浩等为委员，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行动。28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电询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据有关方面通报，说红二、红四方面军现留川境大金川，或说两路出青海，一路出甘肃，前锋至阿坝，及又说已抵达芦花。因不知两方面军“目前确至何地，8月中旬可出甘南否，”粮食够用否，所以“颇为悬念”。提出“行军情形盼时告”。关于统一战线方面，虽然两广因为没有革命决心与内部不巩固而发生内变，但全国革命高涨的基本形势没有变化，西北统一战线有了进步，三个方面军会合之后，即能引起西北局面大变化。

8月1日，任弼时随朱德、张国焘，与红四军方面军一部抵达包座，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两次来电给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表示无限欣慰。电报详细地通报了敌朱绍良、王均等部防堵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的计划，认为，“四方面军到包座略作休息，宜迅速北进；二方面军随后跟进，到哈达铺后再大休息，以免敌人封锁岷西线，北出发生困难。”次日，毛、周、彭再次电告：应以一部速占腊子口天险，则进出便利。

朱德、张国焘、任弼时对党中央的指示表示同意，8月1日，三人联名复电党中央，说明“俟兵力稍集结后即向洮、岷、西固。约8月中旬，主力可向天水、西兰大道出击”。并表示：“我二、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对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和配合行动，一致兴奋，并准备

牺牲一切，谋西北首先胜利到底！”

对此毛泽东等“为之欣慰”，认为“团结一致、牺牲一切，实现西北抗日新局面的伟大任务，我们的心和你们的心是完全一致的”。党中央还号召苏区红军，准备一切条件欢迎你们，达到三个方面军的大会合。电报还说明，党中央已原文向共产国际照转了朱、张、任8月1日电，至今还未收到国际给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单独指示。“军事情况由此间军委随时电告你们”。党中央的这些指示，对引导红二、红四方面军沿着正确的道路北上，鼓舞部队的士气和提高广大指战员的胜利信心，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二)一封长信。8月10日，调到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原红六军团)担任军长不久的陈伯钧，在日记中写道：“回来不久即接弼时同志来信，谈目前战略及与一方面军会合等问题。阅此，心中为之一爽。概自去年北上以来，党内分歧久延未决，幸自二、四方面军会合后，得弼时同志之力，从中挽转，始有今日之新机，使有心人闻之，其能无快于心乎！”

这是指任弼时8月9日写给陈伯钧、王震、并转贺龙、萧克、关向应、甘泗淇的一封长信，长达2500多字。该信通报了目前全国政治形势，主要是西北地区敌情，据此提出第二步战役计划，并就红二方面军到达包座前后的工作以及如何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和做好一、二、四方面军会合后政治工作提出建议。

信中说，两广事件自余汉谋叛变后，内部即起变化，但蒋仍以重兵压迫桂境，敌主力仍在湘黔，一时似难北调。陕、甘、青、宁等省敌军，企图首先击破红一方面军，然后阻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红一方面军主力正在预旺、盐池地区，进行巩固新区、整理补充部队工作。我军第二步计划是迅速伸出进占涇洮西面，红二、红四方面军进入甘南适当地区，红一方面军将由北向南出击，争取在三个方面军配合下赤化陕甘大道，取得大会合，造成西北新格局并以此影响桂省，推进全国抗日反蒋新形势。

信中还简要说明了红二方面军过草地以后应做的几项工作，

如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到包座地区后，休整三五天即应继续北进；进行必要战斗动员；注意收集和看守粮食、牲畜；严格政治纪律；注意与少数民族群众处理好关系；注意重要地段的搜索前进等。

因为红二方面军首长对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一些争论问题很关心，任弼时在信中以 1/3 篇幅说明这一重要问题。

关于党内军内的团结，他说：“我这次随朱张等行动，力求了解过去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党内争论问题，并努力促成我党的完全一致。”现在这一工作有了很大进展。

一是，“我与朱、张、刘伯承、向前、傅钟、卓然等同志的谈话，”使“大家对党在组织上的，建立最高集体集权领导是认为迫切重要的”。陕北党中央同志也同样认为是迫切需要的。所以，“在这一基础上，我党团结一致想（必）“可能得到顺利的成功”。

二是，“我对陕北（党中央）同志建议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一、二、四方面军靠近和会合时），已得到他们的同意，现国际正讨论这一问题，大概是可能批准这一会议的召集”。

三是，“我正在这边同志中要求他们将来在六中全会上很客观、冷静、正确的自我批评，根据‘目前的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决议’基础，重新估计过去中央的领导。”根据张闻天来电精神，“六中全会应着重在目前形势与战斗任务上的讨论，对粉碎五次‘围剿’斗争经验只须在主要问题上提出原则上的讨论，而应避免一些枝节不甚重要，而且争论也无良好结果的小问题”。

四是，“我已向总政治部（红军总司令部——笔者注）提出并已取得同意，立即在二、四方面军中开始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在四方面军中应消除一切陈见和不好印象”，做好“政治上技术上的准备，以期在大会合时三个方面军的完全兄弟的亲密的团结一致”。同时，“我已向陕北建议在一方面军中也进行同样的动员和准备，已得他们的回电”，现在，一方面军及独立师团、地方部队中正进行这种动员，并发出告二、四方面军同志书。

五是，“最近此间与陕北电报关系颇密切，态度比较诚恳，陕北也有军委、总政治部组织，他们与国际有电报关系”。

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任弼时认为，“二方面军在促成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顺利的会合上是负有重大责任的，必要时将来可以二方面军指战员名义发告一、四方面军同志书”；“互相勉励，准备大会合”。“目前即应在二方面军中进行大会合的政治动员和一切必要的准备”。对此，贺龙、萧克、关向应于8月16日复电任弼时：“我们完全同意你对过去党内斗争采取的立场，我们坚决站在这一个立场上，为党的统一而斗争。”赞成以二方面军名义出一份告红一、红四方面军书，并请任弼时到哈达铺时回到二方面军来。

(三)一次次谈话，当时，任弼时处处以团结、统一大局为重，在党内意见基本统一、军队团结等重大问题基本解决之后，他准备回到红二方面军中去，因为部队即将三军会合，红二方面军又需要单独出动，但朱德、张国焘等提出要留他暂时在西北局工作一个时期，以便共商两方面军行动问题。于是，任弼时又留了下来，利用中共西北局副书记职务，“做了相当的工作”。

据红四方面军很多干部的回忆：任弼时“异常关心全党全军的团结”。

徐向前说：在草地里，他同我第一次见面就询问这方面的情况，征求我的意见。并说，他已向中央建议召开六中全会，请共产国际派代表参加，从原则上解决以往的分歧。任弼时还对我的几点看法表示“很高兴”，表示一定要在党和军队的团结方面作出努力。初次见面，任弼时就给徐向前留下了“冷静、诚恳，对促进党和红军的团结充满信心”的印象。

《聂荣臻回忆录》中说，直至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时，任弼时还在关心这件事，他“见到我们时，找我们问及头年张国焘和中央红军分手的情况，他问得很详细，但未表态，态度十分冷静”。

任弼时自己讲：“我当时找了一些同志谈话，中间慢慢感觉到党内的统一必要”，“在谈话当中，都感觉到很好。在(同)昌浩同志

的谈话中,都得到他们的同情”,“国焘那时也没有不同意,这其中慢慢进行了解释工作”。经过一些工作,他以为“党内统一的推进是有办法的”,“党的团结已颇顺利了”。

张国焘是这样写会师时红二、红六军团几位领导人的:“二方面军的领导人物以任弼时为重心,”他在“1927年以拥护共产国际反对陈独秀著称”,“他原富有青年气味,经过许多磨炼,已显得相当老成”。贺龙“简直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共产军人,一切听由任弼时指挥。“萧克将军倒很像个文人”,“关向应原也是少共的小伙子,这时仍富有青年气味,不遇着大问题,倒不轻易发言。”他们对于一、四两方面军会合后所发生的一切,也极表关怀。

任弼时对党中央采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表示拥护,“对于陕北已与张学良发生联盟关系一点,也认为中共方面只有采取一致的步骤”。

关于促进党内团结,张国焘说:“任弼时本人对于毛儿盖的争执特别感觉兴趣。不惜花很多时间,分别和朱德、徐向前、陈昌浩、刘伯承和我详谈,搜集有关资料,研究这个争执的症结所在,我曾笑问他是不是想做‘包拯’,他也不完全否认这一点,认为“现在研究一下,也许将来可以为大家和好尽些力量”。任弼时研究后认为,张国焘“成立临时中央,似乎太过分了”。

张国焘接着说:“任弼时认为这是一次严重的教训,值得大家警惕。……我对于他这种热忱,极为感动。至于他的意见,我当时未置可否。”

任弼时还同曾任过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时任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主任的傅钟作竟夜长谈,他们早在1926年就在苏联莫斯科相识,当时就有过多次交谈。1930年,两人又在上海一起工作过。有一次,回国不久的张国焘提出要到中央军委看文件,任弼时严肃地告诉在军委工作的傅钟:“他看文件到中央组织部去不要到军委来。”此时,红二、红四方面军并肩北上,开进草地第二天晚上,任弼时就主动找傅钟谈话,他首先肯定了红四方面军政治工作成

绩，也指明一些小册子中讲同党中央的分歧，说党中央“不辞而别”，这是损害团结。并询问：“去年北上，中央走了，你们为什么不走呀！”当得知傅钟也不了解内情时，感到很惊讶，他仔细地听着傅钟的所见所闻。

听完傅钟的话，敏于事而慎于言的任弼时严肃地问道：“北上有决议没有？”当傅钟回答说有时，他又一针见血地问：“有，为什么不执行？”短短的两句问话，使傅钟一下子感到了自己的错误所在，深深为自己没有为执行和维护党中央的决议、决定而进行坚决斗争所内疚。随后，任弼时告诉傅钟第二天一起去红军总司令部机要科去看电报，并说：“凡我看过的你都可以看。”看过红一、红四方面军分开前后的来往电报后，任弼时再次找傅钟长谈。他态度诚恳，语重心长地说：“看来，不是中央丢下你们走了，是你们不跟上中央走，中央才先走的，责任不在中央，在你们。”

这时，任弼时已在时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的李卓然处了解到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情况，又在傅钟处看了那次会议的记录，他明确告诉傅钟：“责任全在张国焘，事是他干的，人是他定的，你们谁管得了？”后来，他仍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张国焘列入“中央”名单中的干部，没有因此批评过哪个同志。但是，他对傅钟则诚恳地说：“按照列宁的党性原则，我们不是不参加党内斗争，必须考虑到，我们是拿枪的，彼此都带着队伍，意见有分歧不好搞斗争的！我们还在长征途中，艰难困苦，人间罕见，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

当时，张国焘虽然取消自立的“中央”，却要和党中央实行平等的协商关系，说陕北地区是西北局，这边是西南局，各自直接受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领导。对此，任弼时向傅钟了解情况后表示：张国焘自立“中央”，已成为我们党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分裂危机，既然宣布取消了，为什么还不服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党中央曾于1936年5月20日讲过与张国焘关系“暂时采用协商方式”，以和谐团结努力奋斗为目标。改变过去一切不适合的观点与关系。

但党中央并没有讲与他是平行的“局”，也不应该是这样的关系，而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党中央派出的，怎么能颠倒过来领导党中央呢？对张国焘破坏党中央统一领导的言行，任弼时极为愤慨，他告诉傅钟：“搞派别活动是张国焘的老毛病，斯大林都知道，想不到会发展得这样严重。”他还用俄语说，列宁是非常重视统一问题的。列宁认为，统一对工人阶级是无限宝贵、无限重要的，在斗争中是最伟大的武器！而没有统一的领导中心，党的真正统一是不可能的。我们再也不能让张国焘破坏党的统一了。他认为，目前最迫切问题，是维护党中央建立绝对统一集中的最高领导。

通过和任弼时的几次竟夜长谈，使傅钟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制造的各种混乱和其错误行径有了深刻认识，澄清了一些是非。他按照任弼时的谈话口径，和四方面军政治部的高级干部也作了长谈。得到了他们的赞同。并一起积极主动地在部队中进行了团结一致和维护中央统一领导的思想教育。14年后，当任弼时不幸病逝时，傅钟这样满怀深情地回忆他：会师后：“你每次亲切地和我在一起作长夜谈，都使我衷心地愉快地领会你的精神。你那和蔼诚挚的态度教育了我，并教育了成千上万的同志。”此外，任弼时还以巧妙方式，保护一些被张国焘关押起来的干部。廖承志曾回忆说：有一天，他和其他被关押的同志经过一个山坡，看见张国焘正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蓄着小胡子的人谈话，猜测这就是任弼时。任弼时则很快地走过来和廖承志握手，告诉自己的名字，这时，廖承志因不认识任弼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张国焘见状很尴尬，也走过来，他问任弼时：怎么，你认识他吗？

尽管此前任弼时和廖承志并不认识，这时却说：老早就相识。然后，他转过脸对张国焘说：如果他（廖承志）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由于朱德、任弼时的保护、关照，廖承志虽被看押，但已获得若干“自由”，不仅有“新闻电台”大量的译电、编辑工作可做，还常常出“队”执行画马克思、列宁的像、布置会场等任务。他还向红军干部、战士作了《东方殖民地革命运动》、《关于

国民党》、《日本问题》等专题讲演，对此，任弼时都给予了充分肯定。

三、坚持北上正确方针，接受党中央的指挥

1、力主北出甘南。

坚持北上正确方针，还是途中转向西进？这是任弼时等同张国焘在是否执行党中央指示的原则问题上的又一次交锋。

还是在草地行军时，任弼时就问张国焘，出了草地之后怎样办呢？去哪里创建根据地？而张国焘始终没有明确的答复，嘴上只说去岷洮西，可在行动上又没有实际的布置。

张国焘是这样想的：他“觉得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致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磨擦”。所以，他主张红二方面军为右路出甘肃的岷县、静宁，进到海原一带甘北地区，红四方面为左路，经岷县，取道陇西渭，折而向西，夺取甘肃的河西走廊。这样军事上，陕北红军居右翼，红四方面军夺取河西走廊居左翼，红二方面军到甘北，居左右两路中间地位，军事、政治上都可以起桥梁作用。

任弼时认为：“张国焘是想换个地方，要红二、红四方面军一同向西退却，至少张国焘是想带红四方面军西向的。”所以，他就向张国焘提出两个方面军主力出草地后继续北上的三个理由：“1、两广事件起来了；2、应配合一方面军突破张学良的‘围剿’；3、配合全国作用放（弃）去黄河西不行。”

张国焘表面上不得不同意任弼时的正确意见，但在实际布置上，还是使用主力出夏洮，而将次要兵力放在岷州以东的西固方面。

此时，任弼时对张国焘的目的看得更清楚了；他的“北上，目的的基本企图是过黄河以西，并拒绝与一方面军的会合。”所以，这是张国焘在继续坚持拒绝中央的北上正确方针，任弼时对此丝毫未

作让步,坚持两方面军主力北出岷州,直向甘南,配合红一方面军,结果“这也顺利了,主力全部(在)后来出岷州。”

8月5日,中共西北局依据当面敌情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8月2日关于速出甘南,抢占腊子口,攻占岷州的指示,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之前,以红二、红四方面军先机夺取岷州、洮州、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到12日,三路纵队先后由包座地区出发向甘南挺进。

8月上旬,党中央根据红二、红四方面军已经北上。两广事件的发展及日本企图进攻绥远等情况,于8月9日向张学良提出与东北军联合发展抗日局面,占领以兰州为中心的战略枢纽地带,从西、北两个方向同时打通苏联的建议。12日,中央洛甫、林育英、毛泽东等8人,将今后战略方针的设想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提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有配合东北军打通苏联、巩固内部、出兵绥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之任务,要求红二、红四方面军尽可能夺取岷州,以甘南为临时根据地,休整补充,据此,张国焘、任弼时为首的中共西北局作出了两个方面军在甘南建立临时根据地的部署。

为答复党中央领导人洛甫、林育英、毛泽东等8人提出的“战略方针的建议”,任弼时和朱德、张国焘于8月20日致电林育英、洛甫、毛泽东等,询问有关情况:一是东北军对抗日反蒋,组织西北国防政府的决心,部署及与我党关系的可靠程度。二是日军西进绥远行动及苏联对此应付办法,我进军绥远将引起何种变化。三是我军配合东北军的问题。四是黄河是否结冰,能否渡河,五是宁夏、绥远敌情、粮食情况、人口情况如何。

党中央回电一一答复,并在征询红一、红四方面军意见后,于8月25日致电王明报共产国际,认为红军主力必须占领甘肃西部、宁夏、绥远一带。具体部署是:以红一方面军15000人攻宁夏,12月渡黄河;其余部队保卫陕甘苏区;红四方面军12月从兰州以南渡河,首先占领青海一部地区为根据地,待明年春暖向甘西前

进。红二方面军则在甘南地区，与陕南、陕甘苏区互为策应。

8月30日，党中央根据胡宗南部回开兰州，蒋介石有分化东北军、撤换张学良的企图等情况，对红军9至11月作战计划再作部署。其中要求红四方面军控制甘南，尽可能取得岷州、武山、通渭地区；红二方面军速向陕甘南部交界地区出动，“三个方面军的行动中以二方面军向东行动为最重要”。据此，红二方面军前卫穿过腊子口，于9月1日抵达哈达铺地区。7日，红四方面军一部北出，占领通渭。

9月2日，任弼时和朱德、张国焘致电林育英并转国际代表团，及洛甫、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彭德怀，提出关于目前战略方针和部署的两项建议：一、根据我们对目前时局估计，即以陕甘北、甘南、陕甘川边为根据地，争取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具体形成，首先赤化陕甘广大地区，尔后向川、豫、鄂发展。二、经过准备时间，以主力转移到宁夏，甘、凉、肃、西宁地区，打通外蒙，新疆，奠定巩固后方，有依靠地向东南发展，并须获得苏联、外蒙的有力帮助。电报还认为，三个方面军“在军事上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战争，（以及）一、二、四方面军的密切配合和政治上统一战线策略的积极运用。”

9月初，任弼时为执行红二方面军东进这个党中央交付的“最重要的任务”，由红军总部返回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他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的两个月中，以中央政治局委员，红二方面军政委，中共西北局副书记的身份，做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他主张大家要在党中央正确路线领导之下，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引导大家关注当时最重要、最紧迫的党和军队内部团结的问题。他说：即使我们和党中央及一方面军会合之后开会，中心还是讨论迎接抗日民族革命运动新高潮的问题。对以前的问题，有冷静的、客观的自我批评，就不再提了。

对张国焘本人，任弼时也多次与他进行严肃、诚恳的长谈。针对张国焘害怕同党中央会合的顾虑，在任弼时将要返回红二方面军前夕举行的中共西北局会议上，任弼时和朱德非常诚恳地劝张

国焘，不要怕和党中央见面，错了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来，不再搞派别活动，这样就不会抹煞自己的功绩和光荣。

但是，张国焘仍不愿意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讲起建设甘南根据地或转兵西进兴致勃勃，滔滔不绝。谈起北上会合党中央，则大谈陕北地瘠民贫，人口稀少，大部队活动余地小。9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复电：“我们意见四方面军宜速以主力占领以界石铺为中心隆（德）、静（宁）、会（宁）、定（西）段公路及其附近地区，不让胡敌占领该线，此是最重着”，“至于一方面军主力如南下作战，则定（边）盐（池）预（旺堡）三城必被马敌占去”，故在未给其重大打击前，不宜离开甘宁边境。

张国焘接电后，致电徐向前、周纯全：“我们大计以快向西北进为宜，同时有利时机不放弃迎击胡敌。”随后，中央虽连电督促红四方面军迅速行动。而张国焘却踌躇不决，按兵不动。

9月16日至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会议。朱德、陈昌浩等坚决主张按照中央指示北上与红一方面军会合，会议讨论并通过了这一意见。20日，张国焘到漳县前敌指挥部后，擅自决定西进部署，23日，在漳县三岔又主持召开任弼时缺席的中共西北局会议。会议采纳了张国焘从永靖、循化渡河的意见。红四方面军遂调集部队西进。红军内部一场新的分裂眼看就要发生。

2、建议党中央马上集中指挥。

这时，率部在甘南成、徽两康地区活动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等认为，集中红军统一指挥权已经刻不容缓。9月19日，任弼时等致电朱德、张国焘和党中央领导洛甫等，建议“马上以军委主席团集中指挥三个方面军作战”，21日，林育英、洛甫、毛泽东等复电：统一指挥十分必要，“我们完全同意任、贺、关、刘四位同志之意见，”以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织军委主席团，“指挥三个方面军”。任弼时等收到党中央和军委制定的《静会战役计划》后，马上电复党中央及朱德、张国焘等：同意上述计划及军委主席团名单，认为“这不独是适合当前军事政治

形势上需要上正确决定”，而且“党内统一团结自可随之解决，这是我党与中国革命最可喜庆之条件”。24日，党中央一面电告任弼时等：“关于统一指挥等问题，正依照你们的提议等待国焘同志等北上商对一切。”一面又电告朱德、张国焘等：表示“完全同意”任弼时的意见与张国焘之间的争论“一概不谈，集中全力与团结内部，执行当前军事政治任务。”

眼看三军会师有望，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恢复在即，而张国焘却一意孤行，坚持西进，阻挠三个方面军会合。这时，任弼时等挺身而出，他们于9月25日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等，一方面认为：“你们提议以洛甫等同志用中央名义统一党和军事方针之领导，我们认为这是为着党的顺利团结，健强党在目前紧急关头中对革命战争领导最适当的建议”，一方面强调：“一、二、四方面军目前行动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迫切要求能协同一致，否则，只有利于敌之各个击破，于革命和红军发展前途有损。”任弼时等还认为，陕北党中央和共产国际有联络，“对国内情况较明了”，而且在各方面，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相当基础，必能根据各种条件订出有利（于）整个革命发展的计划”。所以，“我们已向陕北建议，根据目前情况和三个方面军实际情况，作出三个方面军行动的最后决定”。电报吁请红四方面军“停止在现地区”，听候“陕北之决定”。

针对张国焘违抗党中央指示的无组织无纪律行动，党中央尽一切努力“设法挽救”。9月26日，林育英、洛甫、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等电告任弼时，贺龙、刘伯承，“请你们向国焘力争北上计划之有利，西进将被限制于青海一角，尔后行动困难，且妨碍宁夏计划”。在此前后，党中央还连续电告红四方面军，要求他们放弃西行，速向北进，并准备派出红一方面军主力南下接应。27日，任弼时等复电：我们已电朱、张、徐、陈，请求暂令四方面军停止现地，“以待中央最后决定”。党中央讨论了张国焘西进计划后，两次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名义电告朱德、张国焘、任弼时等，明令禁止红四方面军西渡。因为“一、四方面军合则力厚，分则力薄；合

则宁夏、甘西均可占领，完成国际所示任务，分则两处均难占领有事实上不能达到任务之危险”。所以，“中央认为四方面军仍宜依照朱、张、陈九月十八日之部署，迅从通渭、陇西线北上”，鉴于党中央三令五申，也由于黄河以西气候影响，张国焘被迫重新下达北进命令。9月28日，任弼时等又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详细汇报红二方面军情况。次日，毛泽东等电复：你们尚保存伟大力量，将来发展无量，可为中国革命庆贺”。

10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电告朱德、张国焘并告彭德怀、任弼时等：三个方面军会合后，请朱德、张国焘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决定，统一指挥前线作战，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的报告，朱、张两总下达的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革军委一份，以便密切前后方的联系。11月24日，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周恩来，任弼时，贺龙及一、二、四方面军团以上干部，致毛泽东转党中央、中革军委，表示：“坚决实现军委的战略方针和每个战役的任务”，决心“在党中央及军委的坚强领导之下”，三个方面军指战员团结一致，争取最后的胜利。

建国以来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简介

朱 兆 中

学习毛泽东著作曾经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及其他许多方面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成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一、建国初期党内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

把毛泽东著作作为经典来学习,是从延安整风前后开始的。通过整风,使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同时也使们认识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重要意义。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编辑出版了《毛泽东选集》。此后,东北、晋冀鲁豫、苏中抗日根据地也相继编辑出版了《毛选》,以满足广大党员干部学习的要求。

新中国建立初期,党面临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转变,即以农村为中心转到以城市为中心;以摧毁旧世界为主转到以建设新社会为主。这个转变带来的困难是: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为了使党员干部迅速地适应新形势,做好新工作,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就是当时的重要措施之一。

1950年12月,《人民日报》首次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实践论: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1951年1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的社论,号召广大干部党员、人民群众认真学习这篇文章,并且明确指出:以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来指导自己的各项工作,并通过社会实

践来认识新的历史条件和新的历史任务。1951年成为学习《实践论》的热潮年。据统计,这一年在全国各主要报刊公开发表的学习《实践论》的文章,就有150余篇,还出版了一些辅导读物,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李达的《〈实践论〉解说》。

正当在学习《实践论》的热潮方兴未艾之时,1951年10月、1952年4月和1953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陆续出版。《毛选》的出版为广大党员干部提供了学习的有利条件。在各级党组织的号召下,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毛选》第一卷出版发行后,中共中央各大区分局先后发出指示,动员干部、党员学习和宣传《毛选》。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指出: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最正确最深刻地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创造了最完整的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政策。毛主席的著作不仅被千百次的实践证明是领导中国人民击败各种敌人取得伟大胜利的唯一正确指针,而且是今后巩固和发展人民革命事业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大保证。因此各地党委必须认真组织对于毛泽东选集的宣传和学习^①。

为了推动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活动,许多地方党或政府的负责人带头学习《毛选》,发表学习体会文章。例如河南省长吴芝圃,云南省委书记宋任穷,黑龙江省委书记赵德尊,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湖北省长李先念以及新疆负责人王震、王恩茂、鲍尔汉等都在报刊上发表了文章。党的理论工作者李达、范若愚、沈志远、郑昌、艾思奇等人在《学习》、《新建设》、《中国青年》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学习《毛选》的文章。《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还经常刊登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来信。

建国初期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热潮主要集中在党内,但也带动了一部分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特别是大大激发了民主党派、知识

^① 《中国共产党各地党组织积极准备学习毛泽东选集》,见1951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

分子学习毛著的热情。在《毛选》第一卷出版后，各民主党派的发言人都发表了谈话，高度赞扬了毛泽东的著作，表示一定要认真学习，改造思想。

由于建国初期各项工作紧迫繁忙，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没有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开展起来。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之后，全党的学习、宣传重点就转到总路线上去了。

建国初期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承袭了延安整风时期学毛著的优点，学习毛著不强调对个别词句的记诵，而强调领会其精神实质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学习毛泽东著作被赋予“掌握建设新中国的思想武器”的重要意义。但是，这一时期对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还停留在比较肤浅的层次上。在学习中也出现了个别对毛著的不适当的评价，夸大了毛泽东著作的世界意义，例如称《毛选》是“照耀着全世界人民的明星”，“是东方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革命的指南”等等。

二、全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

1955年7月3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10月17日该报告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这一报告在几个月内，迅速传遍全国农村，不仅成为党员、干部学习的重要文件，而且对广大农民也在不同范围内进行了传达，组织了学习。《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是第一篇深入农村，为农民群众广泛学习的毛泽东著作。这篇著作的传达和学习，大大促进了农业合作化的进程，也为以后群众性学习毛著活动的开展作了准备。

1957年下半年，毛泽东提出了进行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以后，他对于人的精神面貌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越来越关注。这就鼓励了一部分领导人致力于抓思想工作。全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高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开展起来的。1958年——1960年出现了两个学毛著高潮。

1958年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的出现,主要受到以下几个具体事件的影响。第一,各级党组织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各省市党委按照中央有关指示作出决定,安排干部学习理论,规定以毛泽东著作作为干部理论学习的主要内容。例如广东省委全会决定在省内开展认真学习毛著运动,编印毛主席近年来的著作,发给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学习。江苏省委号召全省干部掀起一个学习毛著的运动,要求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要认真学习《毛选》和最近几年毛主席的指示和著作。各级干部学习毛著,带动了群众学习毛著活动的开展。第二,解放军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开展。1958年5月,林彪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发表讲话,要求认真学习毛泽东军事著作。5月14日,《解放军报》发表社论《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军事著作》,向全军发出了学习毛著的号召。接着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通知,规定以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11篇文章为军队干部的必读文章。这样,在军队干部中首先开展了学毛著活动。8月25日《解放军报》发表《人人都来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社论,把学习毛著活动从干部推广到战士,形成了全军学毛著的热潮,并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三,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示范效应。1958年3月,求新造船厂修造车间党支部书记马仕亭等几位工人自发地组织了一个业余学哲学小组,开始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并且尝试用学到的哲学理论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这个小组吸引了许多工人,在厂领导的支持下,全厂开展了学哲学、用哲学的活动。5月19日、6月5日《人民日报》两次报道了该厂工人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解决实际问题的事迹,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应,许多城市的工厂开始仿效求新船厂工人开展学习毛泽东哲学著作活动,从而推动了全国群众性学习毛著高潮的到来。

1958年全国群众性学毛著的高潮是从学习《关于正确处理人

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开始的,7月28日《人民日报》以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报道了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的状况。报道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大跃进的形势下,各地从领导干部到农村基层干部,工人群众和知识分子,都掀起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①。据不完全统计,黑龙江省已经成立了一万多所红专学校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业余政治理论学校,成立了32000多个理论学习小组,参加学习的工农群众有230多万人^②。辽宁省仅沈阳、旅大、安东(今丹东)等10个市、地委的不完全统计,已经建立毛主席著作和哲学学习小组2600多个,参加学习的在5万人以上。北京的高等院校成立了以学习毛主席著作为中心的理论学习小组2100多个^③。

1958年10月《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泽东审阅并同意的重要文献资料《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全国各地的干部和群众立即开始了热烈的学习和讨论。为了推动学习这篇文献活动的深入发展,1958年11月10日中宣部在怀仁堂举办了一个大规模的报告会,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委、中央和北京市的党、政、军、民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出席了报告会,周恩来总理出席并作了报告。报告阐述了毛泽东这篇文献的重要意义,要求在党内外各级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广泛地、深入地学习和宣传。之后,各省市自治区对学习作了新的部署,形成了学习毛著的新一轮高潮。

1958年群众性学习毛著活动是伴随着大跃进运动开展起来的。大跃进的急于求成、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等错误也在一定程度

^① 《全国理论工作空前活跃,各地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见1958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欧阳钦:《劳动人民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新形势》,见《奋斗》,1958年8月第4期。

^③ 《全国理论工作空前活跃,各地干部、工人、知识分子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见1958年7月28日《人民日报》。

上影响了学毛著活动。例如，有些地方一夜之间组织了几十个甚至上百个学习小组，其实真正认真学习毛著的并不多，反映了形式主义倾向。河南登封县三官庙乡的“马列主义学院”给农民讲毛泽东哲学，说：地主压迫农民，穷人就要起来反抗，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地主阶级硬说农民反抗压迫就是违抗天命，这就是历史唯心主义。这种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科学内涵，反映了群众学习毛著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偏向。群众学习毛著不钻研名词术语，注重解决实际问题，这是正确的，但有的地方总结出“需要啥，学习啥”的经验，反映出学习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1960年全国出现了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第二个高潮。它同1958年的高潮一样，是伴随着反右倾、新跃进的形势而展开的。1960年新年伊始，全国各主要报刊杂志都发表了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社论和文章。《人民日报》发表《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月1日），《努力学习、学以致用，谈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月4日）；《文汇报》发表《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1月5日）；《河南日报》发表《怎样学习毛主席的著作》（1月12日）；《四川日报》发表《立大志、下决心，刻苦钻研毛主席的著作》（1月1日）；《青海日报》从1月2日连续发表五篇关于开展学习毛著的社论；《内蒙古日报》从1月到5月发表九论“工农兵群众学习毛著”的社论。其他各省的报纸也都发表了这样的文章。这样强大的舆论声势有力地推动了广大群众投身到学习毛著活动中去。

共青团的倡导在这一时期学毛著高潮中起了重要的作用。1960年1月，党中央批准了团中央《关于开展毛泽东著作的学习运动的提纲问题的请示》。团中央负责人胡克实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了题为《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的文章，提出共青团应当把组织青年学习毛著当作特别突出的任务。3月中旬共青团中央三届六中全会召开，会议号召各级团组织大力组织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4月中旬，共青团中央与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

联合召开了全国青年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黑龙江现场会。全国各地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千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主要任务是交流学习毛著的体会,传播学习毛著的典型经验。黑龙江现场会是第一次全国性的学毛著经验交流会,它的召开进一步促进了全国学毛著活动的开展,也是1960年全国群众性学毛著活动达到高潮的标志之一。

1960年9月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发行。全国学毛著活动的重心立即转到了对《毛选》四卷的学习上来。各级党、团组织都对学习《毛选》四卷作了安排。例如武汉部队某部党委要求领导干部每人每天精读《毛选》第四卷一千字,每周写一篇心得笔记。共青团黑龙江省委发出通知,要求团县委书记以上干部在三个月内将《毛选》第四卷初读一遍,公社以下团干部和积极分子要选读有关文章。中国人民大学从校到系成立了学习领导小组,规定全校师生集中学习《毛选》第四卷四个星期。北京大学规定在政治课上学习《毛选》第四卷。此外,各地许多工厂的工人,甚至一些农民也都主动学习《毛选》第四卷。笔者初步统计,在三个月内,全国各主要报纸杂志公开发表的有关学习《毛选》第四卷的文章就达300余篇。参加学习毛著的人数,据河南一省的统计,干部和知识分子47万人,工人110余万人,农民达1248万人^①。学毛著人数占河南总人口的28%左右。按这个比例推算,全国参加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人数至少在一亿以上^②。

1960年全国学习毛著活动表现出与以往一些不同的特点。第一是形式多样化。以往学毛著主要就是个人自学或小组一起学。这一时期出现了学习毛著的现场交流会、报告会、讨论会、座谈会、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等等。这些形式重在交流学习经验,这就突破了原

^① 嵇文甫:《河南工农群众热心学习毛主席著作》,见1960年4月9日《人民日报》。

^② 1960年河南省人口约为4848万;全国总人口约为6.6亿,见《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来基本上是封闭的学习方式,使得学习毛著活动普遍进行横向比较,结果促使落后向先进看齐,学毛著活动愈益发展。第二,各地扶植、涌现出了一批学毛著积极分子。例如坚持学毛著三年的徐桂攀(《湖北日报》1960年9月26日报道)、贺双银(《新疆日报》1960年5月18日报道);五年坚持学毛著的董仁亲(《新华日报》1960年4月11日报道);六年不间断学毛著的《叶百灵》(《江苏教育》1960年第8期刊载);八年坚持不懈学毛著的马炳振(《河南日报》1960年10月5日报道)、董仁彬(《江西日报》1960年7月1日报道);九年刻苦学毛著的牛补全(《包头日报》1960年4月24日报道);更有十年如一日学习毛著的郁善伟(《解放军报》1960年4月15日报道)、马演行(《天津日报》1960年3月2日报道)、于福海(《四川日报》1960年6月24日报道)等等。从这时候起,“学毛著积极分子”就成为一个荣誉的称号,成为政治上进步的一个标志。

1960年的群众性学习毛著活动,从中央指导思想上看,有其正确的方面,首先,在提法上,都用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著作”。这实际上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毛著的关系,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其次,在一些刊物上对学习毛著作了正确的指导。例如中共北京市委的理论刊物《前线》在社论中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只有学习毛泽东同志在各个时期一切方面的重要著作,才能深刻地理解它,牢固地掌握它。”^①但是,这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贯彻,1958年学毛著活动中出现的一些偏向也没有得到有效的纠正。

三、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的畸型发展

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后期,是“文化大革命”的酝酿、发动和持续时期。在这一时期,学习毛泽东著作被不适当地放到一切工

^① 《战无不胜的哲学》,见《前线》1960年第19期。

作的首位,学习毛著活动走入了歧途。

60年代中期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是解放军大学毛著带动起来的。自从林彪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来,就大力提倡学习毛著。到60年代初期解放军官兵中学习毛著已经形成制度,蔚成风气。以后陆续涌现出了雷锋、王杰、廖初江、丰福生、黄祖示等学习毛著的典型,对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63年1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学习解放军加强政治工作的批示,充分肯定了解放军的学习活动做法。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社论高度赞扬了解放军大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指导自己工作的做法,这样,全国学习毛著活动又蓬勃开展起来。

随着“文化大革命”序幕的拉开,各级党组织逐步把学习毛著放到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1966年1月16日,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深入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文件发出后,中南局所管辖各省区很快作出了贯彻执行部署。甚至有的不属于中南局的省,如河南省委也作出了贯彻中南局决定的指示。接着,中共中央华北局、东北局、西南局相继召开会议,作出关于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定。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纷纷作出贯彻执行的决定或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把学习毛著放到一切工作的首位,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新高潮。1966年2月,中央下发了《中央转发各单位关于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批示》,批示在肯定加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正确地指出要反对学毛著运动中的“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等偏向。但是这个正确意见并没有在实际活动中得到贯彻。

1966年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发表。公报指出:全党全国学习毛泽东同志著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林彪同志号召人民解放军在全军开展学习毛泽东著作的群众运动,为全党全国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对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方法,是行之有效的,普遍适用的,应当进一步在全党全国推

广。10月1日,林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讲话,号召:“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我们要把全国变成为一个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与此同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也发表国庆社论,号召大学毛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七亿人民。从而使全国“到处都是《毛主席语录》的红色海洋,到处都是诵读毛主席著作的响亮声音”。

10月9日,林彪号召人民解放军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人民日报》很快发表社论指出:“这个指示,不仅对全军,而且对全党、全国人民都完全适用,都极为重要,极为适时。”社论还提出:“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一条抓好了,突出了政治,人的思想革命化了,一切工作就都能带动起来,都能做好。”^①这实际上就是把学毛著凌驾于一切工作之上。在这样强有力的动员和号召之下,全国学毛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规模开展了起来,不但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大中學生、农民积极学习毛著,而且一些家庭妇女、老年人、小学生也都学习毛著^②,甚至还出现了文盲学习毛著积极分子顾阿桃等,出现了几乎人人学毛著,个个背语录的“热烈”场面。

在此后“文化大革命”中,学习毛泽东著作,包括学习毛泽东“最新指示”,始终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政治任务。

“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后不久,全国还出现了一个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高潮。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决定》,号召“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中,开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群众运动,掀起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这一次学习高潮

^① 《学习毛泽东思想,必须认真地学,刻苦地学》,见1966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② 1967年2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规定小学五、六年级学生学习毛主席语录,学习老三篇等等;一、二、三、四年级的学生,组织他们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

尽管没有了“文革”时期一哄而起的狂热场面,但就从各级组织的安排,参加学习的群众等方面看,不亚于“文革”时期学毛著的规模。

60年代初到70年代后期出现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高潮还受到以下二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第一,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错误的影响。从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党内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为了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必须造就具有高度“阶级斗争觉悟”的人,学习毛泽东著作就成了提高“阶级斗争觉悟”的最重要的途径之一。1963年《中国青年》第19期发表一篇社论指出:毛主席著作的每一篇都贯穿着最彻底的阶级斗争的学说;我国青年只有学习和掌握了阶级斗争学说,才能有鲜明的阶级观点,有坚定的革命立场和彻底的革命精神,成为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①。“文革”期间,学毛著是最经常最普遍的活动,但学习的内容除了“老三(五)篇”之外,主要就是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著作和论述。1977年出版发行的《毛选》第五卷是按照阶级斗争为纲的线索编辑的,学习的核心内容是毛泽东关于建国以来阶级斗争的论述。因此,这一时期的学毛著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而展开的,毛泽东著作中其他丰富的内容都不同程度地被忽略了。

第二,受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影响。建国以来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有一个发展过程。1958、1960年的学毛著高潮就已经受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因素的影响,但那时候这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间接的,也就是说推动群众学习毛著更主要的是因为学习毛泽东著作对实际工作具有指导意义,在“文革”时期,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发展到了极端,这时推动群众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主要因素是对毛泽东无限敬仰的感情,学习毛著实际上变成了向毛泽东表忠

^① 《进一步组织青年学习毛泽东著作》,见《中国青年》1963年第19期。

心的一种方式。因此“文革”时期出现了亿万群众一哄而起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场面。

这一时期全国学习毛著活动出现了严重的偏向。第一，形式主义。由于学习毛著被赋予了复杂的政治含义，因此重要的已不再是学习的内容与实效，而是学习本身。是否学习毛著成为衡量一个人、一个单位的政治标准之一。这样，学习的形式与对学习的宣传必然更为人们所重视。这一时期出现的“毛主席著作天天读”以及从上到下召开的学毛著讲用会，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随身携带的“红宝书”（即毛主席语录）等等就是其典型表现。第二，实用主义。这是林彪对学习毛著的一贯态度。早在50年代末他就说毛泽东著作容易学；是学习马列主义的捷径；学了马上可以用，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他提出“有些警句最好要背熟”，“脑子里就是要记住那么几条”。1960年10月，林彪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学习毛著“要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这集中反映了他对学习毛著的实用主义态度。以后，随着林彪政治地位的上升，这种实用主义的学习态度越来越严重地影响了群众性学习毛著活动，理论联系实际被歪曲成“需要什么，就学什么”。在“文革”期间，对毛著的活学活用成了“语录对号”，毛著被不顾时间、地点、场合随意引用；在派性盛行的时候，毛著语录还成为保护自己攻击他人的手段。第三，庸俗化。毛泽东的著作和指示被称为“句句是真理”，“字字闪金光”。学习毛著不但被放到了一切工作的首位，而且被夸大为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被赋予了无所不能的力量。报纸上经常宣传，工人学毛著攻克了“资产阶级权威”解决不了的难题；农民学毛著战胜了自然灾害取得了丰收；医务人员学毛著治愈了各种顽症等等。

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全国群众性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参加人数最多，持续时间最长的时期，但是由于受思想政治方面左倾错误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学毛著活动走入了歧途。

四、实事求是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阶段

把学习毛著活动引上正确发展道路的是邓小平。早在1975年9月,邓小平就指出:林彪主张学“老三篇”(后来加成“老五篇”)是割裂毛泽东思想。怎么能够只把“老三篇”、“老五篇”叫做毛泽东思想,而把毛泽东同志的其他著作都抛开呢?怎么能够抓住一两句话,一两个观点就片面地进行宣传呢?^①“文革”结束后,邓小平致力于纠正“文革”的左倾错误,端正党的思想路线。他及时提出,必须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他一再强调要掌握毛泽东思想体系,不能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他深刻指出:最早是林彪搞乱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他搞了那个语录本,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搞得支离破碎,而不是让人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来思考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②。为此,邓小平建议:除了做好毛泽东著作的整理出版工作之外,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③。邓小平的这些论述,不仅对于纠正“文革”错误、恢复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有重大意义,而且也为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实事求是地评价了毛泽东,指出了毛泽东著作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阐明了贯穿在毛泽东科学著作中的活的灵魂。《决议》为实事求是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作出了具体的指导,开拓出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新阶段。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34页。

② 同上,第175页。

③ 同上,第40—41页。

在这一时期，党中央还坚决反对了那种否定毛泽东，贬低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观点，明确提出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要两个文明一起抓。学习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正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措施之一。1991年7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第二版的通知》。中央在通知中指出：《毛选》一至四卷应是今后长时期内对干部群众包括青年学生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基本教材。各级干部特别是县以上领导干部应当把《毛选》作为常备必读的政治课本，经常地坚持不懈地学习。

《毛选》四卷第二版出版发行后，各级党组织纷纷对学习作出了安排，推动了全国学习毛著热潮的出现。这一次学习毛著的热潮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既提倡广大干部、群众学习，又不搞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既提出学习的计划和要求，又没有“雷打不动”的规定，更不搞过去那种形式主义的讲用会、报告会。第二，在学习中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著作。首先，区分了毛泽东著作与毛泽东科学著作，区分了毛泽东著作中的正确方面与失误方面。学习毛泽东著作，主要就是学习其科学著作，学习毛著中的正确方面，对于毛著中的失误的地方进行实事求是的剖析，吸取教训。其次，对于毛泽东科学著作，既充分肯定她是我们党的宝贵的思想财富、理论宝典，但又不把她绝对化，神圣化，不把她看成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万应灵药。第三，力求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著作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把毛著与马列著作，党内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特别是邓小平的著作结合起来学习和研究，从整个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体系上去理解毛泽东著作。第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特别是从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学习和研究毛泽东著作。

建国以来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建国初期和50年代中期，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尽管有缺点，但基

本上是健康发展的；60年代初到70年代末，学毛著活动走入了歧途，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毛著活动走上了正确发展的道路。

建国以来全国学毛著活动产生的积极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在相当程度上普及了毛泽东思想，造成了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群众基础。第二，在相当程度上增进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和自信心，培养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第三，在相当程度上教育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保持艰苦朴素、克己奉公、认真负责、努力工作的作风，培养了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先人后己的道德品质。

历史是一面镜子。回顾过去的学习毛泽东著作活动，有利于我们吸取教训，在今天更好地学习毛泽东著作和邓小平著作，更好地掌握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

红卫兵运动始末

关海庭

(一)

红卫兵运动发源于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1966年5月初,清华附中某班班长就讨论《海瑞罢官》问题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谈其对《海瑞罢官》的认识过程。另外两个同学在编辑这份汇报时加了“编者按”,提出“要突出政治”,结果引起了全校的大讨论,同时,在这一问题上,一些学生和校领导发生了分歧。学生认为校方不积极引导讨论,是不突出政治的表现。校方说学生们这样对待党组织很危险。到了5月中旬,部分学生和校方的矛盾已经到了一触即发的程度,每天两种意见都在激烈辩论。某日,两位同学在一起讨论这些问题时,一个同学说他写的小字报署名叫“红卫兵”,另一个同学觉得这个名字很贴切,便说今后凡是和我们意见相同的小字报都可署名“红卫兵”。这个意见后来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5月25日下午,北京大学的聂元梓等人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在大字贴出的短短半天时间内,北大校内自发地贴出了1500余张大字报,其中绝大多数是对聂元梓等人的这张大字报加以驳斥和揭露。由于清华附中距离北京大学比较近,当日下午,清华附中的学生成群结队的去北大看大字报,并围绕着大字报和各种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5月29日,高年级的部分学生在讨论形势和对策时,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清华附中红卫兵。这一天后来被看成是红卫兵的誕生日。

6月1日晚8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6月2日,各报又转载这个“第一张大字报”。同日,清华附中

的几个学生,在主楼门厅的墙上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表示“坚决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相继有一百多人在“红卫兵”三个字后面签了名。随后,北京各中学学生纷纷涌到清华附中观看大字报,并以某校红卫兵的署名来表示他们对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支持。“红卫兵”这一名称不胫而走,出现在各个校园。最早的红卫兵组织一般都是以班级和学校为单位。红卫兵各级领导机构的名称也不统一,班里面有的叫“核心组”,学校里面有的叫“总部”。加入红卫兵的手续也不是很严格,但第一重要的条件是家庭出身。

清华附中贴出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后,引起了一定的思想混乱,后来上级派工作组进驻学校。工作组明确表示校方压制学生,犯了错误。这使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小将”大受鼓舞,把工作组视为党中央对他们的支持。在这种背景下,6月24日,清华附中又贴出了题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署名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大字报的核心内容是“造反有理”,提出“修正主义统治学校十七年了,现在不反,更待何时?”“革命者就是孙猴子,金箍棒厉害得很,神通广大得很,法力无边得很,这不是别的,正是战无不胜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大字报出现以后,工作组质问有关人员“造反”两个字如何解释?现在是共产党领导,要造什么反呢?这些“红卫兵小将”拿出了确凿的根据——1966年6月5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摘引的毛主席的一段语录:“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工作组的同志惊愕不已,又亲自去对证核实。后来,这些“红卫兵小将”可能觉得有些问题阐述得还不十分清楚,又于1966年7月4日写了《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7月27日写了《三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进一步提出“造反是红卫兵要继承和发扬的传统。我们过去造反,现在造反,将来还要造反!”7月28日,在海淀区的一次文化革命工作大会上,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把前

两论递了上去，请到会的江青转给毛泽东。8月1日，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复信说：你们在7月28日寄给我的两张大字报以及转给我、要我回答的信，都收到了。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要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3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负责人被召到钓鱼台，给他们看了《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当时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全会印发了毛泽东的这封信。

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信公开发表之后，红卫兵立即成为最有光彩的称号。各个学校的学生纷纷放弃原来五花八门的组织名称，而统名于“红卫兵”。这对红卫兵运动来说无疑是一嘹亮的前奏。

(二)

1966年8月18日，经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安排，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革命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接见过程中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宋彬彬将一个红卫兵袖章佩戴在毛泽东的左臂上。这次接见以后，“红卫兵”对毛泽东的崇拜达到了一个新高潮，也使红卫兵运动达于鼎盛时期，这表现在几个方面：

1、红卫兵的大串连活动。红卫兵运动在刚刚兴起时，外地的红卫兵仿照北京各校的作法，层层揪斗各级领导，当遭到了部分领导和群众的反对时，这些红卫兵为了寻求支持，四处活动，各方联络，北京自然成了他们关注的热点，到北京来的外地学生逐渐增多。8月16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策划下召开的“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上，陈伯达对他们的行动表示了“热烈地支持”，并要求他们依靠自

己,推进运动。而频频与外地师生接触的北京师生,听到了上访人员愤怒的控诉和声泪俱下的求援后,纷纷走出北京,去外地“煽风点火”,进行革命大串连。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后,这种串连又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容,就是去北京见毛主席。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当中,仅到北京大学串连的就有212.4万人次,其中8月12日一天就达17.9万人次。8月31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第二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和北京的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会上正式肯定了全国大串连。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通知》规定:从9月6日起,外地高等学校学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全国大串联这一活动形式由中央和国务院通过文件肯定了下来。此后,参加大串连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越来越多。然而,有限的交通工具无法满足无限的人员流动的需要,中国出现了交通运输史上罕见的载运量高峰。长途汽车、内河船只、海运轮船,特别是火车的超载都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满载一百余人的一节火车车厢,可以乘坐到二三百人。茶几上、椅背上、行李架上、过道上、椅子底下、厕所里,到处都是人。由于上下车的人多,特别是在车站上等车的红卫兵,为了参加串连,破窗而入。由于交通工具的超负荷长时间运行,大大缩短了各种交通工具的使用寿命,特别是火车,车厢行李架普遍断裂,车箱内的设备也被毁坏。这种交通线上的混乱情况在全国十分普遍。

但是,即使是这样,相当一部分红卫兵还是无法正常利用交通工具去北京。大连海运学院的15名学生,为了早一点起身进京,决定徒步而行。8月25日,他们举着“大连——北京长征红卫队”的红旗,开始了自己的步行旅程。历经近一个月的艰辛,行程两千余里,终于到达了北京。此时,国内的交通因为串联已拥挤不堪。为

了减轻运输压力,10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社论,赞扬“大串联是群众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伟大创造”,而“不坐火车汽车,徒步行军进行大串联,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创举”。“希望各地的革命学生,在自愿和可能的条件下,也这样做”。此后,全国各地都出现了积极响应步行串连的红卫兵。一支支被命名为“孺子牛长征队”、“延安长征队”、“井冈山长征队”、“女子长征队”的红卫兵串连队伍开始在各地出现。这些长征队主要的行进目标是北京,也有相当多的长征队前往井冈山、延安等地。红卫兵长征队在行进过程中,经常组织召开各种群众大会,进行讲演,对扩大红卫兵的影响起了极大的作用。

尽管徒步串联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是,乘车串联造成的交通紧张状态仍然毫无缓和的趋势,引致了各方面重重矛盾,特别是事故频繁,严重地影响了各地的社会治安。有的学生几天几夜挤不上火车,就砸碎车窗跳进车厢,有的便用车站上的水笼头往车里滋水,更有甚者坐卧在铁轨上面不让列车启动,还有的扒车,露宿在车顶而翻滚到车下,人身事故多次出现。为此,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0月29日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联的紧急通知》。11月16日、12月1日又连续发出通知:一律暂停乘火车、轮船、汽车来北京和到各地进行串联。1967年2月3日,中共中央终于决定:停止全国大串连。

2、红卫兵的破“四旧”活动。所谓“四旧”,是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个词最早出现于1966年7月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再论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大字报把“四旧”视为“修正主义的东西”。1966年8月18日在“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上,林彪在讲话中公开鼓动:“我们要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要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权威,要大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在林彪等人的公开支持下,一场由在北京发起的“破四旧”、“立四新”活动迅速传遍

全国。这个活动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破四旧范围仅限于北京，其矛头指向人们的一些生活习惯和工作单位的名称。从8月20日开始，北京二中、十五中、六十三中的红卫兵最先走上街头，“到处张贴革命传单和大字报，举行集会演说，向一切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了猛烈攻击”。这种“破四旧”的行动首先是以“改旧名”为突破口的。顷刻之间，北京市公共汽车站的站牌都涂写上了“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改掉旧站名，建立新站名”的标语。红卫兵每到一地，几个人一商量，大笔一挥，名字就改过来了。长安街改为“东方红大路”、“东交民巷”改为“反帝路”、“西交民巷”改为“反修路”、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所在地“光华路”改为“援越路”、“东安市场”改为“东风市场”、“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同仁医院”改为“工农兵医院”、“全聚德”烤鸭店改为“北京烤鸭店”、“亨德利钟表店”改为“首都钟表店”、“蓝天时装店”改为“卫东服装店”等等。有些服装店的门上，还贴上了充满革命激情的对联：“革命服装大做特做快做，奇装异服大灭特灭快灭。”横额是：“兴无灭资”。接着，这种“破四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人们正常的生活习惯横加指责。有些红卫兵组织到处贴出警告、通牒一类的大小字报，规定：妇女一律剪成三八式齐耳短发，不许穿高跟鞋，不许穿裙子；男人不许留“飞机头”，不许穿牛仔裤。许多机关、学校门口和主要街道的路口，都设有红卫兵用桌椅摆成的“破旧立新”站，检查过路的行人有无“奇装异服”，并为行人剪剃“革命”发式。显然，个人的生活习惯，街道、单位、物品的名称，都被当做旧风俗、旧习惯加以干涉和改变。

第二阶段：破四旧运动从范围上迅速扩展到全国，发展到人身迫害，破坏文物，冲击涉外单位。8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北京红卫兵大破“四旧”的消息后，23日，全国各大报以“新华社二十二日讯”的形式在头版登载了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浪潮席卷首都街道，红卫兵猛烈冲击资产阶级的风俗习惯》的报道。《人民日报》还在同一版刊登了《好得很》和《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

命学生》两篇社论。社论明确指出：“‘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好得很！”“革命的学生们组织‘红卫兵’、‘红旗战斗小组’等等革命组织，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合法组织。他们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是合法的行动。谁要反对革命学生的革命行动，就直接违背了毛主席的教导，违背了党中央的决定”。这样一来，不仅把“破四旧”运动推向全国，而且使北京的“破四旧”运动进入了新的高潮。

从8月23日清晨开始，上海成千上万支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组成的宣传小分队，抬着毛主席巨幅画像，举着“我们是旧世界的批判者”，“我们是新世界的创造者”的大型横幅标语牌，走上街头，演讲、散发传单、张贴大字报，还在大型剧院召集群众大会，进行宣讲。商店林立的南京路，成了红卫兵关注的重点。红卫兵不停地高喊：“今天，我们要在这里彻底闹革命，用我们的铁扫帚彻底扫除资产阶级的‘香风’、‘臭气’！”一霎间，各店铺的橱窗都被大字报封住，纷纷开始了更名活动。天津的“破四旧”也是从8月23日开始的。这一天，商业中心区滨江道一带，从早至晚，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中原公司的职工贴出决心书，在店前设立了接待站，征求红卫兵和过路行人对更改店名的意见，最后决定改为“工农兵商场”。全市最大的商场——劝业场，改名为“人民商场”。与此同时，全国各大城市如郑州、杭州、成都、广州、武汉、长沙、南昌、济南、合肥、南京、福州、哈尔滨、长春、沈阳、南宁、贵阳等地无不受到红卫兵“破四旧”行动的冲击，街名、店名、商标名、茶名、房名，都被改为“革命化”的名字。

随着运动的发展，“破四旧”不断升级。一是从形式上的“更名”发展到破坏名胜古迹。北京的旅游圣地香山、碧云寺、卧佛寺、八大处等公园成了红卫兵“破四旧”的重点对象，他们把山间亭阁里的小尊佛爷像和亭匾、字画，统统换成毛泽东画像。有1300多年历史的古刹戒台寺，戒坛上的大佛和周围数以千计的小佛，全部被砸光。人们熟知的白塔寺、潭柘寺、团城、圆明园遗迹也遭到令人痛心的破坏。杭州西湖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平湖秋月碑牌、虎跑的老虎

塑像、岳王坟的岳飞、秦桧像，都不翼而飞了。座落在广东省海口市郊滨涯村的海瑞墓由于受《海瑞罢官》风波的影响，当然也在劫难逃，海瑞墓及附近的石器都被砸毁。11月中旬，北京师范大学一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谭厚兰带领二百多名红卫兵到山东曲阜，串连当地一些学校的造反派，成立“彻底捣毁孔家店革命造反联络站”，砸毁国务院为孔庙、孔村、孔府竖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牌，并刨古坟、烧古籍、砸古碑、毁文物，共破坏文物6618件。二是从干涉人们正常的生活习惯发展到人身迫害。8月23日下午，红卫兵将北京市文化局的负责人赵鼎新、张梦庚以及著名作家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著名艺术家荀慧生、白芸生等三十余人，分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等大牌子进行批斗。他们当场全部被剃成“阴阳头”，一些人的头上还被倒上了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围跪在火堆周围，一面用火烤，一面用演出道具和带铜头的皮带抽打。极少数红卫兵甚至私设公堂，滥施酷刑，打人致残致死。三是从干涉平民的言行发展到干涉外国人和涉外单位及民主党派的正常工作。8月24日，十几个中学的红卫兵，冲进设立在东单三条的玛利亚方济格修女会，提出驱逐“披着宗教外衣从事间谍活动”的罗马修女。同时，北京的各种宗教设施也都受到冲击，通令宗教职业者还俗的浪潮一个接一个。政协和民主党派也被勒令解散。

第三阶段：“抄家”狂风的刮起，是“破四旧”运动发展到极端的标志。“抄家”做法的出现，与当时林彪、“四人帮”一伙推行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第一，1966年8月22日，公安部发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通知指出，“镇压革命学生运动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能允许”，要求各级公安部门“不准干涉学生的革命行动”，“如革命学生打了警察，不准还手”。同时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同意公安部的规定，希各级党委遵照执行”。第二，1966年8月下旬，公安部某领导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过去规定的东西，不管是国家的，还是公安机关的，不要受约束。”“群众打

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这使得公开践踏宪法的打人、抄家等残害人民生命财产的活动开始出现。第三，当时的舆论导向，也助长了“破四旧”向打、砸、抢、抄的方向发展。正是由于上述几个原因，在1966年8月30日至9月初，抄家的狂风席卷全国。北京大学两千多名教职工中，有一百多人被抄家。上海的一些著名的艺术家被抄家，大批有价值的个人财产被破坏。而伴随着狂风的刮起，是令人发指的人身迫害。

这次席卷全国的“破四旧”活动，到1966年9月中旬开始逐渐降温。这其中有三个原因：第一，林彪、“四人帮”一伙操纵红卫兵造反的目的是要以此搞乱全国，达到打倒一大批老干部的目的。他们搞乱全国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便开始把矛头直接转向老干部。林彪在1966年8月31日和9月15日的两次讲话中，反复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第二，从1966年9月初开始，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运动达到高潮，大部分红卫兵外出串连，在一定程度上也冲淡了“破四旧”的活动。第三，“破四旧”运动在社会上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感，并程度不同的遭到了人民群众的抵制。为此，中共中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相应制止了一些极端的行。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用文斗，不用武斗》的社论，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一些打人抄家的做法。9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保障党和国家机密安全的规定》，指出红卫兵不许冲击要害保密部门。舆论导向也朝着降温的方向转变。9月21日《人民日报》开设“和红卫兵谈心专栏”，发表邱少云的弟弟邱少全的题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文章，告诫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加强纪律性，听从指挥。这些对制止红卫兵的极端行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3、红卫兵的“红海洋”活动。应当说，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与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关。1966年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附中红卫兵，表示支持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当这封信公布之后，在红卫兵心

目中,毛泽东的形象更加高大了。但是确切地说,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出现于红卫兵运动之前。1966年6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在头版头条登载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宣传教育要点》,以醒目的大号字体《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作标题。次日,两报又同时登载了《解放军报》社论《毛泽东思想是我们革命事业的望远镜和显微镜》,指出,“毛主席是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命根子。不论什么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权威’,谁反对毛泽东思想,我们都要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这些带有个人崇拜的文章、词句,在以后的报刊上经常出现。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林彪、江青一伙利用红卫兵的朴素感情,掀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崇拜热。8月18日,林彪在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高司令是我们毛主席”。在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林彪的讲话首次使用了“四个伟大”的提法,即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此后,随着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对领袖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更高的阶段。红卫兵们手拿毛主席语录,高喊“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种狂热的场面通过新闻媒介传送到全国各地,从而导致全民性的个人崇拜。由此可见,“文化大革命”中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与红卫兵运动有直接关系,但又不能完全归之于红卫兵运动。它是中国特殊的社会基础和林彪、江青一伙的利用与煽动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8次接见外地来京的师生和红卫兵,达1100多万人次。这极大地推动了红卫兵运动的向前发展,也是红卫兵运动发展到高潮的标志。

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广大参加红卫兵的学生,除极少数外,绝大多数是出于对领袖的信赖,认为是在“保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进行“反修防修”的斗争。他们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从一开始就被林彪、“四人帮”等人所利用,打着“造反

有理”的旗号，到处冲击，破坏极大，是造成全国性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文化大革命”起了推波助澜作用。

(三)

红卫兵运动在其组织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一些起伏。1966年9月6日，以蒯大富等人为头头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首都第三司令部”、简称“首都三司”）成立。这是红卫兵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也是红卫兵运动走向分裂的开始。因为这一派红卫兵组织大多都是1966年8月18日以后陆续成立的。我们称之为新红卫兵，而在此前成立的红卫兵组织，我们称做“老红卫兵”。二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异。老红卫兵的政治主张主要反映在：1966年6月24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发表的《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8月26日北京二中红卫兵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向旧世界宣战》；8月27日红卫兵战校（前清华附中）红卫兵发表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些红卫兵有以下几个基本特点：第一，认为革命的目的是“反对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具体来说是社会上的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教育界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第二，奉行“在中央、市委的统一具体领导下再动手”；第三，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以教学班或学校为单位组建的；第四，组织成员以中学生为主，其中相当一部分组织者为高级干部子弟。而新红卫兵组织的基本特点是：第一，造反的矛头指向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具体来说是共产党内部的领导人；第二，造反的形式是“踢开党委闹革命”；第三，红卫兵的组织形式是跨教学班，甚至是跨学校的；第四，组织成员中大多是高等学校的学生。显然，新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是受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逐步形成的，因而，这些红卫兵也完全成为中央文革小组控制的造反工具。

11月27日，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一些老红卫兵重新组成一群众组织称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在

政治倾向上开始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它支持的造反派，主张保护老干部。一些成员在行动上也搞打、砸、抢。以“首都三司”和“联动”两个组织的成立为标志，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是红卫兵的组织日益向社会化方向发展。在此以前的红卫兵组织都是以本单位为基础组建的，冠以什么“战斗小组”，“红旗小组”等等，而在这以后，跨单位、跨系统的社会性红卫兵组织不断涌现。比如长春市成立了“长春市红卫兵总部”，成都成立了“红卫兵成都部队”等等。这些组织都开始把矛头指向各级领导，特别是当地省、市一级的领导干部。这种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的出现和斗争方向的变化，为以后红卫兵运动的进一步分裂创造了条件。二是红卫兵内部开始出现分化，逐步形成派系，导致内讧。

导致红卫兵组织分裂的最初起因是“血统论”的争论。应该说，红卫兵组织刚一出现，就已经蕴藏着分裂的因素。因为最初的红卫兵组织基本上是由“红五类”出身的人们组织的，这个“红五类”大致包含贫农、工人、革命干部等出身的人，是一种带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1966年7月29日，北京航空学院附属中学学生中的干部子女，贴出了一副引人注目的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从对联的本意来分析，是宣扬“血统论”，但从它的客观效果上来看，导致了子女之间高低贵贱的区分，使工农子弟和干部子弟之间产生了矛盾。一些干部子弟把父母的旧绿军装与红卫兵袖章配在一起，通过各种方式显示自己的出身“高贵”，而一些农民子弟在某些地方酝酿成立“贫协”的风潮，以抗击一些干部子弟的“血统高贵”的言行。这样，围绕着“血统论”在红卫兵组织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实际上，“血统论不但伤害了出身不好的青年学生的感情，也引起了一些出身工农子弟的反感，客观上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林彪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多次讲话中，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实践中，一批批革命干部被纷纷打倒，这无疑会触伤一些

干部子女。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时期，他们一直走在最前列，而随后这些自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从里到外都红透了”的部分高干子弟，已经觉察到“革命”就要“革”到自己头上了。同时，也有一部分红卫兵对“中央文革小组”一些人到处煽动揪打老干部产生怀疑。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1966年11月27日，北京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的一些老红卫兵（其成员相当一部分是干部子弟），在北京大学附中，秘密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在政治上反对中央文革小组和它支持的“首都三司”，主张保护老干部。12月5日，他们发布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的宣言。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一些人对中央文革小组的非常做法提出了异议，喊出了“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坚决批判中央文革小组某些人为首的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会后，他们在全市各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提出“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揪出三司后台，枪毙三司后台”。又于12月28日，12月31日两次组织力量冲击公安部。1月初，“联动”的一些骨干分子臂戴袖章，骑着自行车疾驰在大街小巷，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个别成员也搞打、砸、抢。1月21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彻底批判联动大会”，接着，联动设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大附中、人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等“联动据点”先后被摧毁，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力量也先后被镇压，联动的头头遭到逮捕。1月31日出版发行的《红旗》杂志1967年第3期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指出：联动是反革命组织，“对于反革命组织，要坚决消灭。对于反革命分子，要毫不迟疑地实行法律制裁！”从而掀起了整个社会对联动进行“大围剿”的浪潮。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直接控制下的“首都三司”却越来越得势，并成为揪党内走资派的急先锋。

此后,各地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跨行业的)。当时全国几个比较著名的红卫兵组织有:红卫兵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同济大学东方红兵团、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第三司令部)、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红卫兵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赤卫军上海市大专院校革命委员会、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上海第一医学院革命造反联合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革命造反指挥部、上海交通大学反到底兵团、北京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新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等等。

(四)

从1967年1月开始,红卫兵参加了全国各地的夺权斗争,这使红卫兵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以上海市32个“造反派”组织的名义,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风暴”。这32个组织中,有13个是红卫兵组织。此后,各地的红卫兵组织又开始串连,策划各种各样的夺权行动。主要是想夺上级领导部门和其他单位的权,一些红卫兵组织纷纷在各地设立联络站,干涉其他地区和单位的夺权斗争。上海夺权的32个组织中,有5个是北京、西安等地红卫兵组织的驻沪联络站。这种全面夺权运动的展开,对红卫兵组织产生的影响也是极大的。一是红卫兵组织为了扩大影响,向省市领导机关夺权,纷纷成立规模更大的跨学校的群众组织,既使是在本校内部,也更换名称,扩大组织,以便在夺权斗争中居于主导地位。二是这些组织由于在夺权的具体问题上出现分歧,明显的分裂为两大派组织。红卫兵组织的分裂日益社会化。为此,中央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1967年2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供讨论和试行用)》。其中规定:从3月1日起,中学师生停止外出串连,一律返校,一边上课,一边闹革命,分期分批进行军政训

练。“上课学习毛主席著作，批判旧教材和教学制度，复习数、理、化、外语和各种必要的常识。要在大联合的基础上，由革命学生、革命教职员和革命领导干部民主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负责领导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并具体安排上课。3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专院校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下厂下乡和在外地串连(包括参加外单位夺权的和设在外地的联络站)的革命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日前返回本校，参加本校文化大革命。”并要求“大专院校的革命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应该在运动中整顿、巩固和发展。”“红卫兵应该以劳动人民家庭(包括工农兵和革命干部以及其他劳动者)出身的革命学生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学生，对毛主席有深厚感情，有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贯在政治思想上表现比较好的，也可以参加。”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指出：“中小学的革命师生，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有了很多的贡献。目前，文化大革命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的新阶段。”“摆在中小学革命师生面前的光荣任务，就是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复课闹革命。”3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毛主席关于《天津延安中学以教学班为基础实现全校大联合和整顿巩固发展红卫兵的体会》的批示。毛泽东在批示中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进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此后，各地大、中、小学的军训工作即全面展开。军训团所到的学校，师生陆续返校。一些单位解散了为数众多的跨班级、跨部门、师生混合的红卫兵组织，实行按教学班为基础的大联合。并仿效部队的班、排、连、营建制建立红卫兵组织。3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暖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3月20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要求“查抄地、富、反、坏、右或其它不法分子的财物，除日

常生活必需品退给本人以外，一律上交”。“确属革命群众和劳动人民被错抄的财物，应全部退还本人。”“贪污、盗窃和私用查抄财物者，应自觉退出上交，否则严加处理。”中央当时的基本精神是要求红卫兵们都要回本单位有组织地从事活动。在这种背景下，1967年2月22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3月25日，首都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成立。“红代会”的成立，应该看做是红卫兵运动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它是红卫兵按学校和教学班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开端。红代会最初是红卫兵“造反派”的联合组织，后来却成为受党政领导的正规群众组织。随后，不少地方都仿效北京纷纷成立各级“红代会”。

但是另一方面，中央又对红卫兵以前的造反活动给予充分的肯定，并通过各种方式扩大红卫兵的影响。1967年6月2日，“首都红卫兵革命造反成果展览会”在北京展览馆开幕。这是根据林彪1966年10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举办的。展览会展示了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冲击领导机关、“大串连”的图表和实物。此外，更为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通过各种途径扩大红卫兵的对外影响。比如，红卫兵参与外事活动，从1966年10月起，《人民日报》以“世界革命人民热烈赞扬中国红卫兵的革命行动”为题头，多次报导刊登日本、哥伦比亚、坦桑尼亚、老挝、尼泊尔等国青年的文章，赞扬中国红卫兵的造反行动。1967年6月21日，以姚文元、谭厚兰等7人组成的中国红卫兵代表团，应邀参加阿尔巴尼亚劳动青年联盟第五次代表大会，并对阿尔巴尼亚进行访问。红卫兵组织也进一步参与社会活动，以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大、中、小学校内出现的暂时联合情况又被破坏。1967年7月11日，首都大专院校的红代会主持召开首都大专院校复课闹革命誓师大会。但是实际上，各个学校内部两派红卫兵组织之间的对立日益严重，每派组织都认为自己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且个别学校出现了“武斗”的情况。7月22日，江青对河南代表团讲话，她说：“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

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作‘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次日，“文攻武卫”的口号在《文汇报》公开发表。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不断发生开枪打死打伤群众的事件。有些红卫兵组织充当了武斗的急先锋。比如北京大专院校的一些红卫兵组织奔赴南京等地，串连当地的造反派，揪“军内一小撮”，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枪支弹药，制造事端。有些校园内部武斗越来越严重，甚至动用了从部队抢来的军事武器。8月11日至12日，中央文革小组召集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中学红代会各群众组织的代表开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着重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相信和依靠中国人民解放军，“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是完全错误的。9月5日，毛泽东批发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不准抢夺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9月16日和17日，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在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各校代表时讲话，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10月7日，中共中央转发《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记录稿）。毛主席在这些地方视察时明确提出：要防止红卫兵小将犯错误，要实现革命大联合。10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行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引述了毛主席关于“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的指示。由此，在各级学校中两派严重对立以至于武斗的局面有所缓解，再度出现了大联合的热潮。

从1967年10月至1968年上半年，各种舆论工具围绕着“反对派性”、“反对无政府主义”、“实行革命大联合”这三个主题进行宣传。但是实际上，红卫兵组织之间严重的派性对立仍然存在着。

这个期间，红卫兵组织按照中央的部署，开始加速向党领导下的“正规”群众组织方向发展：一是各地掀起成立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的高潮。1967年11月17日至19日，上海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召开，标志着上海市各个高校的红卫兵实现了

按照系统、按照班级的革命大联合。会上,代表们讨论了红卫兵的建设问题,并且宣读了《上海大专院校红卫兵组织条例(试行草案)》。大会强调红卫兵是朝气蓬勃的革命青年组织,要永远保持红卫兵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要把红卫兵建设成为一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坚强的战斗队伍。12月30日,广州地区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1968年1月24日,陕西省大专院校红代会成立;2月26日,西安地区中等学校红代会成立;3月,合肥市红代会成立;3月28日,南宁市大中学校红代会成立。二是进一步健全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常设组织,并把其列入机构改革的重要内容。1968年2月18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石家庄市红代会把办事机构从一个地处闹市的大楼搬到了一所中学的平房里,工作人员由63人减少到17人的情况,并发表《不搞机关化,扎根群众中》的评论员文章,赞扬红代会“节约开支,深入实际”的工作作风。这说明,当时的各级红代会,已经有了很多脱产人员,事实上已经成为党政领导下的一个职能部门。

在红卫兵运动的组成中,还包含了一个特殊的成分,这就是红小兵。1967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北京市香厂路小学取消少先队,建立红小兵的一份材料。这份材料反映:北京市香厂路小学于11月开始,在全校二至六年级二十八个教学班中,以年级为单位,分别成立红小兵连(下设排、班),全校组成红小兵团。这份材料认为,“少先队基本上是一个少年儿童的全民性组织,它抹煞了阶级和阶级斗争,根本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先锋队战斗作用”,“红小兵团是少年儿童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它富于革命性,战斗性,有利于推动少年儿童的思想革命化”。此后,全国小学以红小兵取代少年先锋队达十一年之久。很显然,红小兵的成立是受到了红卫兵组织的影响。此后,在各级团组织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各级红代会组织负责指导红小兵的工作。因此完全可以把红小兵的产生看成是红卫兵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五)

从1968年7月开始,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大、中、小学校为标志,红卫兵运动开始走向衰落。1968年7月27日,为了改变各大、中学校长期武斗,不搞联合的局面,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称为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在人民解放军战士配合下,进驻清华大学,制止武斗,蒯大富等人企图阻止“工宣队”进驻,下令开枪,打死工宣队员5人,打伤多人。28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和中央文革成员接见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红卫兵运动的“领袖”,同他们谈话达5个小时之久。毛泽东在谈话中明确指出:今天是找你们来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农民、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毛泽东同时严厉告诫他们要听从指挥。8月5日,毛泽东把外国朋友赠送的芒果转送给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13日,毛泽东、林彪接见了首都工宣队队员;15日,又接见了驻清华工宣队代表;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出《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通知》提出:“各地应该仿照北京的办法,把大中城市的大、中、小学逐步管起来”,要“以优秀的产业工人为主体的,配合人民解放军战士,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分批分期进入各学校”。要先进大学后进中、小学。没有两派组织、也没有武斗的学校,也要进入。据此,各地陆续向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和县、镇以上中小学派驻工宣队。同日,《红旗》杂志发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文章公布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实现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必须有工人阶级领导,必须有工人群众参加,配合解放军战士,同学校的学生、教员、工人中决心把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

分子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来,参加学校中全部斗、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的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至8月29日,首都60多个工厂的3万多人组成的“工宣队”进驻了北京地区全部大专院校。当时中央决定派工宣队进驻学校,其基本原因来自于毛泽东对教育工作的“左”倾指导思想,就是要让工农兵管学校,打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长期统治学校的状况。其直接原因则是学校中,特别是大、中学校中红卫兵组织长期对立,不搞联合,甚至继续搞武斗,毛泽东的斗批改思想在学校无法贯彻。这也表明这时候毛泽东开始有保留地支持红卫兵,既对红卫兵组织的现有无政府状态不满意,又要肯定“文化大革命”成果,包括肯定红卫兵运动。这样,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红卫兵组织完全纳入到正规的群众组织中来,像工、青、妇组织那样,成为党领导下的有组织的青年学生组织。为此,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在舆论上继续反对无政府主义,反对派性,提倡加强纪律性,统一行动。196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了8月7日上海《解放日报》题为《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行动》的社论,并加了编者按,特别强调要反对“多中心论”,反对“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要求红卫兵要听从指挥。

其次,当时正值各省陆续成立革命委员会,中央明确要求省革委会中要有一定数量的红卫兵代表。中央在有些省成立革委会的批示上,明确提出“应该通过加强、充实、扩大省、市的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进一步大力促进按系统、按行业、按班级的革命大联合”^①。江苏省筹备成立革委会时,革委会委员拟由165名委员组成,其中红卫兵代表28名,占17%。特别是1969年4月召开党的九大,《人民日报》专门报导“红卫兵中的党员代表是头一次参加党

^① 《中央关于成立浙江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1968年3月18日。

的代表大会。”^①很明显，中央是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学校中的红代会组织，来保障红卫兵运动向前发展。

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明确规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权力机关、人民解放军、共产主义青年团、工人、贫下中农、红卫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领导。”表明中央已通过这种形式，对红卫兵组织的性质加以确认，并作为党领导下的一种革命群众组织加以对待。党的九大以后，各级红代会组织普遍建立。实际上，在1967年“一月风暴”以后，在已经成立了革委会和革委会筹备组的省市级部分学校，陆续成立了红代会组织，九大以后只不过将这种组织纳入了党政直接领导下的正规群众组织。学校中的红代会组织，在共青团组织没有恢复之前，实际上起了原来共青团和学生会的作用。在共青团组织恢复以后，其作用很难界定。实际情况是，如果青年学生要想申请入团，必须是红代会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成员。红代会领导下的红卫兵组织完全是按学校的班、排、连等系统划分的。这样，红代会组织一开始就有不可克服的自身矛盾；第一，从职能上看，它完全是进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工具。基本任务就是组织学习文件，斗争走资派。第二，从体制上看，红代会组织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情况各不相同。有的地区红代会等完全组织在革委会体制中，红代会的负责人是革委会成员，已没有多大的相对独立性；而有的地区红代会独立性特别大，甚至和革委会相对抗，表现出无政府倾向。第三，由于红代会组织是在造反派组织基础上成立的群众团体，往往带有程度不等的宗派色彩，有些负责人就是原来造反派组织的核心成员。这严重影响着红代会在红卫兵中的威信。第四，红代会组织带有明显的过渡性质，它们虽然遍及全国各个学校，但却没有自己中央一级的相应机构。

随着学校中共青团组织逐渐恢复，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的现

^① 参见1969年4月2日《人民日报》。

象日益严重。当时这种现象之所以得以继续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学校的工作没有走向正轨,学生的学习任务不足。许多学校是半天学习,半天搞政治运动和其他活动。因此,增加一些社会活动也无妨。红代会的日常工作,主要包括组织学生的政治学习,社会实践,生产劳动等杂七杂八的事情,严重干扰了学校正常的学习秩序。

红卫兵组织正式成为党政领导下的青年学生中的群众组织后,其领导机构被称为红卫兵代表大会,简称红代会。在没有恢复共青团组织的学校中,“红代会”受学校党政的直接领导;在恢复了共青团组织的学校中,受共青团组织的领导。红卫兵内部的组织形式大致如下:省、市、县(区),设立各级红代会组织。学校(主要是中学)设红卫兵团,年级设红卫兵连,班级设红卫兵排。各级红代会领导机构内设主任、副主任,常委和委员,其中常委和委员,包括副主任,大部分都是由学生兼任;学校设红卫兵正副团长;年级设正副连长,班级设正副排长。

九大以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掀起了高潮,红代会的主要工作,是配合党团组织动员中学学生上山下乡。1973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红卫兵的文章。文章回顾了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特别是记述了从1968年12月开始,清华大学附中有1400多名红卫兵先后奔赴陕北、山西、内蒙古、青海、黑龙江、吉林、云南、河北、北京郊区等地,走上了与工农兵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列举了这些红卫兵的一些先进事迹,并指出:我们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在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指引下,沿着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奋勇前进。此后,各报陆续刊登了一些红卫兵坚持上山下乡的先进事迹。1974年1月5日,《人民日报》以“敢于同传统观念决裂的好青年”为题,全文刊登了知识青年柴春泽给他父亲的信。柴春泽原是辽宁省赤峰市红代会副主任,1971年中学毕业时,申请到艰苦的翁牛特旗插队落户。他父亲是一名革命干部,动员他转回赤峰县。柴春泽在信中称自己决心同旧的传统观念

决裂,拒绝了父亲的要求。他于1973年6月入党,后又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人民日报》发表编者按,称这是“革命小将在思想领域里向老将的挑战,看谁敢于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这一事件在各级红卫兵组织中引起强烈反映。各级红代会通过各种形式开展工作,动员广大红卫兵小将到最艰苦的地方落户。

1973年8月28日党的十大通过的党章再一次明确规定: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工会,贫下中农协会,妇女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团、红卫兵、红小兵及其他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

党的十大前后,“四人帮”一伙推行极左教育路线,在教育界反“回潮”,红卫兵组织受到“四人帮”的利用,起了极坏的作用。1973年8月18日,《人民日报》以“不做分数的奴隶,要做学习的主人”为题,报道了杭州十四中学红卫兵改革考试方法的情况:高二的红卫兵,反对旧的闭卷式的考试方法,要求开卷考试。高一五班的红卫兵,对考式方法提出了“五改”:即“分数第一”要改;“三脱离”要改;“突然袭击”要改;“死记硬背”要改;“只是跟在教员后面跑”要改。12月12日,《北京日报》发表《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后来《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提出“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流毒开火”。随后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迅速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横扫资产阶级复辟势力”,“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浪潮。1974年1月12日《文汇报》刊登五篇红卫兵、红小兵的文章。丽园中学红卫兵团的文章提出:“师道尊严”必须彻底批判;浦光中学的一个红卫兵提出:“向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猛烈开火”;一名红小兵提出:“要做小闯将,不做小锦羊”。1月22日,《文汇报》又报道了川沙县浦东中学红卫兵教育革命的情况。川沙县浦东中学中四(8)班的红卫兵排长,领导成立了“立新功师生战斗队”,并在校内公开贴出大字报。这在学校中引起了极坏的影响,许多红卫兵也纷纷贴出大字报,批判“师道尊严”。

“文革”后期尽管各地报纸还陆续报导红卫兵的活动,肯定红

卫兵的历史。但由于红卫兵组织自身的矛盾和错误的指导思想,其影响越来越小,几乎为人们所遗忘,实际上已经名存实亡。

1978年8月19日,中共中央转发共青团十大筹备委员会《关于红卫兵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作为文化大革命中产生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现在,学校共青团组织早已恢复,工作在不断加强;少先队和学生会也正在恢复。红卫兵的存在,使学校中学生组织重叠,学生干部负担过重,矛盾很多。普遍认为,红卫兵组织可以不再继续存在了。”文件下达后,学校中的“红卫兵”组织即行撤销。这一天,应该被看做是红卫兵运动的终结。

红卫兵退出中国政治舞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历史多次证明,青年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是革命和建设的先锋闯将,每当在民族和国家的危急关头,总是青年学生首先站出来走在前列。但是,青年学生由于涉世不深,缺少经验,易于冲动,也同样容易被错误思想和少数阴谋家所利用。青年运动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青年学生只有在正确思想和路线的指导下,走同人民群众和实际生活相结合的道路,才能真正成为革命和建设的开拓者。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前前后后

柳建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发端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但上山下乡早在 50 年代就开始了。作为一项安排城镇中、小学毕业生的就业途径，直到 1968 年 12 月毛泽东关于上山下乡的“最新指示”发表前，尚未形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现将这一运动前后的有关资料作一介绍，以供研究。

一、“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基本情况

综观“文革”前的上山下乡工作，大体分为两个阶段：

（一）上山下乡的试点

1953 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新阶段。在这个工业经济起飞的关键时期，却面临一个尖锐矛盾：一方面教育事业较快，但规模、结构不尽合理，中小学生入学率虽较高，高等教育的发展却不能满足他们的入学要求，一大部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显现出来，且愈来愈突出；另一方面，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到来，农村又需要大批的劳动力，尤其需要有文化的知识青年。对此，党中央从“一五计划”开始，就把加强农业劳动力配备、增加农业生产放到非常重要的位置。《人民日报》1955 年 8 月 11 日社论《必须做好动员组织中、小学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的工作》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的时间还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必须指出，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问题是有一定困难的。”而“农业生产对于中、小学毕

业生容纳量是十分巨大的,现在需要量很大,以后的需要量更大。”当时,全国有 57 万余初中毕业生和 236 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再加往年的毕业生,数量相当多。《社论》虽未明确提出要“上山下乡”,却要求各地青年组织积极地帮助“他们转到农村参加生产和工作”。当年 9 月至 12 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进一步肯定了知识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让他们到农村参加合作化工作的思想^①。如在《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的按语中,他明确指出:“这也是一篇好文章,可作各地参考。其中提到组织中学生和 high 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段话,标志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示的提出,团中央随后进行了“组织城市青年下乡的试验”^②。

当时的试验范围较小,主要形式是“青年远征志愿垦荒队”,这可说是上山下乡的“前奏”,带有学习苏联经验的印记。为实现“一五”垦荒计划,团中央于 1955 年 4 月组织中国青年代表团赴苏考察,并于 6 月 24 日写成苏联垦荒情况的报告。中共中央认为报告“很有价值”,遂于 6 月 27 日转发。7 月 1 日,团中央向各省市团委下发《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提出“要动员一部分城市未升中学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及其他失业青年参加垦荒工作”。随后,团中央又向党中央系统地提出了青年团员参加垦荒的计划,标志着动员青年志愿垦荒工作的全面展开^③。8 月 16 日,《北京日报》等报纸全文刊登本市石景山区西黄乡 22 岁的共产党员、乡长兼团支部书记杨华等 5 名青年参加远征垦荒的申请书和团中央领导在接见他们时对青年要求垦荒等问题的答复。10 天

^① 毛泽东:《〈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1955 年 9 月、12 月。

^② 中发(1964)279 号:《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③ 原件草本及书记处讨论记录存团中央档案室。

内,报名人数达 587 人,超过需求人数的 8 倍。接着,团中央成立垦荒筹备领导小组,北京团市委发出了《关于动员青年支援北京市青年志愿垦荒队农具、耕畜的通知》,黑龙江省有关部门也抽调 9 人组成了垦荒筹备委员会。此后,北京团市委在众多报名者中选拔了 60 名年轻力壮、思想端正的青年组成“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并于 8 月 30 日举行了隆重的欢送大会,团中央书记胡耀邦作了《向困难进军》的讲话,号召青年发挥“忍受、学习、团结、斗争”的精神,克服困难,在黑龙江的荒原上安家落户,多做贡献。9 月 4 日,垦荒队到达黑龙江省萝北县风翔镇南 20 里的团结村,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垦荒点。之后,天津、上海、河北、湖北、山东、哈尔滨等“10 多个省市的团组织,共组织了 50 多批,约 3 万 7 千多人,参加远征垦荒。”^①“1956 年初,浙江省温州市青年组成了赴大陈岛志愿垦荒队,一年之内,全国将近 20 万名青年参加了志愿垦荒。”^②

为什么说“远征垦荒”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前奏和试点?当时,杨华等 5 位青年在商量写申请书时曾定下了 3 条原则:一、必须绝对自愿;二、不要国家一分钱投资;三、去了就不回来。团中央在《关于响应党的号召,组织青年参加开垦荒地的几项意见》(草稿)中也说:“在青年到达垦荒地区后,团的责任是协助党和政府做好巩固的工作,使他们在哪里定居下来。”“我们觉得,从城市中动员年青力壮的、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的初中、高小毕业学生和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

到 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遂在《1956 年到 1967 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首次提出“下乡上山”的称呼。其中写道:“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

^① 中发(1964)279 号,《中央批转共青团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② 《光辉的成就》,《庆祝建国 35 周年文集》(下),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53 页。

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1957年，党和毛泽东在一系列文件、讲话中还谈到了青年学生参加农业劳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加强思想改造等问题，要求他们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群众中去。如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提出了党的教育方针；在《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专门就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发出号召，提倡在群众中长期住下去，“安家落户”；在《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对城市青年要统筹安排、统筹兼顾等。为了贯彻毛泽东提出的方针，1957年4月8日由刘少奇主持写成的《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明确提出：“就全国来说，最能够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也是他们今后就业的主要途径。”根据上述精神，团中央分别在北京、天津、上海、成都等12个城市进行了动员城市青年插队下乡的试点。“到1958年，下乡的知识青年约15000多人。”^①但这一时期，上山下乡的工作重点不是放在动员多少人下乡，而是限于一般号召和初步试点，摸索经验。从当时材料看，动员和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开垦荒地和支援少数民族地区占较大比重，而动员上山下乡，直接插队落户到农村还不是重点。

（二）上山下乡的有计划展开

进入60年代，为了纠正严重的“左”倾错误，解决因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的突出困难，党和毛泽东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数量，就是其中之一。于是，知青上山下乡被列入精减的范围，并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地展开，下乡插队的人数也逐渐增多。如1962年5月27日党中央《关于进一步精减职工和减少城镇人口的决定》

^① 中发(1964)279号：《中央批转共青团书记处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

中说：“城市中一般不能升学或就业的青年，有条件的可以下乡或者安置到农场去劳动。”

上山下乡有计划地安排，主要加强了两方面工作：强化上山下乡的安排部署；强化思想教育，以巩固成果。1961年10月，在团中央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指示要好好注意青少年中的道德风气问题。团中央经过近半年的调查，于1962年5月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强城市青少年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报告》，认为对城镇知识青年，“今后的主要出路还是逐步地有计划的动员他们上山下乡，参加农场或公社的劳动，或者进入半工半读学校。”当时安排工作任务艰巨，困难也较大。正如1962年8月2日，胡耀邦在《关于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情况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说：“最费心思的是城市中不能就业和升学的青年与少年。”“从我们团的方面来说，还是那个一切依赖国家包下来的思想在作怪。”1963年10月18日，周恩来在一次座谈会上指出，要长期地抓紧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并于同日在《中国青年》创刊40周年的晚会上提出，《中国青年》的办刊方针应该是“面向农村，兼顾城市”。中央办公厅随即指示团中央大力组织青年报刊下乡。这是针对知青下乡后缺少思想读物，精神食粮匮乏问题而提出的思想教育措施。当时的知青反映说：“读不到书，看不到报，整天老一套，干活吃饭睡大觉。”10月22日，团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就上述问题作了研究部署，最后形成了《共青团中央书记处关于贯彻执行周总理对团的工作指示向中央的简报》。其中写道：“关于城市青年下乡上山问题。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做了一些工作，但是认识不足，下的力量很不够。今后，第一，我们拟在团中央和大中城市团委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集中精力抓好这一工作，特别要着重地总结城市青年到公社插队落户的办法。……我们打算立即组织3个工作小组，分别到苏杭、成都等地进行调查研究和试点工作。第二，继续通过报刊和其他形式向青年进行热爱农业劳动，参加农业生产的教育，大张旗鼓地表扬下乡上山的模范人物，并立即同他们（50—100人）建立通讯联

系。第三,拟在明年‘五四’召开全国城市下乡青年积极分子大会,表彰他们的模范事迹,总结他们的经验,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便在明年夏秋掀起一个城市青年下乡上山的热潮。”为此,《简报》提出《中国青年》每期增加32页,发行量扩大到100万份,做到每个农村每个团支部都有一份。^①

1964—1965年,上山下乡工作继续进行,其主要特点是:在下乡方式上,提出了集中插队落户的办法;在下乡后的安置教育方面,着重提出了“巩固”和“在农村干一辈子”等口号;在下乡的数量上,人数指标越来越多;在思想认识上,调子越拔越高,“左”的东西更加明显。

1964年4月24日,党中央在批转团中央《关于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报告》时说:“今后按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不仅每年都要有计划地做好动员大批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工作,而且在他们下去之后,还要认真做好巩固工作,并且要注意充分发挥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积极作用。”这都是有针对性的。当时下乡的知青思想大都不够稳定,心理准备也不足,下去之后,不少人又回城找工作。如1958年下乡的约1.5万人中,只有1/4的人巩固下来。同时,有的接收单位不注意充分发挥知识青年的特长,做到量才使用,却只知一味安排他们参加体力劳动,工种过于单一,知青们感到抱负、雄心无法施展而厌烦。为此,团中央书记处的这份报告,专门就下乡青年的动员、巩固和安排等问题提出了建议。《报告》首先提出:“今年,全国将动员80万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今后若干年内将一年比一年多。”其次,关于组织动员工作,《报告》提出了“政治动员5个结合和5个为主”的办法,即“轰轰烈烈的宣传运动和精雕细刻的个别发动相结合,以个别发动为主;临时的集中动员和经常的教育相结合,以经常教育为主;自上而下的教育和群众自我教育相结

^① 团中央办公厅编:《团的文件汇编》(1963),第65—67页。

合,以自我教育为主;动员青年和说服家庭相结合,以动员青年为主;政治动员和必要的物质保证相结合,以政治动员为主。”当时,组织动员工作中已经暴露出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不做细致的教育工作,强迫下乡;二是以物质引诱和欺骗的办法,知青下乡后又未兑现,两者都忽视了自我教育和自觉自愿的原则。《报告》批评了这两种错误作法,要求各级团组织不失时机地进行教育,并帮助解决一些思想生活上的实际问题,“坚定他们‘在农村干一辈子’的思想”;“城市青年下乡是一次思想革命”,“动员工作要有一场轰轰烈烈的宣传声势,形成一股热烈支持知识青年下乡的社会舆论”。同年5月30日,胡克实在中央工作会议小组会上的发言中,又进一步提出:“安置巩固工作的问题还很多。在动员工作上,我们认为最近两年要特别注意一下质量,品德太坏的可暂不下去。这些人农民极不欢迎,也把城市青年下了乡的名誉搞坏了。还有些年龄过小的,身体不好的,也不宜现在就去,总要有一个相当的体力才好去。”关于插队问题,胡克实说:“小平同志曾指示,插队以小组集体插队形式为主,要到那些地多、需要劳力的地方,给青年们搞个理想,治山治水,改换自然面貌。”^①当时,各地区有试行派随队干部或教师与知青一同下乡,一起居住的办法,只是时间较短,一般只下去2至3个月。中央还规定,在下乡青年的前半年或一年中,不要把他们当强劳动力使用,要当“学徒”对待;不要排斥他们,敌视知青。他举例说:“干部怕下乡青年揭底子,会计怕下乡青年接位子,因而就多方设法排挤、冷淡下乡青年。”河北省束鹿县,有一个下乡青年在一次会上大讲要当好接班人等,党支部书记听了大为恼火,认为这些毛孩子刚下来就想接老子的班,于是,就把这个青年的团籍给开除了。赵耘是当时下乡青年的典型代表之一,刚下去时也因反映情况而被骂为奸细;侯隽刚下乡时,村里不接户口,不给粮吃。村干部贪污私分,也派人监视她。更严重的是,有些地方还发生了

^① 《团的文件汇编》(1964)(上册),第141—147页。

向女知青逼婚、骗婚、包围突击的现象，影响极坏。为此，胡克实提出“要按规定配备安置小组干部，加强工作和检查，及时解决问题”。

尽管各方面阻力较大，知青上山下乡的人数还是在逐年增多。1962年到1963年，全国共动员30万人下乡，直接插队的有9000余人。1964年，全国共动员下乡、回乡人员68万余人，其中知识青年达32万余人^①。虽然这一年未完成团中央提出的80万人下乡的要求，但确实成为“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一个小高潮。

1965年2月，中央安置城市下乡青年领导小组召开工作会议，这是“文革”前召开的唯一一次有关知识青年的大型会议。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了到会同志，周总理听取了两次专门汇报。会议讨论研究了安置工作的一系列问题：首先，会议认为动员城市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上山下乡，是城乡劳动力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应纳入下乡劳动的整体规划之中，加强劳动力调配和工资的统一管理。其次，会议检查了几年来安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领导不重视，没有长期打算，消极应付；对一些破坏、虐待和侮辱下乡青年的坏人坏事打击不力，处理不及时。1964年5月9日，中共中央曾批转了《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污辱的四份材料》，提醒各级党委重视。这次会议要求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领导，并提出1965年的工作任务是“一手抓好今年下乡人员的动员安置工作，今年计划安置54万余人；一手抓好往年下乡人员的巩固工作”。在安排的方向上，规定要尽可能与建设稳产、高产农田，大搞样板相结合；还要与国防建设、占领山头、下海、下湖相结合；规定凡安置到国营农场的，主要放在新疆、宁夏、黑龙江等边远山区。再次，为完成上述任务，会议提出6项措施：（一）做好下乡前动员工作，重申“要坚持自愿原则，不能强迫命

^① 中发(1965)229号，《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

令。”(二)安置方式要因地制宜,多种多样,如集中插队、分散插队、投靠亲友、建立纯知青为主的生产队和到国营农场。(三)城乡间密切结合。尤其要求城市动员下乡不能向农村“甩包袱”,不能安排老弱病残和劳教人员下乡。(四)安置工作自始至终都要坚持政治挂帅。(五)国家关心,负责到底。提出要在政治上指引,经济上支援,文化上提供精神食粮的方针。(六)加强统一领导,各方协作。要求各级党委指派一位负责同志主管知青安置工作,扩大知青安置工作干部队伍的编制。

总之,这次会议讨论和解决了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一系列问题,对于稳定知识青年,减少工作中的阻力起了一定作用。但也暴露出指导思想上的一些“左”的偏差,如片面强调政治挂帅,忽视对知青物质待遇的长期考虑和规划;忽视对下乡条件的选择规定,致使一些不能下乡的老弱病残和家庭确有困难者以及下乡后也不安心劳动的劳教人员下到农村、山区,增加了城乡之间的矛盾。

二、1966年—1968年底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的断续

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工作虽未停止,但有计划安排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被打断,表现出时断时续的特点:下乡人数较少,涉及面不广,舆论宣传也不那么紧锣密鼓地进行。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后,随之而来的红卫兵运动、大批判运动和夺权运动冲击了各地党委、政府的领导工作,人们的注意力转到了搞运动方面,而“文革”前下乡的知识青年也有不少人趁机回城参加“革命”,并建立了一些联络点,陷入派性斗争。还有一部分知识青年因有实际困难,不满下乡后的待遇而到处上访、请愿,要求回城工作,长期滞留城市。

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3个文件中提到了这一点:1月11日,在《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3条,谈到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返城上访、请愿等问题,要求各级领导部门“立即制止这种

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立即制止这种大闹经济主义的倾向”。在2月17日《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规定：〈1〉凡留在外地进行串连、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单位，参加文化大革命，并搞好生产。所设联络站，一律撤销。〈2〉有些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受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反革命经济主义的影响，做了一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事，只要他们回到本单位认真检查，改正错误，可不再追究。〈3〉在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农场职工中，有少数人行踪诡秘，不报真实姓名和工作单位，到处招摇撞骗，扰乱社会治安，破坏国家财产，要彻底查清，以法惩办。〈4〉对于安置工作中的问题，应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经济主义的通知”第二条执行。在10月8日《关于下乡上山的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必须在农村抓革命、促生产的紧急通知》中又规定了6条处理措施：〈1〉回城的知识青年返回农村，“革命干部要带头动员子女返回农村”。〈2〉“回城知青建立的各种组织和联络站，一律立即撤销。”“一切城镇的群众组织，不准吸收下乡人员参加。”“坚持逗留城市不走的，不予落户”，落下户的“一律无效”。〈3〉各级领导部门要主动做好配合动员工作，使回乡青年迅速返回农村；接收的社队不得歧视知识青年，不准压低工分，不许因政治观点分歧而刁难、迫害或者撵他们返回城镇。〈4〉知识青年要积极参加劳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社队要关心他们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好口粮，妥善解决他们的住房和安全过冬等迫切问题。〈5〉下乡青年原地闹革命，有意见可向上级领导机关和有关单位寄送小字报、大字报。〈6〉各单位要把“上山下乡工作当作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认真抓紧抓好。要分工负责地处理好下乡工作的问题。”由此看来，“文革”初期，有计划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总体说曾一度中断，到这3个文件发出后，又开始进行。1967、1968年的《人民日报》虽有關於知青上山下乡的报道，但阻力似较大，人数不多。

三、1968 年底—1973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

这是“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由兴起到形成高潮的阶段。

1968 年 12 月 22 日,《人民日报》一版以大字标题刊登《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报道文章。在编者按中披露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为了造成强大声势,当天的《人民日报》组织了两篇报道:一篇是介绍甘肃省会宁县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踊跃下乡,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情况;一篇是介绍陕西省西乡县革委会动员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经验的,说他们通过加强领导,大抓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狠抓两条路线斗争教育,做好家长工作,大搞群众运动,在全县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新高潮。从 12 月 23 日开始,《人民日报》连续几天以大量篇幅报道了全国各地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最新指示”,组织青年上山下乡的情况。广泛的舆论宣传,把 1955 年以来一直进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引上了大搞群众运动的轨道,每年都有几十万、几百万知识青年走上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道路。到 1970 年 5 月,全国有 500 多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数字比“文革”前 5 年下乡青年的总和还多 3 倍^①。

这一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主要采取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参加建设兵团两种形式,同时开始搞知青国营、集体农场的试点。1970 年 4 月 1 日,国家计委军代表向中央写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

^① 《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军代表关于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下乡工作报告》,1970 年 5 月 12 日。

上山下乡工作的报告》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

第一,关于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报告》认为“这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它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促进城乡斗批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关于知识青年在农村、边疆不安心的原因。《报告》认为:一是阶级敌人的破坏;二是城乡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残余势力拼命在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三是刘少奇“读书做官”、“下乡镀金”等反革命修正主义余毒尚未肃清;四是一些地方领导认识不足,对他们的生产、学习、生活不重视,“这就使得有的地方的某些知识青年不够安心。”

第三,9项政策规定。(1)各级党组织和革命委员会要重视知青工作,把它摆到重要位置上。(2)组织知青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3)提出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办法,各地都有一些很好的经验,要认真加以总结。江西省对知识青年下乡,采取由干部带领并且配上医务人员和教师集体插队的作法,效果很好。辽宁、上海等地采取了类似的办法,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各地应该仿照。京、津、沪三大城市还可以在边疆地区试办集体所有制的“五·七”农场,安置城市知识青年和其他人员。这种农场,要配备坚强的领导班子。要在思想上革命化、组织上军事化、生活上工农化。实行经济核算,采取评工记分的办法,不宜由国家包下来固定工资。(4)对插队较多的地区,要制定规划,发展生产,增加收入,减少当地群众的负担。“这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使下乡知识青年在农村安家落户的一个必要条件”。(5)各级领导要认真解决插队知青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如同工同酬、口粮标准不低于当地单身劳力的实际吃粮水平、住房、医疗等。(6)对破坏这一工作的要坚决给予打击。凡是强奸下乡女青年的,都要依法严惩。“对女青年进行逼婚、诱婚的,要坚决进行批判斗争”。并批评一些单位对这类问题处理不力,对坏人打击不及时,甚至包庇。(7)强调国家拨给的

安置经费必须确实用在下乡知识青年的生产、生活方面。批评有的地方随便挪用、克扣，任意挥霍浪费、甚至贪污知识青年安置费的现象。(8)要欢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上山下乡，不得歧视。(9)各地要普遍检查一次工作，切实解决现实问题，并对这一工作做出规划。

从报告反映的情况看，由于运动一哄而起，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较多，使不少地区措手不及，难以制定出发展生产，增加收入的长远规划，既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又使知青在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实际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这些问题，实际上早已存在，只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由于运动来势很猛，各级党委只注意了再教育和改造世界观工作，似乎生活越苦，越能改造好青年的世界观，达到再教育的目的，因而问题出的比较多，情况也比较复杂。插队青年的情况远没有兵团好，因为兵团是全民所有制单位，过集体生活。而插队下乡的知青则完全由城市生活一下子改为地地道道的农民生活，分在富裕地区的知青还可年终结算得点收入，而贫穷的山区和农村则难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山西省忻县是安置北京知青的重点地区之一。从1968年11月到1969年底，共安置近1万名北京知青。据1969年底的统计，全地区有50%多的插队青年全年劳动收益不能自给。吉林省安图县1969年入秋以来，已有1400多名下乡知青回流。上海知青回流占下乡总数的30%。据分析，这和当地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领导没有注意抓好知青的生产、生活问题有关，客观上又遭自然灾害。天津市到1970年3月，共有21万名知青到内蒙、黑龙江、辽宁、河北、山西等省插队落户。通过调查，知青们反映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一)到农村后思想政治工作没人抓，生活上无人管，整天闷头苦干，吃饭睡觉，报纸长时间看不到。(二)有的生产队干部领导作风不民主，不能很好地引导和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有的知识青年由于揭露了个别干部的错误，而受到打击。(三)个别社队干部社员，对女知识青年诱婚、逼婚甚至持刀强奸，手段十分恶劣。(四)有些生产队干部在对待知识

青年劳动问题上,不是同工同酬,致使不少知青干一年连自己的生活都不能自给。有些生产队迟迟不给盖房子,长期没住处,过不了冬,只好呆在天津。(五)在内蒙古牧区插队的知青,和牧民住在蒙古包里,按辈数睡在一起,新去的青年是最低的一辈。(六)不少知青提出,治病、探亲时间、路费等问题,国家应有个明确的统一规定。北京市自1969年入冬以来到1970年3月上旬,返京的知识青年约有6万人,其中陕西延安地区1.6万人,山西2.1万人,内蒙古1.1万人,其他地区也回来了一些。上述一切都说明,知青下乡后在生产、生活方面遇到了许多困难未得解决,致使一部分知青家长和知识青年难以安心。1972年底,福建省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李庆霖,福建省莆田县城厢镇下林小学教员。他的儿子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到本县山区萩芦公社水办大队落户。1972年12月20日,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他的儿子在下乡点所遇到的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困难,主要是口粮、住房和钱的问题。他说:第一年国家供应定量粮每月27斤,生活费每月8元。从第二年开始,国家对下乡知青的口粮和生活费供应断绝后就带来了一系列困难。首先是口粮不够,仅够半年的。干一年才分10斤小麦,100斤稻子。家庭要负担孩子半年的口粮。其次,没有“一分钱的劳动收入”。穷得连理发的钱都挣不出来,要向家里要。再次,没有房子住,成了无处安身的人。他说:我的第二个孩子又要毕业了,过不了升学关,就还要下乡。而大孩子的遭遇,使“我真不敢去想它”。第四,他提到了知青招工中的“走后门”等不正之风,说有些知识青年不认真磨炼,却靠关系“走后门”,“都先后被招工、招生、招干去了。”“这么一来,只剩下我这号农村小学教员的子女,在政治舞台上没有靠山,又完全举目无亲,唯一的资格是一辈子在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而已。”最后,他说:“我在呼天不应,叫地不灵的艰难窘境中,只好大胆地冒昧写信来北京告御状了,真是不该之至!”信经过多方周转,终于到达毛泽东手中。1973年4月

25日,毛泽东复信:“李庆霖同志: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虽然李庆霖由于毛泽东的复信支持而身价倍增,后来成为“四人帮”在福建的帮派骨干,但他的信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类似情况全国各地都有,如安徽省到1973年5月,有55万人上山下乡和回乡的知识青年(其中上海的知青占12万人)。关于下乡青年生活自给问题,据省“五·七”部门反映,全省下乡知青中,约有60—70%生活能够自给,30—40%不能自给,极少数人连口粮的钱也挣不回来。但据上海下乡知青的带队干部反映,插队在安徽的上海青年平均有80%生活不能自给,其中在淮北地区90%不能自给,在江淮地区80%生活不能自给,在皖南地区有70%不能自给。有些知识青年下去,除交生活费、车旅费、医疗费外,还要交投资费(生产队要知识青年投资买化肥、耕畜)。武汉市有些地区知识青年没有房屋住,国家拨给每人230元安置费中,有100元解决住房问题,不够用。国家拨给知识青年盖房的木料普遍没有落实到队,再加上许多生产队没有专款专用,认真解决住房问题,有的知识青年只得住仓库、牛棚。再据1972年8月国家计委劳动安置组写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情况和急需解决的几个问题》反映:(一)认识问题仍较模糊,“回城光荣”思想抬头;(二)知青参军、招工、招干中的“走后门”现象严重。一些高中级干部利用职权,安排自己的子女或亲属回城进厂或参军的事影响很坏。“目前在下乡知识青年中流传着一幅对联,叫做‘老子有能儿进城,老子无能儿务农’,横批是‘比爹’,有的贫下中农说:‘你们干部子弟有后门可走,到头来扎根农村的还是我们贫下中农’。”(三)对下乡知青的教育和使用不当。许多地区只把下乡青年当作“再教育”对象或者单纯的劳动力,不能大胆培养使用。在下乡青年中招工、招生时,也不注意保留骨干,有些先进的知识青年,不愿留在农村,这就使一些基层干部认为他们靠不住,“树上的小鸟,一会儿就飞了”,因而不愿意培养教育他们。有的社队甚至在改选领导班子时,把下乡知青担任的生产队职务全部换掉。许多地方在

下乡知识青年中建党、建团工作抓得很差。青年们普遍反映：“生活上再苦再累也不怕，就怕政治上没人关心。”（四）落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问题。据一些地区调查，“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占下乡青年的7—8%，今后比例越来越大。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些地方任意扩大“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范围；定知识青年的家庭出身，都得查“三代”；下乡知识青年的档案材料比较紊乱，有不少干部子女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父母受批判审查时下去的，档案里还装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材料，落实政策后，父母已解放了，但其子女的档案里还装着原有材料，被当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对待。（五）打击坏人不力。有些地区对坏人打击不及时，奸污、迫害下乡青年的事件仍不断发生。有些地方的基层干部违法乱纪，任意捆绑吊打下乡青年。有的青年被吊打后神经失常，至今尚未处理。（六）管理和生活问题。有些地方忽视对下乡知青的管理教育，因而不断发生伤亡事故。黑龙江省3年中因事故死亡达978人。目前在插队的知识青年中，大约有30%左右的人不能达到完全自给。不少地区形成“吃粮靠集体，花钱靠家寄”，青年思想不扎根，家长有怨气。有的地方因知识青年有倒欠，影响社员分配兑现，贫下中农也有意见。有的社队没有贯彻同工同酬，故意压低工分。很多地区约30%左右的下乡青年至今未修建住房，借住社员的房或社员家。各省都有一些有严重疾病的人，不能劳动。这些人由社、队来照顾，要加重贫下中农的负担，如都退回城里也不好处理，至今没有统一的规定。据一些地区的调查，插队青年中年龄在25岁以上的占1/4以上，不少人提出要求解决婚姻问题和婚后住房等困难。（七）城市中学毕业的分配方向问题。这几年，对于“四个面向”的分配方向各地认识不一，做法不同，矛盾较多。有的地区，主张城镇的中学毕业生一律下乡，城市用人再从经过锻炼的下乡青年中招收。这样做，下乡青年往往缺乏长期扎根农村的思想，而且安置经费也有很大的浪费。有的地区，分配城市中学毕业生首先满足招工，经过挑选后再动员上山下乡。这在客观上给他们造成了“好学生不下乡”、“下乡

的不是好学生”的印象，从而助长了轻视农业、轻视农村的旧思想。有些地区对城市历届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往往这一届全部下乡，而下一届却大部进厂。这样做，有些职工子女都下乡了，而另一些职工子女却全部招工。因此，老工人认为这样分配“不公”。上海、北京、天津、浙江等省市，每年要跨省区安排几十万城镇中学毕业生下乡，但是没有有一个统一的规划，缺乏长远方案。（八）领导问题。对知识青年工作的领导，有些地区仍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机构设置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统一，专职干部不稳定，在对知识青年的分配、选调等问题上，有关部门互不商量，各行其是，影响工作的开展。各地普遍要求中央召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

李庆霖的信和国家计委劳动局的文章所反映的情况是真实的，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起的作用也是好的，它使毛泽东、党中央和国务院了解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并决心“统筹解决”。首先，毛泽东复信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的问题。5月，在中央召开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就形成《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中几个问题的解决意见》，让各省讨论。其次，6月1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3年21号文件，转发了毛泽东给李庆霖的复信和李庆霖给毛泽东的信，随同下发的还有《中共福建省委关于认真学习毛主席给李庆霖同志的信的通知》。中央要求各级党委组织有关部门宣读学习，结合本地知青工作情况进行讨论，准备在6月下半月，由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派2人到中央汇报和统筹解决这一问题。再次，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省市区讨论研究的基础上，7月由国务院主持召开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研究了“统筹解决”的具体办法，24日形成《国务院关于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报告》。8月4日，中共中央转发这一报告（简称30号文件），并要求各地“严格全面地进行检查，抓紧解决目前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国务院的报告分3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近几年知青上山下

乡的基本情况。全国已有 800 多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规模之大，影响之深，是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其中“已有 59000 多人入党，83 万多人入团，24 万多人被选进各级领导班子。”第二部分谈上山下乡的伟大意义。认为在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充满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种思想的激烈斗争，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为了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为了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是反修防修的一次伟大战略部署。第三部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会议共提出了 6 条统筹解决的措施，并起草了《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草案》和《1973 到 1980 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初步规划草案》。6 条措施的主要内容是：(1) 严格进行检查、总结经验、加强领导。要求“县以上党委，都要建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和得力的办事机构，并由一名书记主管。”(2) 切实解决口粮、住房、医疗等方面实际困难。对已经下乡插队生活困难的，国家要给补助。今后安置经费要适当增加。(3) 大力加强对下乡青年的培养教育。(4) 坚决刹住“走后门”等不正之风。“今后要严格制度，违反的，不但要把他们的子女退回去，还要给以纪律处分。”(5) 发动群众，对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犯罪活动作坚决斗争。(6) 今后每年将有大批的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扎根落户，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要做出长远的全面的规划，同整个经济建设、开发边疆和文教科研的规划衔接起来。同时，提出 4 种安置方式：一是建立青年点，集中插队，有条件的可以回老家落户；二是建立以下乡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青年队，集中劳动和管理；三是在土地比较多的地方，建立单纯以下乡知青为主的集体所有制农场；四是到生产建设兵团和国营农林牧渔场。

这次会议统筹解决了知识青年生产和生活方面的一些困难，有些问题规定的比较明确，为以前所没有。因此，它对解决知青问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这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知青上山下乡正处高潮的时候召开的一次会议，对问题的解决只是相对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深层次问题，相反却要求

作出长远规划,大规模开展,而且对政治意义的认识越拔越高。

四、1974年到1981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结束

这一段,由于知青上山下乡的热情在逐步冷缩,没有了前一段热情高涨,踊跃自愿参加的景象,并且出现了更大规模的回城要求就职就工的“返城风”。从1976年到1981年,每年都有,以1976、1979这两年最为严重。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从政策上进一步作了调整,朝着根本改变上山下乡政策的方向努力。

虽经1973年全国范围的知青工作大检查,落实了有关政策,但不少实际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有关情况仍不断反映到中央和国务院。1976年2月,毛泽东在一份反映知青问题的信上再次批示说:“知青问题,似宜专题研究。先作准备,然后开一次会,给以解决。”但不从根本上停止上山下乡大搞运动的作法,可以说问题无法彻底解决。1977年,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再次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既然要“坚决贯彻执行”,于是就从坚持扎根、反对拔根方面进行思想教育。但是由于高考招生制度的恢复,给知识青年带来了脱离农村、山区和边疆的希望,一部分知青通过这条途径分别进入各高中等学校学习。同时,招工指标的扩大,一部分老知青也返回了城市,这样就引起尚留在农村和边疆的知识青年的思想波动,情绪不稳,返城者日益增多。因此,坚持扎根反对拔根的教育实际上作用已不大。于是,1977年12月,国家计委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所形成的向中央政治局提交的《关于经济计划的汇报要点》中,就提出了知识青年就业政策要按照面向学校、农村、边疆和城镇招工的原则。这是第一次朝根本调整上山下乡政策的方向迈出了一步。因为这里提出的“四个面向”,只把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列为其中之一,并没有看作唯一途径,并且把面向学校放在第一位。而1968年11月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1968年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问题的通知》中指出的“四个面向”是：“面向农村，面向边疆，面向工厂，面向基层”。两相对比，反映出对大批知识青年培养安排方向的调整。同时，这份汇报要点还提出：“今后，城镇新成长的劳动力，除了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和在城镇安排外，可以组织他们参加工业基地、大型水利工程和铁路的建设，用他们代替一部分民工。目前，留在农村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有900万人，要切实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使他们安心于农村。”虽然这里仍提上山下乡，但毕竟反映出要广开就业门路，减少上山下乡人员的思路，从而改变一边要上山下乡，另一边又招民工进城的不必要的劳动力“大对流”。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宣告结束，上山下乡的人数逐步减少，而自动返城和要求返城就工的人数却日益增多。为此，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北京再次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并形成了会议纪要^①。

首先，会议对上山下乡工作作了一个基本估计，总结了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认为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全国1700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在农村三大革命斗争中作出了贡献。他们把文化科学知识带到了农村，成为农业战线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开发边疆和山区，建设草原和林区，建立粮食和橡胶基地等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成绩，涌现出大量英雄模范人物，特别是他们在保卫边疆的斗争中立下了功劳。对存在的问题，会议认为主要是“统筹兼顾”的方针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落实，城乡劳动力安排缺乏整体规划，知青工作的路子越走越窄，下乡青年中的不少实际问题长期未能解决，安置人数过多的地方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其次，会议讨论了统筹解决好知识青年的问题。主要有如下几点变化：（一）今后若干年内，还要继续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但“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

^① 详见中共中央1978年第74号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

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渐减少,以至做到不搞现在这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达到这样的地步,必须有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就全国来说,还要继续动员组织一部分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二)调整政策,逐步缩小上山下乡的范围。“今后,留城政策,下乡范围,都要从实际出发,作适当调整。城市中毕业生的安排,实行‘进学校、上山下乡、支援边疆、城市安排’四个面向的原则。留城面要逐步扩大。矿山、林区、分布在农村的有安置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小集镇和一般县城非农业户口的中学毕业生,不再列入上山下乡范围,由地区或本系统自行安排。有安置条件的城市,也可以不动员上山下乡。”(三)城乡广开门路,妥善安排知识青年。对于“三集中一分散”(集中住宿、集中吃饭、集中学习,分散劳动)的知青点要真正办好。今后不再搞分散插队。会议还肯定了湖南省湘潭红旗农场办独立核算的集体所有制的青年场(队)的作法;要求各省学习江苏省常州市把城市改组工业,调整工业布局,同创办亦工亦农知青农场结合起来的经验;提出城市要多办各类学校,提供升学和就业条件;规定“对于安置知识青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事业单位,要在政策上给予扶持。”(四)积极稳妥地解决好在农村的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目前在农村的许多下乡知识青年,特别是一些下乡多年的老知青,在生产、生活等方面,有不少实际困难。各地要本着‘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积极地有步骤地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对1972年以前下乡的优先安排,两年内基本解决。”(五)认真做好对下乡知识青年的培养教育工作。“大专院校招生、选送出国留学,要照顾同等条件的下乡知识青年。”(六)要切实加强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工作。“对于迫害知识青年的案件,要认真查处。”“罪大恶极的,要坚决镇压。”再次,会议重申要加强对知青工作的领导。规定“各级知青工作的机构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知青干部要相对稳定。县以上党委,都应健全知青领导小组,有一名书记主管知青工作。知青办公室由党委或革委直接领导。”

随同《纪要》一起下发的,还有《国务院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规定》主要有:(一)城镇中学毕业生的分配问题。凡是独生子女、父母双亡的、归侨学生、中国籍的外国人子女,均不列为下乡对象;多子女家庭,欢迎选留;病残不能参加农业劳动的和家庭确有特殊困难的,可以照顾留城。(二)关于上山下乡的安置形式问题。要求搞集中安置,不搞分散插队;要把安置下乡知识青年同发展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同建设卫星城镇结合起来,同培养人才结合起来;各地区、各部门的一些“五·七”干校,可以改为本地区、本系统安置知识青年的基地。(三)培养教育和保护下乡知识青年的问题。规定下乡知青通过业余学习,达到普通高校毕业生同等水平的,发给证书,承认其学历,用其所学;已经选拔为公社以上机关脱产干部的下乡知青,经过考察符合条件,报主管部门批准,给予定职定级;处理强奸、奸污女青年的案件时,要注意保护受害人的名誉;对于迫害者,要坚决打击,依法惩办;要保护青年之间的正当恋爱和婚姻,严禁逼婚。(四)支援知青点的问题。为了扶持知青农场和企事业单位,在1985年以前实行“三不政策”:不交税、不上交利润、不承担农产品统购派购任务。(五)下乡知识青年的选调问题。规定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单位都可以从下乡知青中招工;要照顾下乡时间长困难大的知识青年,适当放宽招工年龄,适当扩大招收女青年的比例;合理解决下乡知青中招工后的工资待遇问题,分配到技术工作岗位的知青,在考核定级前,下乡满2年以上的享受学徒第2年的待遇,满3年以上的享受学徒最后一年的待遇,满5年以上的享受一级工待遇。以前招收的下乡知识青年,工资待遇低于这一标准的,按此标准执行。(六)经费问题,分为安置费、扶持生产资金费和业务费。规定从1979年起,知青经费中的安置费按下列标准拨付;(1)到国营农场、机关、学校、部队、企事业单位劳动基地的,“五·七”干校的,每人补助400元;到集体单位和知青点的,南方各省每人580元,北方各省每人600元;下乡到单程超过500公里地区的知识青年,未婚的每2年国家补助

一次探亲路费,已婚的国家共补3次路费探望父母;在农村结婚安家的下乡知识青年,其住房应先从知青空房中调剂,解决不了的,每人补助建房费300元。(七)口粮问题。规定第一年由国家供应。从第二年开始,由社队和知青场、队分配口粮。(八)医疗卫生和病残伤亡处理问题。规定下乡知识青年死亡的丧葬费每人不超过150元;因公死亡的,由所在单位开支;因病死亡的,从知青的安置费中开支;其他原因死亡的,视其情况,区别处理。(九)其他问题。提出下乡知青建房所需木材、钢材、水泥、玻璃、小五金及烧砖瓦用煤等物资,分别纳入国家和地方的计划,保证供应,不得挪用。

上述文件,虽然仍规定了上山下乡的有关长期政策,但毕竟标志着我国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基本调整:一方面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范围缩小了,人数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安排重点也由边疆、农村转到城市近郊区,以发展集体所有制知青农场,采取社队和农工间联合办企业的形式,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国家扶持。坚持自愿报名,一律计算工龄,在农场工作的原则。随着就业路子的拓宽和中央的就业政策方面的调整,知青上山下乡实际上从1978、1979年开始就不再大规模进行了。当然,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没有明确宣布这场群众运动的结束。它是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停止,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下乡人数的逐渐减少而自行结束的。具体讲,到1981年10月,全国有计划的动员安置工作基本结束,各省、市、区的知青领导机构随之并入劳动局或合署办公。

这里还应提到的是,1978年底至1979年春出现的知识青年“大返城”问题。这股风在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其中尤以上海市最为严重。为此,1979年6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处理当前部分人员要求复职、复工回城就业等问题的通知》,一方面要求“按规定属于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应动员继续上山下乡”;一方面又要求“要坚决刹住‘回城风’,对于自行返城长期不归的,要动员他们尽快回去。”当时,上海知青返城较多,他

们集会游行,拦截火车,冲击机关,张贴标语等。“四人帮”的残余势力也乘机利用知识青年的过激情绪,扰乱政局,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在性质的定性上,中央很谨慎,没有一概定为反革命事件,而是对破坏捣乱者采取坚决予以打击、取缔的政策,对知识青年的合理要求则妥善解决,从而较快地平息了这股“返城风”。

总之“文化大革命”以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演变为一场旨在反修防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政治运动”,使一代青年遭到了不应有的磨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在经过了一场历史的曲折之后,在劳动就业问题上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新路子,即在国家统筹规划和指导下,实行劳动部门介绍就业,自愿组织起来就业和自谋职业相结合的方针。同时,党和政府在艰巨的拨乱反正工作任务中,下决心从各方面采取措施,解决在知青工作上遗留下来的实际问题,从而使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返回了城市,而一部分尚未回城的知青,也已进入集体所有制农场(厂)和企业、机关事业单位工作,得到了妥善安置。此后,随着工资制度的改革,国家又决定自1962年以后下乡的知青,一律计算工龄,知青工作中的遗留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

——缪伯英传略

伊胜利 陈书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向警予、刘清扬、杨开慧、缪伯英被认为是最早的一批女党员、觉悟最早的女共产主义者，而缪伯英的入党时间之早则位列四位之首。她毕生追求革命真理，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不愧为是中国共产党内妇女运动的先驱。

一、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女党员

缪伯英1899年10月21日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枫树湾村。先就读平江县启民女子学校学习。后毕业于长沙的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7月，她以长沙地区考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缪伯英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正值五四运动刚刚爆发不久。这是中国社会激烈动荡、中国革命急剧转变的时代。一批怀有救国救民远大抱负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思索和探求救中国的途径。一些共产主义者在追求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曾认为人人读书、人人劳动、人人平等，没有剥削和压迫的“工读互助团”是救中国的好形式，因此在北京、上海等地建立了很多这样的组织。1919年底，缪伯英到北京大学参加了由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王光祈等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并于1920年1月与张人瑞、田维等人共同组织了该团第三组——“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由于这个组织是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组织，不久便失败了。

“工读互助团”的解散，使缪伯英第一次从亲身实践中认识到改良主义的谬误，认识到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她的世界观开始接近马克思主义。

为了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研究，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参加这个研究会的，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他们团结并组织进步青年学习与研究马列主义著作。不久，缪伯英也参加了研究会。她追随李大钊向广大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青年们的良师益友。同时，她的思想觉悟也得到很大提高。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北京地区的社会主义青年团也在北大成立了。缪伯英与邓中夏、何孟雄、黄日葵等一起加入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此时，缪伯英在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诸子百家学说中选择、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不久，缪伯英便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为我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此时，正在北京大学就读的缪伯英的恋人何孟雄就世界观来说还是无政府主义者。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委托缪伯英帮助他走上马克思主义道路。起初，何孟雄还想不通，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缪伯英认真耐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向他讲解俄国十月革命的性质、中国的国情，用亲身参加“工读互助团”失败的经历来进一步说明马克思主义是真正救国救民的真理。在缪伯英和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其他成员的帮助下，何孟雄抛弃了无政府主义的羁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观点，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道路，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北方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缪伯英与何孟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思想一致，情投意合，最后成为一对“英”“雄”夫妇。他们结婚后，就搬进北京景山西街的中老胡同5号居住。党的一大后，由于北京党员很少，仅在北京大学成立了第一个党支部，缪伯英是其

成员之一。这年秋天，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成立，罗章龙任主任，何孟雄是领导成员。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创办了机关刊物《工人周刊》，缪伯英是其编委之一。她撰写了大量稿件，宣传马列主义，揭示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促进了工人运动的发展。11月，因洛阳大修机车厂外籍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陇海铁路工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18日晚7时，李大钊主持召开了北京区委扩大会议，商讨对陇海铁路工人罢工的支援问题。李大钊、罗章龙、何孟雄、缪伯英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全力以赴支援陇海路工人大罢工，并发挥领导作用；罗章龙赴洛阳指导工人罢工；罗章龙离京期间，由何孟雄、缪伯英代理主任职务，负责主持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当天夜里，缪伯英与何孟雄等人亲自把罗章龙送上南去的火车。

1922年1月，香港海员6000余人举行了大罢工，这是我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起点。香港海员大罢工一开始，就得到了中共北京地委和北方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支援。2月，罗章龙、缪伯英等人发动长辛店工人组织了“香港海员罢工北方后援会”，有力地声援了罢工。1922年下半年，缪伯英还担任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女工部的负责人。1923年2月，她担任中共北京区委妇女部长，参加秘密编辑出版的《京汉工人流血记》等宣传品。

二、坚决贯彻党的国共合作方针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国共合作的策略方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会后，遵照党中央关于帮助建立和加强国民党地方组织的决定，缪伯英同何孟雄、蔡和森、张昆弟一起被党派到国民党北京执行部任秘书。

党的三大后，张国焘离开了党中央领导岗位，回到北京，任全

国铁路总工会总干事。1924年5月21日，京师警察厅在北京逮捕了张国焘。张国焘贪生怕死，出卖了北京党组织的许多同志，其中包括缪伯英。中共北京区委迅速采取应变措施。通知她返回长沙老家暂避一时。

1925年1月，缪伯英被湖南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校长徐特立聘为女师附小主事。不久，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李维汉代表中共湘区执委会任命缪伯英为中共湘区执委会委员、兼妇委书记。妇委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妇女部和女界联合会，动员妇女参加国民革命。1926年1月，缪伯英以湖南代表身份到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同与会左派代表一起斥责国民党右派的分裂活动。马日事变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缪伯英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在何孟雄的催促下，她带着儿子何重九和贫民族兄缪卫云一行到了武汉。他们到达武汉后，先在何少青家住了一个星期，然后搬到武昌东湖附近住下。缪伯英此时的公开身份是湖南省立女二中训育主任。

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发动了反革命政变，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国民党反动派大肆屠杀中共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以及全国。党中央决定将其领导机关从武汉迁至上海，并调何孟雄、缪伯英去上海工作。9月，何孟雄和缪伯英抱着两岁的儿子何重九与亲戚缪卫云一行4人，从武汉乘轮船前往上海。他们途中曾在九江、南京上岸，月底到达上海。从此又开始了新的战斗生活。

三、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927年9月，何孟雄、缪伯英全家4口到达上海后，住在山海关路成都路小菜市场附近。何孟雄被党中央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委员，省委巡视员，省农委秘书、书记。缪伯英在大厦大学任教，同时在中共沪东区委任妇委书记。

当时，上海被称为“十里洋场”。国民党反动派经常惨无人道地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警车刺耳的尖叫声时常响遍大街小巷。缪伯英和何孟雄夫妇就是在这样紧张、危险的环境下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着。他们把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他们多次嘱咐缪卫云：我们如果有两个晚上没有回来，你就搬家，以减少不必要的牺牲。

几年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有时不几天就搬家。有时为了制造搬家借口，夫妻俩佯装吵架，甚至打架。上海各个租界几乎住遍了。为了掩护方便起见，他们还租过白俄的房子。白俄住在前厅，缪伯英夫妇住在后屋。他们一贯衣着朴素，可是，为适应地下工作的特点，何孟雄有时换上西服革履、长袍马褂，缪伯英有时也打份阔太太的样子。有时又化装成衣服褴褛的工人及学生。缪卫云最初过不惯地下生活，整天提心吊胆，吃不下饭，睡不好觉，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虚惊一场。当他看到缪伯英夫妇在这种紧张危险的环境中是那样的从容不迫、镇静自若时，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深感内疚。在缪伯英的亲切关怀和帮助下，缪卫云不久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3月，缪伯英生下女儿何小英，这样，全家增至五口人，可是收入微薄，在“十里洋场”的上海生活，确实很困难。家里缺东少西，实在没有钱时就去典当。缪伯英抚养两个孩子，牵扯了她的精力，再加上紧张而繁重的地下工作，严重损害了她的健康。

1929年10月，缪伯英不幸患了伤寒病，医治无效，这位中国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妇女运动的先驱、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年仅30岁，就在上海宝隆医院与世长辞了。

缪伯英临终前，亲口对何孟雄留下这样的遗言：“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奈何因病行将逝世，未能战死沙场，真是遗憾终生！孟雄兄，你要坚决与敌斗争，直到胜利！你若续娶，要能善待重九、小英两孩，使其健康成长，以继我志。”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事业矢志不移、奋斗不息的崇高品质和革命精神。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形成发展大事记(续完)

(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继续深化发展

(1994. 1—1994. 9)

1994年

1月1日 全国政协举行新年茶话会,江泽民、李鹏、乔石、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首都300多位各界人士一起欢度新年,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994年,对于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非常关键的一年。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团结一致,勤勉工作,坚持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努力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全面推向前进。台盟中央主席蔡学民代表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全国工商联也在会上讲了话,表示一定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加强团结,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锐意改革,积极进取,为实现九十年代的战略任务,胜利迈向二十一世纪而努力奋斗。

1月4日至8日 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要继续坚持“严打”的方针,尽最大努力遏制刑事犯罪上升的势头。

同日 全国司法厅局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指出,1994年全

国司法行政工作的重点是,充分发挥司法行政机关的法律保障和法律职能,维护社会稳定,加紧抓好现代化文明监狱、劳教所建设。

1月11日 “全国教育系统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在京成立。

1月12日 中国和莱索托王国自即日恢复两国大使级外交关系。

1月21日至16日 全国宗教局长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强调,当前要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推进宗教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的轨道。

1月21日 《人民日报》报道,台湾“行政院陆委会”近日通过《大陆地区人民在台湾地区居留数额表》,决定将大陆配偶申请赴台居留的配额,从现行限额每年为300人放宽至每年600人,于1994年1月起实行。

1月21日至24日 全国党员教育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提出,在新的形势下,党员教育工作总的要求是,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素质,增强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动员全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实现经济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各项战略任务团结奋斗。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锦涛向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新形势新任务迫切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员教育工作,全面提高党员队伍素质。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广大党员,就是新时期党员教育工作最重要的改进,做好这项工作,就是党员教育工作最有效的加强;这项工作做好了,党的思想建设以至整个党的建设就会有新的进步,社会主义现代建设事业的成功也就越有保证。他还要求各级党委带头贯彻“党要管党”的原则,加强和改进对党员教育工作的领导。要改进领导方法,转变工作作风,加强宏观指导和具体的督促检查,加强调查研究,认真分析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场大变革给党

员价值观念、思想情绪和精神状态带来的新变化,经常总结、推广基层创造的加强党员教育的成功做法,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逐步掌握新形势下党员教育工作的规律,把党员教育工作做好。

1月24日至29日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京举行。江泽民、李鹏、朱镕基作了重要讲话,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等出席。会议提出要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工作大局,全面落实宣传思想战线任务,并讨论了1994年宣传思想工作。江泽民总书记向会议发表的重要讲话分为三部分:1.新时期加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性和;2.宣传思想工作的根本指针和主要任务;3.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他强调,我们的宣传思想工作,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不断培养和造就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发挥有力的思想保证和舆论支持作用。他指出1994年全党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维护政治稳定,促进社会主义全面进步。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工作的大局。全党同志都要认清这个大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在谈到加强和改善党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时,他说,要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个问题郑重地提到全党面前,提到各级党委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鹏和副总理朱镕基也分别在讲话中,就加强对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和正确引导舆论、旗帜鲜明地支持改革发表了重要意见。

1月25日至26日 全国组织部长座谈会在京举行。会议提出,1994年组织工作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出发,努力适应新形势,切实提高各级领导班子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领和解

决自身矛盾的能力,加强和改善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提供组织保证。会议还要求加大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将从过去以单项突破为主转向全面配套进行的新阶段。

1月27日 全国民委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总结了近年来民族工作的成就和经验,并研究部署了1994年民族工作。

1月31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条例》,均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2月1日 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在京举行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报了关于设立特邀巡视员的设想。会议还提出了1994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指导思想,即:要以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针,认真贯彻落实邓小平同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继续落实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指示,推进齐抓共管,广泛发动群众,维护政治稳定和社会安定,保障深化改革的顺利进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创造良好的环境。会议并强调要动员群众积极参与综合治理。

2月25日至3月1日 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主要研究部署了1994年开展反腐败斗争的任务。强调新的形势要求我们更加坚定不移地贯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更加坚决、扎实地反对腐败,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为改革、发展和稳定提供条件和保证。并要求对中央提出的反腐败三项工作(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处大案要案、纠正行业不正之风)赋予新的内容。会议期间,江泽民总书记于2月28日向会议发表了重要讲话,讲了三个问题:1.实事求是地估计前一段的反腐败工作;2.搞好下一段反腐败工作的几点意见;3.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他并要求在巩固反腐败斗争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再接再厉、努力取得新的成绩。会议最后发表了新闻公报。

3月4日至7日 全国党校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讲了五个问题:1. 进一步明确党校工作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2. 坚持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党校工作;3. 深化党校改革,全面提高党校工作水平;4. 办好党校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5. 切实加强党委对党校工作的领导。他并强调,要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十四大、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研究在新形势下党校工作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统一认识,加强领导,全面深化党校教育改革,把党校教育事业推向一个新阶段。会议的最后一天,江泽民总书记同与会同志进行了座谈,座谈时他提出,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全党一定要重视和加强学习。要从领导干部做起,来一个脚踏实地、讲求实效的学习竞赛,看谁学得更多一点、更好一点、收获更大一点,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他指出从领导工作的要求来说,最根本的是要学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同时要努力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知识和有关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的基本知识,还要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经验。他还特别强调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努力学习和掌握贯穿在小平同志著作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

3月7日 国务院召开第三次专题研究部署反腐败工作会议。李鹏总理在会上强调要把改革发展与反腐败结合起来,政府系统的反腐败斗争在1994年要取得新的阶段性成果。

3月8日至19日 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政治决议。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修正案)的决议,以及提案委员会关于全国政协八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会议增选朱光亚、万国权为全国政协副主

席,王蒙等7人为全国政协常委,补选朱训为秘书长。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19日的闭幕会上讲话强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1994年全国工作的大局。人民政协必须在这个大局中找准位置,发挥优势,作出更大的贡献。他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内容,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任务,也是进行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他还要求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结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把参政议政更加生动活泼、更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3月10日至22日 八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199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199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的决议》、《关于1993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94年国家预算的决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通过了《关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决议》,还先后通过了《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的决议》,并决定将全国人大环境保护委员会改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授权厦门市人大及其常委和厦门市人民政府分别制定法规和规章在厦门经济特区实施的决定。会议接受杨衍银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的请求的决定,补选聂力、曾宪梓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乔石在22日的闭幕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1994年是实现经济体制转换的重要一年,改革的措施出台较多,任务艰苦繁重。我们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精心组织,周密安排,真抓实干,确保这些改革措施的顺利实施。他强调,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我们要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权利。要加快立法步伐,用法律引导、推进和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各项事业的顺利执行。会议号召,全国各族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同心同德,锐意改革,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夺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3月29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组织广大干部认真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基本知识。通知指出的学习的主要内容与基本要求为: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为指导形成的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应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基本知识的必读教材来学习,从中全面深入地了解进行这一改革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基本原则、主要环节和工作布局,学习中央为推进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和改革方案,以及有关法律、法规。同时,要重视学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本知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编写的《什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书,可作为普及读本。通知还要求学习中必须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做到学用结合、学以致用。通过学习和教育,力求使干部在以下三个方面收到实效:1. 把思想进一步统一到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增强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同心同德,推进和支持改革。2. 掌握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本知识和有关的方针政策,取得推动改革和发展的主动权。3. 全面理解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严格按党性原则办事的内在联系,经受住在新时期面临的新考验。通知还就学习的方法和措施以及如何加强学习的组织领导工作提出具体的要求。

3月31日 《人民日报》报道,国家人事部日前颁布《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以配套于《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这标志着今后国家公务员的考核将步入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4月1日 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在和全国第一期军以上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轮训班学员座谈时强调,用建设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军是一项长期的战略任务,要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提高在大局下行动的自觉性。他还强调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要紧紧抓住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善于把小平同志的基本观点联系起来学习,联系起来思考,真正做到融会贯通。

4月6日 《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系统》在京通过专家鉴定。

4月8日 第三期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理论研讨班在京开学,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开学典礼上讲话指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首先来自掌握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只有真正掌握这一科学理论体系,才能更好地把握和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做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动摇。

4月20日 中纪委制定《关于中央纪委三次全会重申和提出的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廉洁自律“五条规定”的实施意见》。再次对领导干部的用车、住房、公务活动等方面提出了廉洁自律的具体规定。

5月1日 1994年1月28日通过、4月15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即日起正式施行。条例共有七章五十条,七章分别为:总则、受理和初步核实、立案、调查、移送审理、对办案人员的要求和附则。

5月5日至12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决定、关于修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的决定。会议的最后一天,江泽民主席签令发布上述5个法律文件。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增补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委会预委会的决定和若干任免事项。

5月13日 纪念焦裕禄同志逝世30周年大会在河南举行。胡锦涛代表中央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指出,认真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是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呼唤。他并要求把学习和弘扬焦裕禄精神与贯彻落实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起来,与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结合起来,与维护 and 促进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努力培养和造就千千万万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

5月16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第154号令,发布《国务院关于废止1993年底以前发布的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决定》并将已废止的行政法规作为决定附件一并附后。其中,附件1详列了1993年底以前发布的予以废止或者自行失效的21件行政法规;附件2详列了1986年至1993年公布的法律和发布的行政法规已明令废止的86件行政法规。

5月31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结业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我们的改革正在全面深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各项工作正在迅速展开,这是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高运用理论武器正确把握大局、妥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的好时机,他要求要努力在全党形成浓厚的学习理论的空气,形成浓厚的研究解决实际问题的空气。他还指出,中央提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这是在认真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深刻研究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它体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要求,反映了我们党十几年来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对客观规律认识上的深化。他并就正确把握这个大局提出四项工作要点:第一,要用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论述教育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统一大家的思想。第二,要实事求是地认识和判断当前总的形势。这是把握大局做好工作的前提。第三,要积极、妥善地解决影响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第四,要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江总书记同时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更加重视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作用,放松党的建设、不重视发挥党组织的作用是不对的,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同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淡化和削弱党的领导,更是错误的。他要求省地县各级党委及同级各种组织、各方面工作的领导核心,要加强对经济工作和其他各方面工作的领导,同时也要改进领导方法。据悉,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理论研讨班从1993年10月至1994年5月31日已按计划办完了4期。

6月7日至10日 中直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在京举行。胡锦涛同出席会议的同志座谈时指出,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联系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完成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这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现在,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密结合“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个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来进行。他还强调,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关键在于领导。

6月8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同全军正军职以上领导干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二期轮训班学员座谈时强调,学好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密切结合新的形势和任务,认真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坚持学习理论与研究现实问题相结合的方法,发扬学用结合、学以致用学风。

6月8日至11日 全国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会议在江苏省吴江市举行。会议要求依法从重从快严惩各种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加强农村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为改革和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6月9日 中纪委、监察部在京召开全国纪检监察系统电话会议,中央政法委书记任建新在会上强调,要加大力度查处大案要案,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

6月13日 经国务院批准;我国又有47个县(市)列入对外国人开放地区。至此,我国已有1147个县(市)对外国人开放。

6月22日 从国家禁毒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传出消息:1993年全国共查破毒品案件26191起,逮捕毒品犯罪分子7677人,戒毒近5万人,缴获海洛因4459公斤,鸦片3354公斤。会议还提出,1994年及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西南边境地区打击过境贩毒是全国禁毒工作的重点,抓好云南、广西的禁毒,是解决我国毒品问题的关键。

6月24日 《人民日报》报道,中国共产党1993年新发展党员176万,全国党员总数已达5400万名,基层党组织增加到334万个。

6月27日至7月1日 全国政协八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在京举行。李瑞环主持会议并作重要讲话,陈俊生作《关于农业工作的汇报》。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会议还通过了同意王兆国辞去兼任的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主任职务,任命万国权为联谊委员会主任;同意经叔平辞去所兼任的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职务,任命胡德平为政协第八届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

6月28日至7月5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侵犯著作权的犯罪的决定》。国家主席江泽民分别签署了主席令,公布了这3个法律文件。会议还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1993年国家决算的决议》和人事任免名单。

7月4日 李鹏总理签署国务院令,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实施细则》,即日付诸施行。

7月15日 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就转发《国务院纠正行业不正之风办公室关于清理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无偿占用企业钱物的实施意见》向各地区、各部门发出通知。

同日 公安部、外交部、交通部发布经国务院批准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出境入境管理法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7月18日至19日 中宣部召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基地(中央决定建立的五个基地分别建在中央党校、国家教委、中国社会科学院、解放军国防大学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交流会。丁关根在会上首先分析了当前要进一步深刻认识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的重大意义。并强调，“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是一个统揽全局、着眼长远，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战略思想。只有思想上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信不疑，才会在政治上对党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他还要求五个理论研究基地更好地担负起学习、研究、宣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任务，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服务，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服务。要认真贯彻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对五个研究基地建设的要求，紧紧围绕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这个主题开展工作。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为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服务。

7月20日至23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京召开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以这次座谈会为契机，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依靠藏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好发展和稳定两件大事，确保西藏经济的发展，确保社会的全面进步和长治久安，确保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7月21日至24日 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在河南省林州市举行。会议总结交流了近年来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经验。强调当前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要紧紧围绕发展市场经济、引导农民奔小康进行。必须坚定不移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改革开放服务，为

奔小康服务。会议还指出,加快农民奔小康步伐,需要大力弘扬新时期创业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还是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7月22日 全国双拥模范城(县)命名大会在京举行,会上授予136个市(区)县为全国双拥模范城(县)。

7月27日至30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理论宣传座谈会。中宣部常务副部长郑必坚在会上指出,十四大以来,我们党确立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重大任务,理论宣传出现了比较主动发展的态势,其主要标志是:理论宣传的主题已经集中到宣传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上;各级党委重视理论宣传,重视舆论的正确导向;理论宣传的几个重大战役打得有声有色;理论宣传的方式有所改进。他并强调,理论宣传要为落实党的十四大提出的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服务,要帮助人们更好地认清当代中国发展大局,科学地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提高把邓小平理论作为全党全民族精神支柱的自觉性。他还总结了当前宣传工作的10条基本经验。

8月4日至7日 “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常务副会长唐树备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副董事长焦仁和在台北会谈,就两会会务和1993年4月“汪(道涵)辜(振甫)会谈”所签署四项协议的执行成效等充分交换意见,达成了共识。双方并于8日发表了《海协与海基金会台北会谈共同新闻稿》。

8月5日 新华通讯社报道,中共中央组织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在新形势下,切实加强以公有制成分为主的股份制企业中党的工作。

8月8日至12日 中纪委、监察部在吉林市召开全国纪检监察法规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反腐败斗争要逐步纳入法制轨道。

8月22日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8月23日 中共中央向各地印发了中央宣传部拟定的《爱国

主义教育实施纲要》，要求各地贯彻执行。《纲要》分为八个部分，即：1. 爱国主义教育的基本原则；2. 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3. 爱国主义教育的重点是青少年；4. 搞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建设；5. 创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氛围；6. 提倡必要礼仪，增强爱国意识；7. 大力宣传爱国先进典型；8. 加强对爱国主义教育的领导等。八个部分共有40条细则。这一纲要的制定和执行是贯彻党中央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指示精神的一项重要措施。

8月23日至26日 中纪委、监察部召集合署后第一次工作会议，总结了合署以来的工作经验，强调要进一步加强自身改革和建设，进一步发挥纪检监察两项职能，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更好地为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大局服务。

8月24日至31日 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在京举行。乔石主持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会议表决通过了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共和国关于民事司法协助的协定》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蒙古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决定，还通过了若干任免名单。31日，江泽民主席签署主席令，公布仲裁法和审计法，分别于1995年9月1日和1995年1月1日起施行。1988年11月30日发布的审计条例同时废止。

8月25日至9月23日 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举办全国大中城市宣传部长研讨班。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在研讨班上指出，宣传思想战线要牢固树立大局观念，围绕和服务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促进发展、保持稳定这一全党工作的大局。在这一大局下，要兢兢业业，扎实工作，更好地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舆论支持和思想保证。他要求，宣传思想工作要坚持群众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是党的十四大强调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要很好地贯彻到工作中去。重在建设，最重要最核心的是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重在建设还要着眼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8月29、30日 中共中央连续两天邀请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的负责同志、无党派人士和一些专家学者,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座谈会,就准备提交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讨论的《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征求意见稿)》征求了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29日的座谈会上就上述文件的起草情况作了说明。他说,十四大以后,各方面的大政方针已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都要求强有力的党的领导。从党的建设的全盘情况来看,必须把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推动全党对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学习不断深入发展;必须加强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在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部署的同时,当前特别需要突出抓好组织建设,就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加强和改进基层党组织建设及培养和选拔领导干部这三个问题,集中进行研究,作出工作部署。这对于完成十四大确定的各项任务,关系十分重大。他介绍说,文件起草工作是与调研工作结合在一起进行的。中央抽调了100多名干部,组织了18个调查组,用两个月时间,到22个省区市和中央有关部委进行调研,广泛听取意见。他并强调,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如何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是一个新的历史性课题。我们的经验还不够,还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同日 在山东威海召开的全国党校系统理论研讨会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讲话强调,在学习和研究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时,要重视学习和研究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执政党建设的论述,认真分析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党的核心领导作用的重大问题。新形势下抓党的建设,仍然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要进一步落实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任务。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关键。现在面临的紧迫任务,一个是全

面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成员的素质,另一个是大力培养德才兼备的优秀年轻干部。他还强调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要研究如何把加强制度建设与加强思想教育结合起来,在全党重新进行民主集中制的教育。

同日 《人民日报》报道,最高人民检察院近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级检查机关严厉打击走私、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和非法出版物。

9月10日 邓小平大型图片展览在京举行,有近400幅珍贵图片突出地表现了邓小平同志的丰功伟绩。17日,《邓小平:领一代风骚的伟人》大型画册出版。23日,《巨人之声——邓小平原始讲话录音》出版,它包括小平同志1978年3月至1985年至9月的十次讲话。

9月15日至10月14日 由中央党校和中央组织部主办的省部级干部党建问题专题研究班在中央党校开办。53名省部级领导干部学习了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关于执政党建党的论述,对新形势下进一步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组织建设的几个重大问题,进行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由于研究班结业时已在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之后,所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胡锦涛在研究班结业式上发表的讲话中,着重讲了怎样认真落实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的问题。他对此提出了五条意见:1.要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认真学习《决定》,并且同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结合起来,联系十几年的实践经验,认真钻研、深刻领会文件精神,提高思想认识,要抓好《决定》的宣传,引导和推动学习不断深入。2.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决定》的要求,从自己的实际出发,制定具体的工作目标和措施,把《决定》提出的各项任务具体化。3.要扎实工作,把贯彻落实《决定》的过程,作为切实解决本地本部门党的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的过程。4.各级党委要加强领导,真正把学习和贯彻好《决定》提到关系全局的高度来认识,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

党，特别是党委主要领导同志要实实在在到位。5. 要把贯彻《决定》同当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等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在实践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锻炼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水平和领导能力，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在改革和建设中的作用，使学习贯彻全会精神 and 做好当前工作相互结合、相互促进。

9月21日 以培训高、中级国家公务员为主要任务的国家行政学院在北京正式成立。江泽民、李鹏、乔石、刘华清等同志为该院题词，表示祝贺。国务委员李贵鲜被任命为该院首任院长。

9月25日至28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建设问题并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分四个部份：1. 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任务；2. 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3. 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4. 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全会认为，《决定》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必将对提高党的水平，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全会指出，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科学的合理的有效率的制度。我国正在进行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要求我们党必须更好地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当前要在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切实加强民主集中制的教育，健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完善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要努力发展党内民主，疏通和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充分发挥全党的积极性；要加强民主基础上的集中，维护中央权威，有力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坚持和完善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重大问题必须由集体讨论决定；要加强和健全党内监督，严肃党的纪律，保证党的肌体的健康和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全会还强调：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统一全党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必须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下大工夫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好；必须抓好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高度重视人才的发现和使用，抓紧培养和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努力造就大批能够跨世纪担当重任的领导人才，逐渐形成优秀人才能够脱颖而出、富有生气与活力的用人机制等要求。全会并号召，全党同志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指引下，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努力奋斗。

9月29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尉建行代表中纪委常委作的《全面发挥监督职能，保证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决定贯彻落实》的报告。会议重申，维护民主集中制原则，是纪律检查机关十分重要的任务。在新形势下，纪律检查机关维护民主集中制的任务主要是：维护党中央的权威，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切实贯彻执行；维护党的团结，增强党的凝聚力，保证党的各级组织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基础上的统一；维护党内政治生活的各项准则，监督党的组织和党员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多数与少数、中央与地方等关系；维护和保障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民主权利，发展党内民主，保护和广大党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于探索，改革创新。会议指出，民主集中制要靠全党来维护，关键是全体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要增强党性，提高素质。会议强调，党的作风建设如何，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各级党委、纪委要以四中全会精神为强大动力，继续抓好作风建设，把反腐败斗争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会议还要求，党的各级纪检机关要切实监督、促进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和改进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培养和选拔德才兼备的领导干部等项任务的实现。

9月29日至30日 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

会在京举行。会议表彰了来自全国 56 个民族的模范单位和个人共 1200 多个。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等领导同志出席大会。江泽民、李鹏并发表了重要讲话。江泽民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领导，把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每个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都要做民族团结进步的模范。李鹏总理的讲话列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的成就：经济发展步伐明显加快，国民生产总值平均每年递增 9.4%。各族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人均寿命大幅度提高。少数民族的科技、教育、文化、体育、卫生等各项事业迅速发展，珍贵的文化遗产得到继承，民族干部茁壮成长、各种专业人才队伍进一步壮大，民族素质不断提高。这些成就充分证明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10月1日 首都北京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45 周年盛大游园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荣毅仁等分别到各大公园与 40 万群众欢庆节日。晚上，首都各界群众 10 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焰火晚会，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与群众共度国庆之夜。中国人民衷心爱戴的、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也在毗邻天安门广场的中共中央驻地中南海观看了国庆焰火，与广大人民群众一起共享节日喜悦。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来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率领下，按照中共中央制定的“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二十字方针，再接再厉，不断发展大好形势，使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出现了扎扎实实、稳步推进的喜人局面。在一年前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为我们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设计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总体蓝图，使党的十四大决定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目标开始具体化。一年后的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上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对执政党建设的新要求，就当前如何把党建设成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坚强核心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了明确回答，提出了具体要求。这样，有了导引前进方向的改革目标，再有了按照中央决定建设起来堪当重任、永远走在时代前列的党，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有了胜利保证，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就一定会以稳步前进的步伐和日新月异的战斗风貌迎来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二十一世纪。

关于毛泽东挽黄公略联中 几个字词的辨证

吴直雄

黄公略(1898—1931),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1930年任红三军军长。1931年9月15日率部到江西东固执行任务,遭敌机扫射而牺牲。毛泽东为他写了挽联。这是一副史料价值很高、文学性强的联语。但这副挽联在被选登出版中出现字词颇异的五种样式。

一是白雉山《古今楹联选集》一书,顾平旦、常江、曾保泉主编的《中国对联大辞典》,荣斌主编的《中国名联辞典》以及李姿臻《指点江山 激扬文字——毛泽东联语浅析》一文,均写作:“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二是余章瑞、余东东《中华对联鉴赏》一书,以及黄琴《雅俗共受教 千古留风骚——毛泽东联语赏析》一文,均写作:“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与白雉山、顾平旦、常江、曾保泉、荣斌、李姿臻所录之联相异之处,均加着重号。下同——笔者注)

三是任喜民《对联艺术》一书写作:“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而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英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四是梁石《毛泽东对联》一书和曾文军的《毛泽东联挽黄公略》,均写作:“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

君来。”

五是萧永义《毛泽东诗词对联辑注》等书中写作：“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鹏从天落；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在五种写法中，第二三两副运用了成语“祸从天降”，其他几副则为“祸从天落”，这除了同样具有指灾祸来得非常突然之外，还更为形象逼真地描绘了黄公略遭敌机如雨点落下一般的子弹扫射而光荣牺牲的情景，用一“落”字，更显现了黄公略当时在江西吉安东固山指挥部队隐蔽和对空射击作战的激烈和英勇。再是“奋勇”比“英勇”的内涵更为丰富，它含有英勇与奋激之意，所以用“奋勇”似更为恰切，也符合毛泽东善于灵活运用词语的习惯；第四五两联将“大祸”写成“大鹏”，虽是一字之差，其意思却有天壤之别。“大鹏”之落，与黄公略的牺牲有多大关系？令人费解。再是若把敌机比喻为“大鹏”，褒贬不明，甚是不妥。这可能是笔误、校勘之误、或是回忆之误。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当选用第一副较为妥当。

抗美援朝战争中中朝联合组建的游击支队

姚 莲 瑞

一、组建游击支队的背景和目的

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及从打小歼灭战逐步向打大歼灭战过渡和依托阵地稳步前进等原则。志愿军据此开始着手长期作战的准备，计划三至六个月内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以在敌后箝制、分散、消耗、打击敌人；在战略上、战役上配合主力作战。5月底，中朝联合司令部发出指示，要求组织游击支队。

1951年6月11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称：“目前两个月不进行大的反攻战役，准备八月进行一次有把握的稳扎稳打的反攻。”电报的主要精神仍是指示志愿军进行长期作战准备。6月下旬，当敌被迫接受停火谈判的建议后，毛泽东又指示志愿军，要依据“准备长期、争取短期”的方针部署工作，即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朝鲜战争。6月25日，志愿军高干会议在朝鲜空寺洞志愿军总部驻地召开，会议确定：“今后我军作战方式为运动防御与反击相结合的拉锯战形式，也即积极防御与短促突击的作战方式”；并确定：“在两三个月内不进行大的反击战役。在停战谈判开始后，准备坚持以三八线为界划分军事分界域，如敌坚持现在占领区，我即准备八月反击。”为了分散与箝制敌人，会议再次决定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中各抽若干部队组成游击支队，潜入敌后，开展游击战，配合正面主力作战。

1951年7月2日为配合停战谈判，毛泽东又指示志愿军，必

须准备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敌军大举进攻,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因此,反攻战役被提到日程上来。志愿军上上下下的工作重心都转到了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工作上。

组建游击支队就是第六次战役准备工作中的一项。当时,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志愿军政治部主任杜平同志。他接受任务后,即制定组建方案,物色干部。组建草案出来后,彭德怀总司令很满意,指出:这次到敌后开展游击战,不同于在国内,要严格纪律,严格政策。否则难以立脚。

二、游击支队的编成及整训

1951年5月底,中朝联合司令部发出组织游击支队的指示后,各部即按指示要求于6月中旬开始组编。中方每兵团组建一个中队、一共4个中队;朝方组建3个中队。支队的副职和志愿军各中队的副职,由人民军担任;人民军各中队、分队的副职由志愿军担任,以便协调一致地进行工作。经过7到10天的教育准备,全支队(除朝方3个中队外)于7月14日集中完毕,开始整训。游击支队的编成如下:

1、人员编成。全支队志愿军四个中队,总人数为2025人;每中队454—458人左右;下辖3个分队,每分队133至143人;分队下辖直属班及3个小队,每小队44人;每小队辖3个班,每班13至14人。支队部121人,内含一个警通排33人。

2、武器装备。为便于补给,支队均装备美式武器。分队之直属班配美式机枪两挺,子弹300至500发;连以下干部全配卡宾枪,战士2/3配卡宾枪,1/3配自动步枪,子弹每人100发;战士每人带3斤炸药,手榴弹1个,反坦克手榴弹1个,支队配电台两部,中队配电台一部,分队配话报机1台。

3、供应情况。为保证整训的需要,支队伙食菜金增加一倍,2/3

的细粮。行动时,每人带压缩干粮 10 斤、半年经费,此经费中每人 5 钱金子,余为美伪钞票。医药方面,每人带急救包一个,健胃片、行军丹等药少许,并全部注射了防霍乱、破伤风等药液。每个配雨衣、蚊帐各一。军装两套,棉衣一套,鞋子两双。每班配一个铝铁小锅,分队配三套便衣。

4、兵员质量。对部队质量和干部配备的要求是:战士必须身体强壮,能吃苦耐劳,意志坚定,就是负伤、有病或掉队也不致于屈服投降。干部必须挑选积极负责,勇猛机智,能够完成艰巨任务,有游击战经验,有指挥能力,有政治水平,而且乐于敢于担负这一任务的人。人民军所派出的各级干部,建议尽量挑选熟悉南朝鲜方面情况的人,或者同南朝鲜人民血肉相关、有威信的人。根据这一原则,各军均以军、师、团三级侦察部队中,质量好的成员为基础,并抽战斗连队中好的战士组成。干部与队员,均经过各级党委严格审查挑选。支队组成后,质量非常过硬。全体指战员中党团员平均占 80% 以上;功臣模范平均占 40% 以上;中队之成员,来自侦察部队者,占 70%—80%,例如,九兵团组建的中队,就是以原二十七军侦察营二连(先遣渡江英雄连)组成的。

5、部队级别。游击支队为师级单位。支队级者 3 人,均为师级;中队级者 6 人,均为团级;分队级者 33 名,其中十二军、十五军组建分队之分队长和四十二军组建分队之分队政委团级外,其余分队长为正副营级和较强的连级干部;小队干部,均为连级和较强的排级干部。

6、主要领导。由韩先楚和杜平推荐,志愿军第四十军第一一八师政治部主任刘振华同志任游击支队司令员。刘振华是山东泰安人,毕业于兖州第四师范中学。参军后,领导过地方游击队,有游击战的经验。入朝后,刘振华在战场上表现出色,砥平里战斗后,部队后撤时,刘振华带一个团断后,曾被敌坦克包围过三次,都勇敢地突了出来。该同志精明能干,政治水平高。是司令员合适的人选。第四十二军第一二五师副师长茹夫一为游击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

长,人民军派出一人为政治委员,一人为副司令员。

人民军方面的部队编组由朝方决定。

7月中旬,游击支队集中完毕,开始整训。

游击支队的整训是从政策、思想、战术三方面进行的。首先对游击支队进行了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政策教育,其中包括土地政策,财政经济政策,肃反政策,对伪军、伪政权的政策等等。并对敌后游击战争的宣传工作也作了安排。

其次对部队的思想进行整训。游击支队刚编成时,部队中存在着很多顾虑:如何深入敌后;伤病员如何安排;言语不通,如何在地方开展工作、与群众交流;离开后方供应困难如何解决;等等、针对这些问题,部队进行了深入动员教育,讲清了敌后的一般情况和我们进行敌后斗争的具体策略。同时,使部队普遍认识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和重要性及担任这一任务的光荣。同时还对部队进行了气节教育,要求指战员誓死不当俘虏。对战士们的顾虑,也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此外还针对敌后的地形,地理,人文等情况,对游击支队进行了战术整训。

三、游击支队的撤销

游击支队成立后,驻在朝鲜桧仓附近。打算随参加第六次战役的大部队一块打过去,然后留在敌后,开辟敌后战场,准备长期作战。

7月下旬,朝鲜北方爆发30余年未见之特大洪水,加之敌机轰炸,我交通运输严重受阻。9月作战所需弹药、粮食得不到保证。再加上敌已构筑坚固防御工事,我航空兵暂不能出动等等原因,我准备的第六次战役迟迟未能发动。游击支队也就一直未派出去。后战场上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促进停战谈判、有计划有准备地举行数次小的进攻战役,12月以后,我军即全线转入巩固阵地的斗争。游击支队即在朝鲜延安半岛之信川地区从

事清剿匪特和担任海防任务。朝鲜同志后来都回到了人民军,1952年8月游击支队撤销,志愿军的四个中队改编为志愿军司令部直属独立团。